

新视界

NEW VISION

学术讲堂

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 ····· P01

学术论文

亚太二元格局下的中日关系 ····· P16

国关人物

托马斯·谢林 ····· P27

他山之石

虚构 IR 与想象：高阶叙事方法 ····· P33

年终特辑

····· P54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

编者的话

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春日里万物萌发，草长莺飞，似乎一切都充满了希望。但有人说“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私以为，寒冬腊月、草木凋零固然暗示着生命的迷茫惨淡，但也在考验着生命的坚韧勇毅。恰如拿破仑所言“人生的光荣，不在于永不失败，而在于能够屡扑屡起。”挺过生命的冬天，闯过希望的荒原，练就一身铮铮铁骨，打造一腔不灭的信念。正是在寒冬岁月，灵魂的高贵才尽显无遗！

冬天不光有肃杀的寒气，也有温暖的阳光。沐浴在冬日暖阳里，掬起一捧耀眼的光明，心情也变得舒畅、驱走了阴翳。要是能泡上一盅香茗，打开透着墨香的书页，享受思维的妙趣，那真是再美好不过之事了。一年之终，我们又如约为各位读者奉上诚意制作、饱蘸爱意的「新视界」冬季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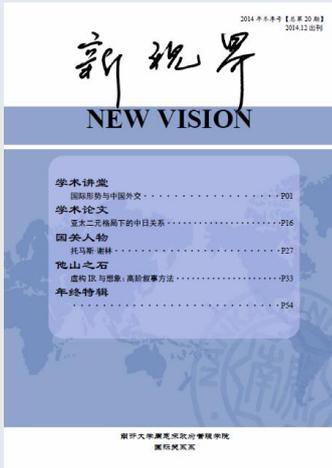
在本期的「新视界」，大家将在「学术讲堂」领略国关大师金灿荣纵论当前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品珠玑妙语，赏高远洞见；「学术论文」将为大家分析和展望二元结构下的中日关系；「国关人物」将评介托马斯·谢林教授著名的威慑理论；「他山之石」为大家准备了有关虚构 IR 的前沿论文——「虚构 IR 与想象：高阶叙事方法」；「年终特辑」则不但为大家盘点了 2014 和「新视界」编辑部的全年大事，而且将带领大家走近 2014 到访南开的各路名家人物，内容丰富，不容错过……更多精彩，还请各位读者亲自探索。

一年又一年，转眼间 2014 就被翻过，2015 就要鲜活到来。新的一年，新的希望。「新视界」也将不断前进，与读者朋友们携手一道，呈现更好的「新视界」。

最后，衷心祝愿大家 2015 扬帆远航，前程似锦！

胡阳阳

2014 年 12 月



新视界

NEW VISION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主管
《新视界》编辑部主办



2014年冬季号
【总第20期】
2014.12 出刊

主编：刘芮宁

副主编：刘志

本期执行主编：胡阳阳

编辑部成员：

程康 董柞壮 高振华
胡阳阳 姜忆楠 江昊宇
缴懿鑫 李漩 李安琪
李冰莹 李萌 李天翼
李志宇 刘志 宁鹏举
裴瑶 唐铭兴 王燕
杨雪 杨至远 姚丽丽
于凯玥 赵姝婧

实习生：

丁敏潇 郭超 马刚
彭宁楠 宋一宁 赵天畅

封面设计：胡阳阳 刘芮宁

目录

编者的话..... (I)

学术讲堂

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金灿荣(1)

时事观察

莫尼斯与自由主义民主.....曹钦(15)

学术论文

亚太二元格局下的中日关系:分析与展望.....王晨光(16)

国关人物

托马斯·谢林.....(27)

他山之石

虚构 IR 与想象:高阶叙事方法.....朴成俊(33)

海外国关人

德国留学经验谈.....方鹿敏(48)

英采飞扬

外交政策的伦理评估之奈所见.....姜忆楠(50)

医方应如何改善医患关系.....冯晓璇(51)

目录

年终特辑

2014 年终大事盘点····· (54)

《新视界》2014 大事记····· (67)

名家访南开····· (68)

新书架 (四) ····· (75)

院系活动

学术交流····· (78)

师生活动····· (80)

校外短讯····· (80)

国际关系系科研简报

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科研简报····· (82)

国际关系中文核心期刊最新论文篇目信息····· (85)

国际关系英文核心期刊最新论文篇目信息····· (91)

读编往来····· (98)

国际关系系论文注释体例····· (101)

征稿启事····· (107)

刊物简介

《新视界》(季刊)于2010年6月改版创刊,由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主管、《新视界》编辑部主办。本刊秉承“知识性、交流性、原创性”原则(张睿壮教授语),在学院领导、教师的悉心支持下不断发展、壮大,也得到院内外师生、校内外读者的关注与好评。

《新视界》编辑部下设编辑组、新闻组和网宣组等部门,由不同专业、年级在校学生组成。编辑部成员以“我的视界我做主”为理念,旨在以此为平台,活跃学术氛围、引导学术思辨、推动学术争鸣,为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者、学习者、关注者开启“新的视界”。

编辑部倡导“立足于南开,但又不限于南开”,热忱欢迎校内外和国内外学人、师生来稿来函,为刊物发展提供宝贵意见和强劲动力。

通讯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4号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新视界》编辑部
(300071)

邮箱:

newvision@mail.nankai.edu.cn

网址:

<http://nknewvision.yolasite.com/>

博客:

<http://blog.sina.com.cn/nkirnewvision>

注:未获本刊事先书面许可,任何媒体不得转载本刊原创内容。

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

——中美俄三国外交及东南亚局势

【编者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伴随而来的是当今中国巨大的海外利益。但是,由于长期实行的“韬光养晦”的战略,我们的实力不足以去保卫我们日益增长的海外利益。习近平主席上台以来,中国的对外政策有了令人瞩目的转变。中国的“韬光养晦”战略是否正在转变?原因为何?中国外交的未来往哪里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外交学专业博士生导师金灿荣教授将系统地对这些问题一一解答。

主讲:金灿荣

时间:2014年9月27日

地点:天津图书馆(文化中心馆)二楼

主讲人简介:金灿荣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外交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美国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美国外交、中美关系及大国关系研究。

(一) 中国外交政策

我今天给大家汇报的内容,一个就是讲座通知上的那些,另外肯定也会稍微超出一些。我会在讲周边的时候重点讲中日关系、朝鲜问题、海洋问题,海洋问题会牵扯到东南亚,所以第二个部分不仅限于东南亚。

那我就切入主题,先谈一谈中国外交政策。今年是建国 65 周年,如果做一个回顾,我们的外交大致有两个大的阶段。

1. 新中国 65 年外交回顾

第一个阶段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外交是比较激进的。一般来讲,一个新的政权成立的时候,它会在外交上尽量保持延续性。国际上多数国家都是这样——国内政策可以变化,但是国际上尽量保持延续性,这样以便减少外部摩擦。但是毛泽东还是很例外的。毛泽东上来以后,执行的外交政策一个叫“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把所有原来的国家都赶走,再一个个筛选回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一般国家所没有的。

大家注意看所有新的政府上台以后都是要与美国、俄罗斯等国保持原来的关系,但是毛泽东没有。第二个政策叫“另起炉灶”,第三个叫“一边倒”——这是新中国外交的三大政策。这是很有特色的,在国际关系史上很例外,有比较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也反映了毛泽东的自信。总体说来,这种类型的外交一直执行到改革开放以前——1978年。中间有调整,但是总的特点是存在的。毛泽东时代的外交是有意识形态特点的,国际主义色彩比较强,对国家利益的考虑也有,但是比后面程度要低一点。具体的变化也有:五十年代是“一边倒”;六十年代跟苏联关系不好了,既反“帝”又反“修”,比较自我孤立一点;七十年代跟苏联关系也不好,执行的政策叫“一条线”,“以苏划线”。这是当年的一些基本情况。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阶段,现在在我们看来或许有些幼稚,但在当时条件下可能也是不可避免的。当时新中国还是非常新的政权,遇

到的问题和现在不太一样，是生存问题——新中国要活下去。内部有颠覆力量，外部有镇压力量，所以要对内镇压，对外打仗。今天我们看来很不好理解，但在那个时代就得那么干。

新中国外交的第二个阶段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外交，从 78 年开始。这个外交就不一样了，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渐渐减少了，国家利益增加了，这就比较符合一个正常国家的外交了。跟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一样，外交也是这样。另外，在国际上的身份也变了，78 年以前，我们对以美国为首的现行国际秩序是不承认的，我们是“造反派”、“反对派”。78 年后我们变成了现行国际秩序的参与者，渐渐成为国际秩序的建设者、领导者。我重点讲讲 78 年以来我国的外交，它也是经历了不断的变化。应该讲从 78 年到九十年代中，都是在慢慢学习的阶段，是转型期，渐渐地摆脱了一些原来的束缚。一般外国媒体认为，我们中国在九十年代中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叫“中国的新外交”。那时小平同志还在，但是江泽民同志已经开始全面的主政了，这个阶段我们外交上有这么一个变化：开始全面参与现行国际体系的活动，具体讲就是在九十年代我们提出了一个“新安全观”，得到了国际上的重视。官方的定义很简单，叫“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它在实践中最大的意义就是我们开始承认多边国际合作的價值。之前中国比较喜欢双边解决问题，跟中国的内部人际关系一样，我们出了问题喜欢找关系的，两个人关起门来解决问题。国际上也是一样，出了问题我们喜欢公开在桌面上一对一谈，但是九十年代中期“新安全观”后，多边合作开始显现出它的价值。

我们第一个参与的多边合作是跟东盟国家联手应对亚洲金融危机。97 年的金融危机，使好多国家经济一塌糊涂。通过贬值，让自己的出口物便宜，便宜就多出口，排挤别国的市场。当时只有我们中国不贬值，结果效果很好，所有国家都感谢我们。如果我们也贬值，这个危机就没有边界了。当然我们不贬值也不完全是大公无私，而是有很具体的原因，那就是：要保护港币。港币是和美元挂钩的，贬值会拖累港币，香港经济就垮了。亚洲金融危机时机很不巧，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归，7 月 2 日泰铢贬值，危机爆发。所以也有人怀疑这个事是不是跟香港回归有点关系，但是没有证据。情况就是这样：由泰铢贬值，引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了所有东南亚国家，也冲击了港币。从维护香港经济稳定方面来考虑，我们不贬值，尽管有几个月我们的出口值下降了。最后因为我们不贬值，让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降了，这样一来国际上对我们的评价非常高，说中国还真是一个大国。受到这个鼓励，我们的观念变化则被体现出来了，觉得有些事情要到多边场合去解决，更有合法性。又由于具体事务我们参与了一下，国际评价很好，从此中国的外交就进入到积极的多边合作阶段，开始建立东亚的多边合作机制。首先是 96 年建立了上海五国，2001 年我们把它变成了上海合作组织。这是世界上很少见的工作语言是中文的国际组织，是在联合国正式注册的组织，秘书处设在北京。第一工作语言是中文，第二是俄语，没有英语，这是很少见的。国际组织一般是第一语言是当地语言，第二语言一定是英语。美洲国家、非盟、欧盟都是这样。此后又有了六方会谈，中国在朝鲜问题上采取了六方多边机制。这个六方机制

现在看来还不太成功,并没有解决朝核问题。但是在有一点上它是有作用的——避免了美国和朝鲜打仗。如果没有六方会谈,它们两国不来往的话关系就会很紧张,紧张就会对战,对战的结果就是冲突可能性上升。后来中国就搭了个台子,搞了个六方会议,说“你们这两个家伙,每半年必须到我家来一趟”,而且每次我们故意让它们坐一起。后来美朝之间其实是建立了几个管道:一个是“北京管道”,是两个驻北京大使馆的接触;另一个叫“纽约管道”,是联合国使团的接触;还有一个叫“日内瓦管道”。所以现在美朝变了,因为有定期接触,就不琢磨打仗了,而是在谈判桌上去争取一点东西,这个思路就变过来了。所以六方会谈在避免战争方面还是有贡献的,在解决核问题上失败的,应该这样评价比较客观。总之六方机制是中国试着用多边机制去解决一个比较棘手问题的一个尝试,不是特别成功,但是还是有益的。除了上合、六方,今天还在发挥作用的,就是 2001 年成立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都是在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发生的变化,这个变化西方人把它称为“中国的新外交”——the new diplomacy of china。

最近这一年零十一个月,就是习主席执政以来,情况又有进一步变化。这个变化我下面就重点讲一下。我们中国过去三十五年的改革开放,总体是非常成功的。虽然改革开放也有负面的影响,如环境恶化、人们观念多元化导致的观念冲突、腐败等,问题也是很多的,但是总体来讲还是成功的。这个成功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同时进行。虽然赫鲁晓夫时代也进行过非常认真的改革,但是它没有成功,有一个原因就是光改革不开放。中国就不一样,改革、开放

同时进行,有许多创新。改革开放能成功至少证明我们外交没有犯大的错误。我们中国的外交过去真的做到了“为经济建设服务”,做到了“少树敌多交友”。改革开放得以继续就证明外交政策基本成功了。成功之后还有几个战略:三十多年一直坚持的“韬光养晦”;另外就是“不结盟”;“经济优先”;“搞好同美国的关系”。这都是过去成功的诀窍。但是这段时间好像这四个政策都有变化,所以最近应该是一个新的改革转折期,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总体的新的思路。

所以总结一下,我们新中国 65 年外交大概是分为两部分:一个是毛泽东时代,比较革命性,意识形态比较强。它完成了当时的历史任务,就是让新中国活下去。第二个时代就是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时代。这个时代的总特点就是外交开始务实了,意识形态后撤,国家利益上升,具体服务于国家的发展。自小平那个时代到现在,有个细的阶段,就是朱镕基阶段,现在正在进入下一个小阶段。下一个小阶段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来:一个是韬光养晦政策正在局部地改变。过去三十多年我们一直在坚持小平的一个指示叫“韬光养晦”,我个人的理解有四个要点:第一就是保持低调,在国际上绝不张扬;第二就是全力以赴促进国内发展,解决国内问题,长“内功”;第三就是不卷入外部矛盾,国际上矛盾非常多,我们一切都不卷入。所以中国外交在过去三十几年有一个特点,就是在任何问题上任何时候我们的表态都是一样的。哪个地方出麻烦了,我们说“希望有关各方保持克制,谈判解决问题”,具体是哪些方面,怎么克制怎么谈判,根本不管,绝不惹麻烦。最后一个就是,如果外

面真欺负我们了我们当然要反击，但反击的时候一定是有克制地行使力量。这是我总结的“韬光养晦”的四个要点。

应该讲，过去三十多年，这个韬光养晦政策是成功的。它就做到了“少树敌，多交友”，为我们开放创造了条件。

2. 中国外交新变化

那么现在情况在变，有几个原因：一个就是我们内部在变。大家都有一定的社会经验，知道人有钱了脾气就见长。刚进城的农民工受点委屈他就算了，现在的中产阶级受委屈肯定跟你吵。国家也是一样，国家性格和人性其实是相通的。我们现在力量大了所以也不能受委屈了，以前能受的委屈现在受不了了。第一因为我们主观上有点不愿意了，第二客观上（想韬光养晦）也更困难了。三十年前美国真是瞧不起我们，都不正眼看我们，所以那个时候中国自己也是有意地低调，自然就韬光养晦了。现在可以这么说，2010年开始，美国的左右两派形成了一个共识：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有可能、有潜力取代美国，那就是中国，其他任何国家连可能性都没有。中国也不是有十足把握可以取代美国，但是是唯一一个有可能的。所以它形成一个共识：中国是心头之患。所以这个时候再韬光养晦就非常困难了。附带讲，美国把韬光养晦翻译成英文，翻译得特别不好，这应该是我们知识界和体制上的一个失职。“韬光养晦”是小平给我们内部的一个讲话，是内部告诉我们要耐心、保持低调，做人要谦和。后来我们外交部突然向全世界公布：“我要韬光养晦了”，这是很搞笑的一个事情。它宣布时也没跟我们商量，所以我们也来不及准备，就突然被外国人给翻译了。翻译这句话的是原来美国国防部的首席中国专家——白邦

瑞，英文名字叫 Michael Pillsbury，是一个白人。他研究《孙子兵法》研究得特别好，中文也非常好。这个家伙很坏，他把我们的“韬光养晦”翻译成英文后实际上翻译成了“卧薪尝胆”——hide your capabilities and bide your time，隐蔽力量等待时机。这样一听就让人家毛骨悚然。但是在过去，虽然他翻译错了，但那个时候整体上美国是瞧不起中国的，所以也没关系。但是现在他盯着你了，加上翻译有错误，他再听你要“韬光养晦”他就挺害怕的。但是“韬光养晦”现在有了变化，我想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原因：一个就是突然出现的客观情况——中国突然在海外出现了巨大的利益，也就是我们在国境线之外有巨大的利益。另一个就是习近平主席上台以来，中国外交有所转变，中国外交政策有强势的趋向。

中国海外利益的迅速增长，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是“人出去了”。去年我国出境游人是九千八百万，今年大概是 1.16 亿。我们现在旅游赤字将近达到一千亿美元。中国人出去得多，花钱多；外面人来得少，花钱少。所以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每年一次性的、临时出去的人数超过了一个亿，结果就是外交部领事司很辛苦。现在世界上不能出事故掉飞机，一掉飞机就有中国人，领事司就不能睡觉，要不停地处理相关事宜。另外就是长期在国外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在我国长期在外面的人大约有一千万。首先有两百多万孩子在外面求学，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第二有 54 万船员，中国是最大的船员输出国。所以经常在索马里有韩国船只被扣，大家发现除了船长是韩国人，其他都是中国人。孩子们加船员也有三百万了。我们还有 475 万工人在外承包各种

工程, 挖油、开路、挖矿, 加起来就将近八百万了。另外还有各个单位在往外面派人, 比如说我们教育系统在外建了五百所孔子学院, 这就派了许多教师出去。共青团在外派国际志愿者, 新闻媒体也走出去。美国 CNN 在哪开一个点, 我们中央电视台一定要开一个点, 不能少于它, 新华社也是这样。总之各单位走出去的就有几十万人。另外, 非洲大陆现在有 150 万中国人。除了各个机构、公司的人, 还有一百万浙江的农民企业家。所以我们临时出去的人一年有一个多亿, 长期待在外面的人将近一千万。这还不算台港澳, 三千多万同胞。因为台港澳下面有二级政府, 他们承担主要责任, 我们承担间接责任。另外还有华人华侨六千多万。这些华人华侨中国政府不敢管, 一个是干涉内政, 另一个是管不过来。我们国家现在对华人华侨的认定是很严格的, 我们执行的叫“父系血缘主义”, 就是你爸爸是中国人, 我们认你是华人血统, 你妈妈是中国人是不认的。这跟很多欧洲国家不一样, 欧洲国家像爱尔兰要求很松, 父母都认, 八分之一就认, 所以爱尔兰四百万人却觉得自己在外面的侨民是八千万。中国要这样的认法那世界上半都是中国人。荷兰王妃文雅丽, 四分之一华人血统, 好莱坞有一个很帅的帅哥叫 Reeves, 演《黑客帝国》的, 是八分之一华人。我们是按照严格的“父系血缘主义”认定世界有六千多万华侨。目前都不敢管, 也确实忙不过来。就算把台港澳加华侨这一亿人我们都不管了, 这个出境数字也已经很惊人了。

第二就是“财务出去了”。我们现在在外的金融资产大概是六万一千八百亿美元, 这是央行国际司最近公布的数字。原来我们

以为海外资产就是四万亿, 但实际上还有两万亿, 共 61850 亿美元。另外, 2001 年中央号召我们的企业“走出去”的时候, 中国直接投资全球排位是 37 位; 但是去年(2013)就上升到了第三位, 发展非常快。这种快速发展的结果就是我们在海外有很多的资产。例如现在我们在海外的油气田有 160 多块, 在世界市场拿的份额油是 1 亿吨每年。这一点我们做得比日本好, 日本在 50 年前就开始“走出去”, 但是它的份额油只有 1500 万吨每年。我们是 2002 年开始“走出去”, 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使份额油达到 1 亿吨, 这说明我们的市场化战略是很成功的。另外我们还买了很多的矿产和土地。新西兰以前允许外国人买地, 但是中国人去的太多了, 现在修改了宪法, 不允许外国人买了, 因为它害怕国家的土地一下子都卖完了。总体来看, 我们的海外投资虽然有失败的教训, 但大部分是成功的, 结果就是现在我们的海外资产达到了 6 万亿美元左右。

第三, 去年冒出来一个消息, 其真伪性尚待考证, 那就是中国在海外还有一笔资产。主旨在解密各国信息的“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跑到“避税天堂”开曼群岛和维尔京群岛, 在那里他们找到了 3.5 万个中国人账户, 资产价值共 4.3 万亿美元, 这里面就包括马云的阿里巴巴。这些资产当中有一些可能是贪官的钱, 有一些是中国公司的。这些资产结构非常复杂, 但是属于中国大概是没有问题的。这样海外资产的总数就达到了 10 万亿美元。

另外存在第四笔, 但是却不知道具体数据的钱, 就是中国炒房团的钱。中国人在北美许多地方炒房, 导致当地房价翻了几番。这些钱肯定是中国人的钱, 但是有多少我们

不知道，全世界的人也都不知道。总之，现在中国在上世界上的人、财、物分布很广。因此结论就是，在短短十几年间，我们有了一个巨大的海外利益的存在。

那么现在就有一个问题：怎样保护这么巨大的海外利益？总体而言，我们的保护办法是不够的。现在我们主要有两个保护方法：一个是外交抗议，但外交抗议有时候有用，有时候又不管用；另一个是我们公司的自救，中国公司到了一个地方之后，给当地各方面的势力都花力气去打通关系。总体而言，我们对海外利益进行保护的情况并不是特别好，其中也存在一些客观原因，那就是现在的世界基本还是一个西方控制的世界。西方三百年前走出去的，先是军队，接下来是商人，后面是传教士。这种方式遇到的阻力很小，因为它们既拥有先进的文明，又拥有坚船利炮，双管齐下。而我国走出去是单兵突进，历史背景不一样，所以从结构上讲我们就很脆弱。另外，从进程上讲，我们还缺技术手段。第一艘航母尚未成军，还没有战略空军，没有海外军事基地，没有军事盟友。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尴尬的情况——中国的巨大的海外利益已经出现了，而且还要扩展，但是保护能力却跟不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海外利益受损，领导人无法向民众交代。这也是迫使我们进行改变的根本原因。

去年习近平主席上台以来，对外政策有强势的趋向，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是我们第一次以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名义向外派出战斗部队。今年3月份我们向马里派出了一个400人的部队，其中295人是战斗部队，这是一个重要变化。以前军方希望派出战斗部队，但是领导人从伤亡角度考虑没有批准。这里扩展两点，第一

个就是今后对我们对外行使武力最大的制约并不是美国；美国其实希望中国军事力量的投入到别的地方。第二个就是如果在周边和美国较量的话，我们有一定的技术优势。对中国在境外使用武力最大的制约其实是我们的一胎化政策，现在军队80%以上是独生子女，所以一旦国家的政策失误了导致他们的死亡，那么他们的父母就会有大的逆反情绪。这个同欧洲、日本的情况有些不一样。在欧洲和日本如今出现了“少子化”，这些国家政策上鼓励生育，但是现在妇女思想观念改变了，她们也不爱生孩子，一般也只生育一个。所以中国人的孩子一旦出事，后果很严重，这是一个现实的困难。派出战斗部队之后，效果不错。马里以前是法国的殖民地，一开始是向法国请求支援的，但是法国军队力所不能及，于是就向联合国请求支援。9月初，我们派出了第二只战斗部队前往苏丹，是一个加强营，有人说是700人，也有说是800人。这样，在非洲的军队总数就达到了一千人。这些部队的装备都很好，战斗力很强。

二是最近西方报道的，我国和斯里兰卡签订的一系列协议。一个是科伦坡港的改造，另外一个帮助他们围海造田，总共270公顷，用来建设一个工业园，其中三分之一的土地归中国公司。西方媒体分析说，科伦坡港其实不是重头戏，真正的重头戏其实是在它的南边的汉班托塔港。这是一个良港，但是以前因为没有资金翻建，所以没有用好。现在我们帮他们翻新之后，可以停泊十万吨的大船。于是西方就认为，这其中有一个条款就是以后中国海军可以使用这个港口，让其事实上成为我们的一个军事基地。当然这是西方媒体的猜测，但是仍然有一定的可能

性。总之，韬光养晦战略总体上没有放弃，但是在局部有一定的改变。

三是在结盟与否的问题上有一些新变化。现在网上有几种说法值得思考。一种说法就是中国是唯一没有盟友的大国，是最孤独的大国。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首先，所有大国在其所处地区都不受其他国家喜欢，孤独是大国的宿命。在南美大多数国家很讨厌美国，在拉美有这样一句谚语，那就是“拉美的悲剧在于离上帝很远，离美国太近”。而在欧洲，大部分的小国都是害怕德国的。德国人的纪律性很强，所以效率极高，历史上有个说法叫做“普鲁士军官团精神”。一战、二战证明了德国可以对抗英国、法国和俄国这三个欧洲大国，并且不落下风。这时候总是美国跳出来打败德国，所以历史上德国和美国是互不信任的。斯诺登就爆料美国监听德国的计划，后来也有媒体爆料说德国实际上也在监听美国。总之就是欧洲有很多国家惧怕德国，推进欧洲联合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限制德国。现在欧洲联合是各个地区联合做得最好的，叫做欧洲联盟（Europe Union）。那么欧洲联合最早是由法国外长在 1956 年提出来的“舒曼计划”。在“舒曼计划”之前有个政治报告，这个政治报告是巴黎政治学院教授让·莫内提出来的。这个报告明确提出欧洲联合的目的是“把美国人请进来，把俄国人赶出去，把德国人摁下去。”所以德国必须保持战略低调，这样周边国家才能接受它，美国也能够放心。而在东欧，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仇恨俄罗斯；历史上，它们之间的战争也是绵延不断。东斯拉夫国家刚起来，就遭到了西斯拉夫国家的攻击。东欧的许多国家都打过俄罗斯，等到俄罗斯强大之后就反过来攻打他们。波兰三次被瓜分，

每次都是由俄国主导的。如果加上苏德条约，那就是四次瓜分。瓜分完之后，发生了一个“卡廷森林”事件，大家读历史的都应该知道。苏联把当时占领的 40% 的波兰国土内的精英都无理抓起来枪毙，这直接消灭了波兰民族的精粹，这次事件死亡总人数达到 4.3 万人。南亚国家都惧怕印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等国都害怕印度。因此东亚国家都有点害怕中国这是正常的。如果有国家变得突然非常喜爱中国，那我们才需要细细的思考。

第二种就是中国是大国当中唯一一个坚持不结盟的。其他大国都或多或少拥有盟友，但是中国坚持的是不结盟政策。1982 年中共十二大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就在外交政策部分加入了一个词，叫做全方位外交（all round diplomacy）。全方位外交其实就是不结盟外交，因为小平同志曾经讲过过去我们结盟的效果都不好，包括 50 年代的苏联，苏联欺侮中国；六十年代为了同两个超级大国对抗，中国着力拉拢了阿尔巴尼亚、柬埔寨、朝鲜、越南等国，但是这些国家非常贪婪，只要中国的援助一旦减少，它们就立刻翻脸；70 年代中国成为美国事实上的准盟友，但是美国也经常欺侮中国。另外一个就是改革开放不需要结盟，改革开放意味着同所有的国家都发展关系。而结盟只是跟一部分国家结盟，这就意味着亲近某些国家，疏远某些国家，这对改革开放是不利的。第三，结盟有利有弊。好处就是有一个帮手，坏处就是容易被盟友拖下水。中国现在法理上有一个盟友，那就是朝鲜，但是朝鲜实际上总是给我们添乱，给中国外交带来了很多的问题。历史上也有很多大国被它的盟友拖进战争的例子，例如 100 年前的一战就是

两个边缘国家——塞尔维亚和奥地利开始打起来的，但是它们背后的大国俄国和德国被迫卷入，这就演变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基于以上种种考虑，小平同志就决定我们开展全方位外交，不结盟。这一政策一直坚持到现在。

实际上，中国就算不结盟，还是有两个铁杆盟友：巴基斯坦和柬埔寨。这两个盟友能够在任何时候投任何票都跟我国在一起。与此相对的是，俄罗斯和印度在事实上是一个盟友都没有的。但是巴基斯坦和柬埔寨并不是了解和喜爱中国而成为盟友的，而是因为害怕它们的邻居：印度和越南。越南一直想把老挝和柬埔寨统一起来，成立一个印支联邦。因此在柬埔寨国内，“反越主义”盛行。巴基斯坦是因为害怕印度，印度现在的执政党叫做人民党，人民党的党章中这样写到，“巴基斯坦作为一个国家在法理上是没有存在的理由的。”中国是保证这两个国家能够活下去的一个坚强后盾，所以它们乐意同中国结盟。

可以说，从 1982 年开始到现在，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不结盟的，这是一个主观选择。那么现在为什么结盟的声音会起来？第一个原因就是刚才提及的，中国海外利益扩大而保护的手段有限，那么需要盟友帮助我们。第二个就是美国近年来把中国当做主要对手进行打压，积极挑动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和中国对抗。这时候我们就处在一个不利的境地：美国有帮手，而中国没有。特别是碰到菲律宾这样的国家，问题难以解决：菲律宾和中国的实力差距太大，所以中国要是武力打击菲律宾，在军事上肯定是赢的，但是在政治上一定是输的。所以就产生了一个这样的难题：你不打它，那么它不断骚扰

你；你要是打它，政治代价又太大。这时候要是有一个盟友，问题就会好解决一些。

总之，我们的外交形势现在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我们的政策是不结盟，但是形势要求我们结盟。于是我们就提出了“结伴不结盟”的政策，现在中国在世界上不断寻找战略伙伴。习主席访问一个国家，那个国家就成为了我们的战略伙伴，包括最近的马尔代夫。现在中国一共有 70 多个战略伙伴。结盟不符合改革开放的利益，改革开放仍然是我们最大的利益。第二，结盟是有危险的。今年是一战一百年，而现在大家把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同一战时德国和英国的关系比，一个守成大国一个新兴大国，本身矛盾就很大。而且，双方都结盟，最终两个阵营就打起来了。今天的状况是美国在结盟，有很多盟友，大概 60 几个盟友。但是我们国家一个都没有，只有一个名义上的——朝鲜，但其实朝鲜和中国不是一条心，名义上的盟友是假的。而事实上的两个盟友毕竟没有正式化。因此在国际上中国是一个形单影只的独行大侠——熊猫大侠，因此美国还是比较放心的。如果我们和俄罗斯结盟，那就是两大阵营了，那么国际局势就很危险了。所以现在在我看来，我们中央在调整，我们现在有一定的结盟需要，但是我们又不能结盟。于是，我们中国人就突发奇想搞创新“结伴不结盟”，我们结了七十几个伙伴。美国一看伙伴名，怎么还有马尔代夫啊。美国觉得这个伙伴“不值钱”，所以美国很放心。但是我们再看仔细这七十几个伙伴里我们真正想拉近的并不多，大概只有八九个国家。比如说我们正在做工作的：东亚是韩国，韩国如果和我们结成特别好的关系，那么美日韩同盟就化解了，就是在同盟里打了一个楔子，那么这个同盟就

化解了；北边是中俄事实上是盟友了。东南亚想要做工作的盟友就比较多了，一个是柬埔寨，一直关系很好。然后现在重点是泰国、印度尼西亚。也想做马来西亚的工作，但是工作力度差了一点。现在重点做工作的是柬埔寨、泰国和印尼。南亚这方面，巴基斯坦不用说，“巴铁”永远是铁的。现在工作的重点应该是斯里兰卡。我们中国是四个次区域环绕中国，按照顺时针顺序，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东北亚的重点是俄罗斯、韩国。东南亚是柬埔寨、泰国、印度尼西亚。南亚是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中亚主要是两个“斯坦”一个是哈萨克斯坦，一个是乌兹别克斯坦。这八九个是我们事实上要变成准盟友关系的，但是事实上讲，又不是盟友，所以我们称为“结伴不结盟”。这是平衡各种矛盾的一个政策。下面一个最新的政策变化是关于“经济优先”问题。过去三十年我们党的工作重心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因此，外交政策也是为了经济建设服务的。有人总结我们中国一大问题是没信仰，我认为不对，中国人有信仰，中国人信仰 money，“money money go my home 钱啊钱啊到我家”。我们过去三十年的外交政策就是为扩展我们的贸易服务的，过去三十年这样做是对的，对于国家的发展有好处。但是现在有问题了，一个是贸易已经到达市场的自然边界了，再投入也没用了。市场是有自然饱和度的。我们中国 2009 年超过德国出口世界第一，去年 2013 年超过美国进出口总额世界第一。世界上该占有的市场已经被占了，再投入已经没用了。边际效应是递减的。还有就是现在已经占有了巨大的利益，那么现在不是拓展利益而是应该保护利益。还有一个是具体的问题，就是这些年有一些国家跑

来和中国商量能不能给他提供安全保护。这些国家声称，如果中国像美国那样提供安全保护，“那我(其他国家)就和美国‘拜拜’，就跟你‘跑’了”。中国过去是比较犹豫的，都拒绝了——我连自己都没保护好呢。现在我们在考虑是不是要提供这种安全保护。现在在这个问题上由原来的经济绝对优先转向经济安全平衡讨论。最后一个变化是，美国第一还是周边第一的问题。过去三十年的我们国家的外交事实上是美国第一，是有个美国中心主义的。中国外交的总体布局，是四个方面：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和多边国际组织外交。内部的说法是：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我们的外交布局是很全面的，但是实际上，这四个方面都绕不开美国，其实都主要和美国打交道。第五句话是，中美关系是整个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是我们外交的关键。这四句话当中，首先是大国外交，大国外交中最占最大比例的是中美关系，第二别的大国和我们打交道都看美国脸色。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巴西、印度和我们打交道都看美国脸色，美国是主要的第三者。俄罗斯面上独立性比较强，跟美国对立。但是俄罗斯对美国态度是很矛盾的，俄罗斯内心是想和美国好的。但是美国却不理他，他是“单相思”。俄罗斯对中国的怀疑要更深刻一些，“黄祸论”在俄罗斯是很有市场。俄罗斯看美国是近忧，看中国是远虑。因此，俄罗斯拉着中国跟美国闹，不是和中国好，而是为了和美国好。俄国精英层的主流是欧洲派，主张自己的来源是欧洲，归宿也是欧洲。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不认可他，这是俄罗斯的痛苦之处。所以大国关系，美国是主要角

色。周边国家现在是“亚洲悖论”，中国的特点是周边国家特别多，所有国家里中国的周边的国家是最多的——陆上 14 个邻国，海上 8 个邻国，总共 22 个邻国。其中 2 个既是陆上邻国也是海上邻国，一个朝鲜一个越南，这样有 20 个邻国。在大国当中是邻国最多，情况也最复杂，经济差异、地理差异、文化差异、政治差异特别明显。除此之外，现在还有更复杂的情况，这些周边国家绝大部分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而且是经济上越靠中国，安全越是靠美国，是一个精神分裂症的状态。这是一个悖论，经济上靠你，安全上靠他。虽然美国不是我们邻居，但是在周边外交上我们的主要对手还是美国。我们对发展中国家外交也是这样，发展中国家是国际上的多数国家，我们过去和他们发展关系，发现他们的精英基本上都是美国训练的，讲一口很好的英文，用美国的概念，美国的词汇。最后就是国际组织，大部分是美国创立的，由他控制，如，世界银行、WTO、IMF、亚洲银行都是美国创立的。这样一来的结果就是，我们力图把外交设计的很全面，但是在真正实践过程中都离不开美国。因此，中美关系是中国整个外交的重中之重。过去几十年来一直这样做延续下来。但是现在情况变了，因为中国新一任的领导人习近平非常有进取心，他不希望永远被动，他希望外交上主动。在过去我们以美国为主，等美国出牌然后我们应对，这样我们就无从主动。所以现在我们有新的思路：提升周边外交的地位。而且以我为主重新塑造周边，在这个基础上和美国打交道。这个今年以来是比较明显的。去年 11 月 24 日到 25 日，召开了周边工作中央工作会议，大意是提升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当中的地位，多投

入资源，并且协调好。这次会议的精神从今年开始实践。今年习近平主席出访周边多国，对周边国家特殊重视。出现了点对点的外交，比如去韩国、去蒙古一对一访问，因此韩国、蒙古很高兴。而习主席访问大国一定是在一次出行当中的一站，去德国、美国、俄罗斯、印度都是这样。这样一来，小国反倒是特别凸显。

做个小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新中国外交的一大转折，大转折当中有一个小点，今天是另一个点，现在具体发生的就是我今天列举的四个变化。中国外交就讲完了。

（二）周边局势

接下来我讲讲周边局势和一些问题。中国怎么定义，what is china? 有很多定义法，我在这里说一个非常简单的定义，中国从规模上讲是一个超大型国家，这个是理解中国很靠谱的一条路。用一般的大国，big power 来形容中国是不准确的。应该叫超大型国家，super size territory。我们大到什么程度：地理上我们和整个欧洲差不多大，人口是整个欧洲的两倍，计生委数字是大陆有 13.6 亿人口，农业专家从粮食消费推算出大概有 14 到 14.5 亿人口。这是什么概念呢，把俄罗斯的所有亚洲部分算个欧洲是 7 亿人口。所以是超大型国家，超大型国家在国际安全上，国际政治上是很难被击败的。只要自己内部保持团结，保持一个正常的政治状态，这个国家是外力很难击败的。所以中国只能是自己击败自己，历史上外族入侵的前提都是中央王朝内部有问题，内部崩溃了，这时候外敌入侵发挥作用。如果这个国家保持正常，外敌是没有办法的。块头太大，大到一个中等国家日本累死了，我们中国还活着。中美两个国家是外敌不能击败的，只能自己击败自

己。这就是超大规模事实上是比较安全的，只能自己击败自己。因此中国的问题只能归三类，第一类问题纯属中国大陆的问题，这对中国是最重要的。比如说不能发生党内高层分裂，不能发生很大的权力型危机。不能发生全局性的经济危机，比如说像美国那种金融危机，不能出现大规模流血的群体性事件。还有大的核灾难，比如说切尔诺贝利。对于中国这种超大型国家来讲就是把这些处理好。第二类就是外部挑战，不要在成熟的时候和外面搞冲突。第三个是中国很特殊的问题，就是各种独立运动，世界上有些国家有，有些国家没有，比如日本就没有。我们国家不仅有而且比较多，我们现实就有台独、藏独、疆独和新兴的港独、蒙独都出现了，现在在美国出现了南蒙古运动。这些就是我国现在大致的问题分布，因此最重要的就是内部问题。

今天我就重点讲外部问题，又分两类，就是未来十年我们要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处理好与大国的关系，特别是美国，一个是要处理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其他的还有我们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在我们国力允许的情况下，在代价和收益相等的情况下承担国际责任。另外还要保护好海外利益。总之未来十年我们国家的外交事务是这几个框架，是基本的四大任务。其中矛盾比较突出的就是中国周边，周边未来主要有三个问题要处理好。第一是中日关系要处理好，不要真打起来。第二，朝鲜半岛要处理好，因为朝核问题也是重大危险，不要把我们卷进去。第三个就是海洋争端，东海、黄海、南海都有问题。当然我们周边不止这三个问题，比如中印边境比较紧张，以及我们西边的几个斯坦，由于管理差，恐怖分子经常往那里跑，

而又抓不着，结果就到我们新疆来了。中印问题比较小，不会闹大。东亚和中亚的渗透，都是小规模的不是大规模的。在周边三个问题中目前看来比较突出的是中日关系。我刚才讲，中国被四个次区域包围，东北亚、东南亚、中亚、南亚。东南亚只是一块，对于整个周边外交他是比较小的一块。而且总体来讲中国东南亚形势算好的。我们周边三大问题，有两个都在东北亚。跟东南亚有关的主要是海洋问题，主要是南海问题，与东南亚一部分国家有争端。那么在三大争端中，目前看来比较尖锐的是中日争端。

1. 中日争端

总的来说，中日情况是这样的：中日关系从 72 年中日建交开始，主流是好的，不能因为现在不好就否定过去。这 42 年间中日经贸关系很好，很长一段时间日本是我们第一大贸易伙伴。现在日本排到后面去了，第一大贸易伙伴是欧盟，第二是美国，第三是东盟，第四是日本。我们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经贸关系总体是很好的。相当多时候，日本是我们第一大直接投资国，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而且日本的投资质量是可以的，给我们带来了技术、管理经验、品牌、市场渠道。除了一般的贸易投资还有 ODA，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一共给我们 350 亿美元。总的来说，中日经贸 40 年是成功的，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现代化是有帮助的。另外中日人文交流也很好，学到不少东西，培养了不少人才。还有中日在国际上合作也是比较多的，比如有 1990 年中日联手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当时，如果越南一直在柬埔寨不走，中越关系会更紧张。另外东南亚国家和越南关系也不好，东盟就不会扩大，这样东南亚

的局势也会紧张。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好，中国和他们的关系也就会好，是一个互动的结构。越南事件，日本发挥了积极作用。再早一点，89年的时候在中国发生六四事件，中国在国际上是很不利的，西方孤立中国。在中国打破孤立的过程中，日本是起了作用的。这些都是42年来的事实，不管我们多么不喜欢日本，都要正视，历史就是历史。

在此之后，日本执政者反过来又需要维持中日关系紧张，这样它才能长期执政，才能实现右翼的政治抱负：让日本正常国家化，其代表就是现在的安倍及其小伙伴。2010年中国超乎大家想象、快速地超过了日本（这与金融危机有关，没有金融危机中国超越日本的时间要晚一点，因为金融危机爆发，日本遭受重创，我们虽然也受了轻伤，但还不是十分严重，本来按照正常情况，中国超越日本应该是2020年），在超过日本之前，中国还有一些表现：2008年北京奥运会，2009年国庆大阅兵，2010年上海世博会，一年一件大事。再加上中国应对危机也不错，比如：汶川大地震、金融危机……在这些事情都处理得不错的情况下，GDP跃居第二对于世界的震撼还是蛮大的。我们的国内舆论倾向于贬低我们GDP世界第二的意义，但是外界实际上是非常震撼的，其中日本尤其如此。日本对中国有两个别的国家没有的集体心理：一个是对中国的种族主义，一个是对中国的犯罪感。过去一百多年，日本的工业化搞得非常好，在全部的非西方国家中排第一，而日本的精英层因此把日本对于周边国家形成的一段时期的技术优势认为是日本文明永恒的优势。这就出问题了，形成了种族主义，他们认为有些事情只能日本人干，别的国家是干不了的。而新的现实是：日本

人能干的事现在韩国人、中国人都能干了，这个时候日本就开始困惑、开始全民焦虑，就开始保守化、右翼化，反过来就加剧了中日紧张。第二个是犯罪感，日本绝对清楚过去一百年日本对中国所犯的罪，中国的两次现代化努力都被日本打断了，一个是洋务运动，被甲午战争打断；一个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十年发展国民经济，被全面侵华打断。它知道他是犯罪，而不是犯错误。在这一点上中国总让日本承认错误实际上是不对的，日本犯的是死罪，所以它不能承认，一定得否认到底。这是日本对中国的两个心理导致它不能接受中国崛起。这也是中日关系发展的基本历史逻辑：中国崛起很快，日本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无法面对这个事实，中日关系陷入紧张，焦点就在钓鱼岛。钓鱼岛问题上我们是大制衡，一方面我们是给出路的，只要安倍先生在正式场合表态承认钓鱼岛有争议，愿意和中国一起搁置争议，钓鱼岛问题就有缓和。如果不承认，那我们就采取手段对付日本。目前我们的对抗措施还是很多的，直接对抗措施包括：每个礼拜派海警船到钓鱼岛12海里去巡航，打破日本单边控制；宣布了防空识别区，在空中对日本施加压力；东海油气田有些井开始开气了，也是给日本施加压力。间接措施包括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舆论战、一定的军事威慑……总体来讲，在钓鱼岛问题上，我觉得我们是不落下风的。现在日本是想缓和关系，私下沟通。目前两国外交正在紧密接触，11月份的APEC会议，中日之间有可能会有所缓和。但我刚才讲过，未来一段时间内，至少五年内中日关系可能还是不好的，因为一百年来日本形成的集体心理是很难短时间改过来的。中日关系的基本出路还是中国的发展，发展力量达

到一定程度之后日本就老实了。

2. 朝鲜问题

朝鲜的情况也很复杂。大致情况是这样：冷战结束后朝鲜内外都很困难，我们认为改革开放是一条活路，它不干，它走核武器化道路，它认为有了核武器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但中国不干。这是现在的矛盾焦点所在。当然它的内外交困跟我们没有关系，是由于自己导致的。目前而言，朝鲜半岛还是有些危险的，美国现在忙不过来，再加上中国还是有些护着朝鲜，一旦美国别的地方收拾干净了，它就有可能过来收拾朝鲜。

除了日本和朝鲜这些东北亚的问题，东南亚方面未来的问题主要是海洋问题。

3. 海洋问题

未来十年，中国的海洋问题一定是很突出的。大背景也和中国崛起有关。中国崛起要走向海洋，但是美国是海洋霸主，日本是海洋国家，他们都会阻挡我们走向海洋，因此大家会看到更多的摩擦，这是必然的。针对海洋问题我们目前的基本政策还是小平同志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只不过在“搁置争议”方面我们的手段比以前多了。比如对日本，我们进行军事威慑，这是十年以前难以想象的，十年前中国的海空军都是不如日本的，而现在空军、二炮都是有优势的；经济上我们也可以威慑它，通过威慑控制日本不让它冒险，继续搁置争议下去。现在我们在南海的力量更强一些了。我们一定要明白，这是未来一定会面临的问题，我们的总方针不是打，而是利用我们强大的军力为后盾，运用科技力量、工程力量去扩展我们的存在。

这是我们周边的三大问题。中美关系就提两句，我刚才也讲过这是我们未来外交的

大问题之一：处理好和现在国际组织一把手的关系，我们得承认美国还是现在国际社会的一把手——“党委书记”，我们是刚提拔根基未稳的“党委副书记”，关系难处。美国现在对我们很警惕，搞了一个“亚洲再平衡”战略，总体来讲就是美国主观上认定中国是主要对手，然后把全球战略的重心从欧洲移到亚洲，从大西洋移到太平洋。那么中国如何应对呢？中国现在提出一个方针就是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它的定义很简单，但内涵非常丰富，十四个字，三句话：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但是客观上，美国现在还忙不过来，面临比如乌克兰、ISIS 等问题。中国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这其实也是符合美国的想法的，因为中美都是超大型国家，一旦打起来绝对是人类的灾难，所以美国首先承认要跳出历史上老大老二必有一战的历史悲剧，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这是回应了习主席提出的“不冲突、不对抗”，但后面两点“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美国虽同意其原则，但很多细节还是未能达成共识。由于中国的发展，中美之间的摩擦面增加，但同时合作点也会增加。两国的关系更像一段“感情不太好的婚姻关系”，未来十年中美关系会遇到很多麻烦，但我个人相信会处理好。

最后评价一下乌克兰事件。乌克兰事件将影响未来一段时间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时间关系，在此讲一个结论：乌克兰事件一定会让未来五年的俄美关系非常僵，他们主观上会避免热战和冷战，但两国之间存在严重的感情伤害。这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个机会。

以上是我对于当前世界重大事件的看法和个人解读，希望能对大家理解国际形势有所帮助。但是学界也是多元的，存在很多

不同意见，我是一家之言，谨供大家参考。

[整理：刘志、杨雪、赵姝婧、王燕]

[校对编辑：宋一宁]

[责任编辑：王 燕]

· · · · · · 伊斯兰恐惧症 · · · · · ·

“伊斯兰恐惧症”简称“恐伊症”，是一种将各种涉及穆斯林社会问题和公共危机归结为“伊斯兰威胁”的思维定势。“恐伊症”认为伊斯兰教与其他文化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念，是一种暴力政治意识形态，并声称伊斯兰教信仰本质上是“反西方”和“反现代化”的，认为穆斯林是潜在的“麻烦制造者”。2001年，在斯德哥尔摩（Stockholm）举办的“与不能容忍行为作斗争”国际论坛会议将“伊斯兰恐惧症”认定为宗教不容忍和仇外心理的形式。

恐伊症流行于20世纪80年代，一方面是西方自中世纪厌恶、鄙视穆斯林的文化传统的某种延续，另一方面是当代美欧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遭遇危机时社会思潮激进化的表现，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全球宗教政治化和政治宗教化。

资料来源：何建宇：《美国霸权的演进与“伊斯兰恐惧症”》，《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4期。

[整理：江昊宇、唐铭兴]

莫尼斯与自由主义民主

曹 钦*

当地时间 12 月 15 日上午, 澳大利亚悉尼市的一家咖啡馆内发生了人质劫持事件。警方于 16 日凌晨攻入咖啡馆并击毙劫持者, 结束了此次事件。包括劫持者在内的 3 人死亡。从劫持发生的场所、所持续的时间和造成的伤亡来看, 这次事件并没有特别的引人注目之处。它与“911”、2004 年马德里恐怖袭击事件、2005 年伦敦地铁爆炸案、较为晚近的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和中国近年来遭受的恐怖主义袭击是无法比拟的。然而, 这次事件中的主角身上的一个细节, 却是值得玩味的。

据报道, 劫持者莫尼斯是于 1996 年以难民身份从伊朗来到澳大利亚的, 而他移民的理由则是“政治避难”。按照人们的一般印象, 因为在“专制国家”受到迫害而迁居“民主国家”的人, 似乎理应热爱那种接纳了他的制度。然而, 莫尼斯却完全没有表现出这种情感。他不仅利用了法律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去宣扬极端思想, 最终更是以实际行动向那种包容了他的制度发起了挑战。(讽刺的是, 那个据说在 20 年前曾经迫害过莫尼斯的伊朗政府, 在事件发生后特地发表声明, 表示对他行为的谴责。)但就是这样一个对自己所处国家充满敌意的人, 在身背多项法律指控的情况下, 仍然能够享有充分的表达与行动自由, 并利用这些自由造成了悲剧性的后果。

如果一个政府的组织方式是建立在特定政治原则之上的, 那么, 对于反对这种原则的公民或臣民, 它能否对其加以限制和惩罚? 对极权主义国家或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来说, 这根本就不成其为一个问题。对异见者的迫害虽然可能招致内部反抗和外部批评, 在逻辑上则是完全自洽的, 因为在它们的立国原则中, 并不包括对不同意见的宽容。然而, 对于以自由主义民主为立国原则的西方国家来说, 异见者的存在就构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这类国家当政府不能单凭自己的专断意志去镇压反对派, 否则就背离了自身存在的理据。但它们也不能毫无原则地对任何人都采取包容的态度, 否则就有自掘坟墓的危险。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断头台与灯柱是一个极端, 被纳粹颠覆的魏玛共和国是另一个极端。

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维持平衡, 并不是一个仅仅依靠学理论证就可以完成的任务。这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要仰仗于实践智慧。莫尼斯所造成的这一出悲剧, 或许是为保障公民权利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或许是过分张扬公民权利所酿成的一系列严重后果的开端。对此, 我们无法单靠理论推演而做出预测。人们也许在几个月后就会淡忘这次事件, 但它所反映出的问题, 却始终会是笼罩在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头上的一片阴影。

2014 年 12 月 22 日

[责任编辑: 杨至远]

* 曹钦, 男,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讲师。

亚太二元格局下的中日关系：分析与展望

王晨光*

摘要：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崛起和美国的相对衰落使亚太地区呈现出经济中心与安全中心相分离的二元格局。在此格局下，中美、中日之间分别面临着“权力转移”的矛盾，为此美日加强了遏制中国的同盟，因此中日关系在短期内难见起色。但在“历史的惯性”下，亚太二元格局将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日本极可能基于国家利益而调整亚太战略，改善对华关系。中国应该把握亚太局势，抓住历史机遇，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和“中日新型大国关系”，为实现和平崛起和民族复兴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关键词：中国崛起；亚太格局；中美关系；中日关系

近年来，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中日关系的热度降到了建交以来的冰点。但日本既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又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从中国“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的外交布局来看，正确处理中日关系无疑是中国实现外交战略利益，构建和平稳定国际环境的重要一环。当前，中日关系的恶化不仅受到历史性因素的影响，更体现了国家实力变化、国际格局变迁下潜藏着的国家利益冲突。在此，本文试图从中国崛起背景下亚太地区呈现出的经济中心和安全中心相分离的二元格局出发，就当前中、美、日三边关系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变化作出展望。

一、亚太地区经济-安全二元格局

冷战之后，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全球权力分配格局中处于史无前例的最佳位置。“但实力与地位的巅峰状态并没有使美国将‘单极时刻’转化为‘单极时代’”，“9·11”事件和 2008 年金融危机使美国成为“失势的霸权”，^①中国的快速崛起更对美国主导的亚太秩序形成了挑战。对此，有美国学者认为，美国处于和中国共享均势的东亚大国地位，^②中国主导的东亚大陆与美国主导的东亚海域大致均衡。^③赵全胜则指出，亚太国际关系中出现

*王晨光，男，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

① 吴心伯等：《转型中的亚太地区秩序》，北京：时事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8 页。

② 本文认为，“亚太”所囊括的地理范围与国际行为体与“东亚”基本相当。当前，“东亚”和“亚太”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复杂甚至纠缠不清。东亚一般来说包括传统的东南亚和东北亚，主要有东盟 10 国加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蒙古以及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但随着域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介入，东亚概念的边界被刻意模糊化，如 2011 年 11 月的东亚峰会上，除东盟 10 国加中日韩俄外，美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参与其中。与东亚相比，“亚太”是一个边界弹性更大，内涵更为灵活且处在发展中的、动态的概念，其重要性的上升与美国的推动有很大关系，因为借助于“亚太”，美国可以十分自然地参与到与东亚国家相关的合作进程中去。对于“亚太”这一概念的发展变化以及与“东亚”的关系，参见林利民：《未来 5-10 年亚太地缘政治变局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2012 年第 4 期，第 8-15、62 页；周方银：《大国的亚太战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8 页。

③ Robert Ross,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4, Spring 2004, pp. 81-118.

思维误区，面对纷繁复杂的亚太局势，除了继续提升自身实力外，更需要提高在战略规划、战略执行、战略运作等方面的能力。

2014 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一百二十周年。回溯历史可以发现，1894 之后中日在东亚地区领导权的异位，奠定了百余年来两国间“日强中弱”的关系。又值甲午之年，面临更为复杂的权力转移，中国应该把握亚太局势，抓住历史机遇，以更高的智慧构建起“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和“中日新型大国关系”，为进一步实现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构建有利的亚太格局和国际环境。

[责任编辑：姚丽丽]

[校对编辑：董作壮]

托马斯·谢林

【编者按】威慑理论被誉为“20 世纪国际关系领域最重大、深奥的学术创造”，而博弈论在威慑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二者的联系领域贡献最为突出的人物，非托马斯·谢林莫属。这位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以其跨学科的视角，“通过博弈论分析改进了我们对冲突和合作的理解”，并因此荣获 2005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本期《国关人物》，让我们共同走进这位学者，感受经济学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完美结合。

学者简介

托马斯·谢林 (Thomas Schelling)，现任美国马里兰大学 (University of Maryland) 经济学特聘教授，美国著名学者、经济学家，外交事务、国家安全、核战略和军备控制领域的研究专家，有限战争理论的奠基人之一。1944 年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学士学位，1951 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58 年被聘为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1969 年加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 (the 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是该院知名的政治经济学教授，1992 年当选为美国经济学联合会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会长。曾获得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著名的弗兰克·塞德曼杰出成就奖 (the Frank E.



Seidman Distinguished Award)，并因其在“防止核战争行为研究”领域的杰出成就获美国国家科学院奖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Award)。2005 年，谢林因“通过博弈论分析改进了我们对冲突和合作的理解”而与罗伯特·奥曼 (Robert Aumann) 共同荣获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托马斯·谢林教授人生阅历丰富，学术研究面广，各项成就斐然。曾为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国务院、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耶鲁大学和兰德公司等机构工作或担任顾问。谢林是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思想主张超越了传统经济学的经济理性假设，突破了经济学理论数学表示的传统方法，开创并发展了“非数理博弈理论”。他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除经济学理论外，还涉及军事战略和军控、能源和环境政策、种族隔离和种族融合、冲突和讨价还价理论以及国家政策和商业战略中的道德问题等等。可以说，谢林是一位制度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大师级人物。

托马斯·谢林教授的主要著作有：《冲突的战略》(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战略与军控》(Strategy and Arms Control, with Morton H. Halper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und, 1961)、《武器与影响》(Arms and Influe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Micromotives and Macrobbehavior, W. W. Norton and Company, 1978)、《选择与结果》(Choice and Conseque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等。

一、威慑理论的发展历程*

威慑 (deterrence) 作为一种行为方式和政策手段, 古已有之。但作为一种系统的战略理论和主导性军事政策, 威慑却是随着核武器的出现和冷战的开始而产生, 并首先在美国形成和发展起来。战后威慑理论正如罗伯特·杰维斯 (Robert Jervis) 所说, 呈现“波浪形发展”的特点。概括来讲, 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1945 年至 1955 年的“早期阶段”; 1956 年至 1969 年的“黄金时代”; 1970 年至 1989 年的“第三次浪潮”; 以及 1990 年后的冷战后阶段。

(一) 早期阶段: 威慑思想形成阶段 (1945-1955)

第一阶段, 虽然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的爆炸震惊了全世界, 但威慑理论的发展并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系统的威慑理论尚未形成, 但以贾可布·维纳 (Jacob Viner)、伯纳德·布罗迪 (Bernard Brodie)、凡纳瓦·布什 (Vannevar Bush) 以及威廉·波顿 (William Borden) 等为代表的学者敏锐地意识到了核武器对世界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 伯纳德在其早期提出的核威慑思想中试图运用冯·诺依曼 (John von Neumann) 的两人零和博弈最小最大准则来强调“理性”, 其他学者也开始在核威慑分析中使用博弈论 (Game Theory) 的方法。从现在反思威慑理论的发展过程来看, 这一阶段的著作数量虽少, 质量却很高。

(二) “黄金时代”: 威慑理论成熟阶段 (1956-1969)

所谓“黄金时代”, 也就是威慑理论研究的繁荣期, 其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大量相关著作的发表。在这一阶段, 威慑理论研究的基本内容、主要对象和重要议题被确定下来, 该理论的一套独特的学术概念和学术语言也由此形成。这一时期的威慑理论主要是通过理论演绎方式推导出来的, 而不是通过历史归纳方法总结出来的。由于正处在冷战最紧张的时期, 威慑理论的核心内容便自然指向了如何解决美苏之间的核冲突。威慑理论研究对博弈论的强烈需求推动了早期博弈论的发展, 催生出了后来非常有影响力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 和“斗鸡博弈”(Chicken Game) 等经典博弈模型。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托马斯·谢林、阿尔伯特·沃尔斯泰特 (Albert Wohlstetter)、赫尔曼·康恩 (Herman Kahn)、亨利·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 等。

(三) “第三次浪潮” (1970-1989)

在经历了“黄金时代”的喧嚣之后, 理论界开始对此前形成的大量概念和伦理学说进行反思和深化。首先是对研究方法的批判, 批评者认为, 此前单纯运用演绎推理方法进行研究的做法将复杂的威慑过程简单化、概念抽象化、理论一般化了, 这势必会忽略许多重要的因素, 不能满足解释、指导和预测现实的需要, 因而必须将演绎推理与经验研究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其次是对理性的批判, 批评者分别从理性概念的文化背景、官僚机构的非理性特征、决策者进行完全理性决策的障碍这三个方面, 对先前的理性假设进行了反思。主要学者有罗伯特·杰维斯、亚历山大·乔治 (Alexander George)、理查德·什莫克 (Richard Smoke)

* 本部分内容, 参考了徐瑶:《威慑理论的发展与评析》,《理论界》,2013年第9期,第169-171页;吴苑思:《美国核威慑研究在历史上的三个发展阶段》,《美国问题研究》,2001年(年刊),第258-284页。

等人。

(四) 冷战后威慑理论的发展 (1990 至今)

冷战后, 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威慑现象有了新的特点。威慑不再仅仅局限于“核威慑”的范畴, 常规武器在军事革命中的高技术化使得“常规威慑”研究开始兴起。这一时期, 威慑理论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在经验研究上, 学者们在这一时期继续进行经验研究的工作, 探究常规威慑得以成功或失败的条件。在方法论上, 学者们通过发挥博弈论方法的强大逻辑推理功能、将博弈论方法与个案研究方法相结合、运用认知心理学视角等方法, 为博弈论方法的运用开辟了新的领域。

二、谢林的威慑理论

(一) “可信承诺”与“核恐怖平衡”

通过对博弈论的运用, 谢林为威慑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方法,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与传统核裁军理论不同的观点。传统的核裁军理论主张国家通过裁减核武器、开放核设施等手段减少对手的敌意, 以防止遭到对手的突然袭击。而在谢林看来, 核裁军并不一定会导致战略的稳定, 而一定程度上的核军备竞赛也不一定会导致战略的不稳定, 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核裁军, 而在于让对手相信本国没有首先攻击对手的动机。为此, 国家应尽力做出“可信承诺”(credible commitment), 以减少对手的猜疑。在这样的要求下, 主动地向对手透露一些相关信息, 将有利于降低对手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性。

谢林认为, 要想使对手放弃发动突然袭击, 其最有效的办法便是消除对手首先发动突然袭击的优势, 使对手认识到这样的冒险将不会得到任何好处。因此, 威慑的成功与否, 并不取决于本国当前所具有的毁灭对手的能力, 而是取决于本国在经受对手打击后还能具有的毁灭对手的能力, 也就是报复能力(retaliatory capability)。在威慑行为中, 报复能力比抵御攻击的能力更加重要。在任何一方都不具备一次性毁灭对手还击能力的前提下, 一国只有保护好本国具有报复能力的武器, 其威慑才会真正发挥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 “核恐怖平衡”(balance of nuclear terror) 才是防止核大战的唯一稳定的有效机制。

(二) 非数理博弈理论的创建

主流的数理博弈理论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范式, 几乎所有的现代经济理论都是在博弈论的框架内产生和完善的。在博弈论的发展过程中, 以约翰·纳什(John Nash)、约翰·豪尔绍尼(John Harsanyi)、莱因哈德·泽尔腾(Reinhard Selten)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坚持采用数学语言和公理化的方法进行科学研究, 而谢林却独辟蹊径, 开创了非数理博弈理论(Non-Mathematical Game Theory)这一新的领域。谢林认为, 在双方或多方相互影响的情况下, 博弈是不可能通过建立模型的方法加以表述和研究的, 因为决策主体的期望与行为无法通过纯粹的逻辑和数学的推导而得。因此, 混合动机博弈的决定因素与其说是数学的, 不如说是经验的, 其参与者在选择自己的博弈战略时, 不仅会有数学上的考虑, 还会考虑到创造声誉、

沿袭传统、建立自信、显示大度等许多非数学因素。非数理博弈理论正是基于这种更接近现实的观察而得出的。谢林运用其优美的语言和尽可能少的模型，而非严格的逻辑论证，将他的理论通过实际应用分析的形式表述出来。

非数理博弈理论分析的是这样一种状态下的社会和经济行为，即每个参与者的行为取决于他是如何预期其他人将如何应对他的行为的，而其他人对该人将如何应对他们行为的预期也同样会影响到其他人自身的行为。谢林建构了一套概念框架来描述这种相互预期的困境，并借此将各种零散的理论整合在一起。非数理博弈理论不仅应用于经济学的研究之中，还对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及国际关系等其他领域的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而发展成为社会科学的经典理论。

（三）非数理博弈理论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应用

谢林最有影响的一个贡献，就是他将非数理博弈理论成功地运用于国际关系的研究之中。在《冲突的战略》一书中，他运用博弈理论对国家间的讨价还价（bargaining）和冲突管理理论做出了具体的分析。谢林所说的“讨价还价”实际上是一种非零和博弈，指博弈的一方通过自身的努力，影响对手的行为以避免双方的两败俱伤。在效率曲线上，博弈双方的利益是相互对立的，没有帕累托改进（Pareto Optimality）的余地（即任何一方的趋向自身利益的变动都必然会损害到另一方的利益），但这种对立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可能，在效率曲线上的所有点中，必然存在着一个使博弈双方利益一致的点，这一点即为“聚焦点”（focus point），也称“谢林点”（Schelling Point）。在博弈过程中，双方避免两败俱伤的共同想法，就体现在他们试图在效率曲线上找到这个利益一致的点，并通过公开的讨价还价以达成最终协议。而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的直觉，而不是逻辑的思维推理。从这一点上来说，有人将谢林的理论归结到自由主义的理论阵营之中，并非没有道理。

三、对谢林贡献的评价

（一）《冲突的战略》

“谢林教授的《冲突的战略》一书理性地分析了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即当今流行的国际威慑政治学。此书语言清晰易懂，颇富吸引力。在该领域，作者的分析超过了此前的所有相关学者。在众多的国际威慑政治学著作中，《冲突的战略》无疑是迄今为止最优秀、最具说服力和最精彩的一部。”

上面这段话是《美国科学院年鉴》对《冲突的战略》一书的评价，该书是托马斯·谢林教授为我们带来的一部国际关系威慑理论的巨大宝藏，被认为是1945年以来西方最有影响力的100本书之一。书中发展出来的最重要的思想是关于“可信承诺”在冲突或谈判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的探讨。这一思想最早源于他的一篇名为《论谈判》的论文（1956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后收入本书，成为第2章的内容），其基本内涵是：在谈判和冲突的过程中，博弈一方以可信和可观察的方式限制自身的某些选择自由的做法会提升自身的谈判地位，而

赋予自身相机决策权的做法却反而可能伤害自身的利益。

在《冲突的战略》一书中,谢林首次定义并阐明了威慑、强制性威胁与承诺、战略移动等概念,开始把关于博弈论的洞察力作为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用来研究社会科学问题,并对讨价还价和冲突管理理论作了非常细致的分析。其中讨价还价理论是谢林早期的主要贡献所在。尽管当时谢林并没有刻意强调正式建立模型的问题,但是他的很多观点后来随着博弈论的新发展而逐步定形,而他所定义的这些概念也成为了博弈论中最基本的概念,比如,完美均衡(perfect equilibrium)概念中的不可置信威胁(incredible threat)就源自谢林的可行均衡(feasible equilibrium)概念。

(二) 走向现实的博弈论

《冲突的战略》一书中所阐述的原则几乎可以用来研究世界上的一切冲突情势,从孩子们的游戏到核大国之间的对抗,只要有可能存在对双方都不利的结果及一方实现其目标的能力依赖于另一方所做出的决定,非数理博弈理论都可以对其做出解释。托马斯·谢林以博弈者的眼光观察世界,将权力、制度、文化等要素在博弈论的分析框架之内统一起来,自由地游弋于日常现象与深奥的真理之间,使我们能更客观地比较各个流派的优点与不足。他真正将博弈论从抽象的数学王国带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使之成为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以及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强大工具。

在一篇庆祝谢林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文章中,迈克尔·金斯利(Michael Kinsley,《华盛顿邮报》的一位专栏作家)以及一位谢林以前的学生有趣地总结了托马斯·谢林所重新定义的博弈理论:“你正站在悬崖的边缘,和另一个人的脚踝捆在了一起。你们两个被捆在一起脚将会被分开,而且只要你们其中的一个人让步,另一个人将会获得一份很诱人的奖赏。那么,你将如何说服另一个人放弃这份奖赏呢?答案是:你开始跳舞,并且越来越靠近悬崖边缘。这样,你并不需要让他认为你将会做出一些完全不理性的行为——将他和自己一同带下悬崖,你只需要让他相信:你已经准备好了采取比他想采取的行动更高风险的行动。如果你这么做了,那么你将赢得这场游戏。”

四、谢林的其他成就*

(一) “谢林隔离模型”

在谢林看来,人类生活在一个相互关联的网络之中,个体的选择与行为常常要取决于他人的选择与行为。换言之,在个体与其所生存的环境之间存在着一个“互动的体系”(system of interaction)。在这个互动体系中,个体的选择与行为完全指向其自身的利益,这使得互动的结果往往“十分令人吃惊”:为什么听讲座时,人们都会不自觉地坐到后排?为什么电

* 本部分内容,参考了瑞典皇家科学院 2005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背景资料:《罗伯特·奥曼和托马斯·谢林对博弈论的贡献:对冲突与合作的分析》(朱小斌、夏国风译),载于《外国经济与管理》,2005 年第 11 期,第 12-31 页;闫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百科全书式”的经济学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 年第 6 期,第 131-134 页。

话会接连不断？为什么交通事故会导致比人们所预想到的严重得多的交通堵塞？在《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一书中，谢林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许多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模型，这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谢林隔离模型”（Schelling Segregation Model）。

通常人们会认为，隔离是同压迫联系在一起。但是在发达国家，尽管人们采取种种方式消除隔离，并且也并不存在人为的压迫，但隔离现象却依旧存在，这又该如何解释呢？在谢林看来，即使所有的个体都足够宽容——他们或许并不反对与不同文化、宗教或肤色的人居住在同一个社区，这也并不能消除城市中存在的隔离现象。因为在个体看来，他们的邻居中必须至少有一部分是和自己特征相近的人。如果这个条件不能得到满足的话，他们将不得不迁出社区，去寻找那些和自己特征相近的群体。因此，如果社区内某个群体的规模持续下降，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Domino Effect），最终导致这个群体的成员全部迁出社区，原先各种族平安相处的社区就会变成一个“种族隔离”的社区，这就是著名的“谢林隔离模型”。这一模型表明，人们在微观层面上的细微偏好会导致宏观层面上的极端后果。

（二）人类的自制现象

谢林还对人类的自制现象进行了研究。谢林注意到，人们经常会做一些自己本来不愿意做的事情，比如吸烟、酗酒、锻炼不足、花钱大手大脚等。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自制的限度以及与此相关的公共政策问题，并指出：可信承诺对个人内心冲突的重要性并不小于其对人际冲突的重要性。近年来，随着行为经济学的兴起，自制的限度等问题已经得到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此外，谢林在能源和环境政策等领域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此不再赘述。

总之，托马斯·谢林——这位“游侠经济学家”（正如谢林自称的那样）——已经成为一名卓越的思想开创者。由于研究领域的广泛性，谢林常常会成为不同学科的争论焦点。为此，谢林往往这样澄清自己的身份：“有人以为我是一位社会学家，有人以为我是一位政治学家，实际上我只不过是一位经济学家。”

[整理：缴懿鑫、唐铭兴、李萌、马刚]

[责任编辑：宁鹏举]

虚构 IR 与想象：高阶叙事方法

朴成俊*

内容摘要：在国际关系 (IR) 领域，叙事方法以及一种替代性的写作方法在近期的学术研究中已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自传式民族志 (autoethnography) 和自传 (autobiography) 可作为最重要的例证。本文致力于通过引入虚构 IR 概念来推动这一学术研究的发展。虚构 IR 与如何在 IR 中运用想象有关。我认为虚构写作可以作为一种处理信息缺乏和偶发事件频发的方法。虚构 IR 远非阅读和运用虚构作为一种参考来源或分析手段所能涵盖。虚构 IR 能将虚构写作与 IR 研究相结合。这样做的好处之一在于可以用一种更为灵活和富有想象力的方式清晰地表达敏感和复杂的问题，从而最大程度地发挥故事和想象的作用。应该指出的是，最关键之处在于创作虚构的作品；而非创作有关虚构的作品 (the focal point is to write fiction; it is not to write about fiction)。为支持这一提议，本文提供了一个虚构事实的短篇故事。通过运用想象，创造人物形象，结合虚构叙述的数据或者自身经历，我相信更为新颖和引人共鸣的 IR 创作就是可能的。

引言

在国际关系领域，叙事方法和更宽泛意义上的替代性写作方法在近期的学术研究中正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这篇文章旨在通过引入虚构 IR 概念来推动这一学术研究的发展。虚构 IR 与如何在 IR 中运用想象有关。在部分上，这篇文章的初衷是作为对 2010 年《国际研究评论》论坛上关于自传式民族志与 IR 论文的一种回应。我认为虚构写作可以作为一种处理信息缺乏和偶发事件频发的方法。虚构 IR 远非阅读和运用虚构作为一种参考来源或分析手段所能涵盖。虚构 IR 能将虚构写作与 IR 研究相结合。它不仅有助于更为深入地思考相关概念，如事实、现实和真理，而且也能和在 IR 研究中运用虚构写作相结合。这样做的好处之一在于可以用一种更为灵活和富有想象力的方式清晰地表达敏感和复杂的问题，从而最大程度地发挥故事和想象的作用。应该指出的是，最关键之处在于创作虚构的作品，而非创作有关虚构的作品 (the focal point is to write fiction, it is not to write about fiction)。创作虚构的作品并不等同于创作有关虚构的作品 (Writing fiction is not the same as writing about fiction)。

这篇文章最终致力于探究事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我们怎么知道某件特定的事是事实呢？在多大程度上事实和虚构是相纠缠的？如果我们的现实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或说虚构的事，那么我们怎么能描绘和从理论上说明现实呢？这些问题具有足够的挑战性来推翻事实与虚构之间的边界。实际上，二者之间的边界是需要被质疑的，因为“在 16 世纪晚期和 17 世纪早期的英语中，‘novel’ 似乎混用于真实与虚构事件的描述之中。”而且重要的是，“留给我

* 本文原载于英国《国际关系研究回顾》杂志 2014 年 10 月号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First View Article/October 2014, pp. 1-21) 朴成俊 (SUNGJU PARK-KANG) 是荷兰莱顿大学区域研究所的助理教授。他之前在瑞典，丹麦，英国做过研究。他的作品曾在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获得刊登。Park-Kang 是 Fiction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Gender, Pain and Truth (Routledge, 2014) 的作者，现在正在撰写 Tears of Theory，这是一本关于扩大虚构 IR 的著作。

们这些边界曾被突破的证据正是神话、想象；我们则被留下来讲述这些故事。”

作为对虚构 IR 初步讨论的一部分，很有必要简要跟进讨论这个问题。17 世纪以降，科学和文学作品的边界就已经建立起来：科学与正确（事实）相关，而小说与错误相关。易言之，事实-虚构之间恰当的二分法是历史性的建构。实际上，值得一提的是“fact”这个词源于拉丁语动词“facere”，意思是“去做”、“去创造”、“去代表”，或者甚至是“去想象”和“去发明”。因此，并不奇怪学者会将事实和虚构之间的区别问题化，例如在定性研究领域，边界已经持续受到挑战；或者如媒体研究，客观报道与想象虚构已经以新传媒的名义出现。就我而言，在更广的意义上，当一个人意识到事实与虚构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并且已经模糊，或者至少事实（现实）和虚构（想象）内在相关时，虚构 IR 会被更好地理解。

在此背景之下，首先自传式民族志和自传是被论及的 IR 领域叙事方法的最近例证。贯穿整个检验，它们如何不同于虚构 IR 的议题也被提出。接下来是对著名作品和虚构/非虚构的更多讨论。这篇文章之后将详尽阐述虚构/富有想象力的 IR 并提供一篇短故事作为这个研究的案例；我写小说实际上基于我的研究和经历来创造人物。通过探讨“引人共鸣的 IR 侦探”概念，这篇文章以对虚构 IR 和想象的深思结束。

自传式民族志和自传

自传式民族志可能被引作 IR 领域中叙事方法日益增加的首个例证。它是一种写作和研究的方式，通常以第一人称，证明了知觉的多个层次，并在个人、文化和政治之间建立联系。这种体裁的主要方面与自我相关。它与研究者的亲身经历可以被用作学术写作的一种来源的观点相联系；而且已经得到女性主义作家的专门发展。

Jean Bethke Elshtain，2013 年 8 月逝世的知名女性主义 IR 学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Elshtain 在其广受好评的《女性与战争》一书的最初章节中，讲述了她自己“极度个人化”的有关政治和学术形成的经历。她雄辩有力地描述了从幼年至今她对于国际政治和平民/武士形象的感觉是如何建立的过程。这一智慧而又个性化的写作基于大量的来源，包括 Elshtain 的日记、看过的电影和与家庭的经历。该书以她的儿子 Eric Paul Elshtain 在 1985 年拒绝服役和 Howard Hawks 的经典战争电影《约克军曹》结尾，紧随其后的是贯穿该书余下部分关于审问战争的论述。Elshtain 将个人经历融合到一部重要的学术作品之中，并因此而作为铺平 IR 个人叙事写作道路的先驱学者为后世铭记。

现在我将转向《国际研究评论》论坛的文章。Roxanne Lynn Doty 提出在学术写作中自我通常是以美德的缺失为前提来呈现的。自传式民族志 IR 是应对这种缺失的一种尝试。它挑战了传统的 IR 写作不鼓励作者融自我于文本的常式。正如 Morgan Brigg 和 Roland Bleiker 所提出的，通过承认知识是关联化的和社会化的，女性主义学者和自传式民族志学者，对于知识生产和写作过程有着相似的理解。对自传式民族志的批评之一就是自我沉溺（self-indulgence）的风险。实际上，怎样创造自我而又不主导故事是极为重要的。这看似是一个永恒的挣扎。然而，我想要思考的是学术写作和争论是否可以被看做是一种讲故事的一种方

式。在更广的意义上, 虚构 IR 和自传式民族志 IR 可以在此被视作盟友: 它们都积极地追求故事和叙述的力量。

然而, 除了相似性, 虚构 IR 和自传式民族志 IR 之间也存在差异。首先, 它们在虚构中的位置是大相径庭的。自传式民族志 IR 本身与虚构记录或小说之间相距甚远。Elizabeth Dauphinee, 写出典范性的自传式民族志作品却拒绝成为一个小说家, 对这一定位非常清楚并谈到, “我可不想让我的学术作品……这么早就被遗忘。”进一步的, 她补充道“如果我是一位小说家, 那么我必须参与到在我之后伪装为社会科学家的一代小说家的培养之中”。易言之, Dauphinee 似乎在为维持社会科学家和虚构作家之间的界限做辩护。为公平起见, 她在脚注中谨慎地承认了边界的模糊。然而, 据 Dauphinee 所言, 小说家几乎不可能成为学者, 因为他们的证据是道听途说的轶事。这一对于虚构的抵制得到了其他人的认同。例如, Oded Lowenheim 指出将“虚构现实”作为保护自传式民族志中私人信息的一种手段。尽管我理解(和支持)他良好的动机, 我相信这一建议是基于学术和虚构写作之间的差别。通过构建虚构的记录, 一个自传式民族志作品可以被看做学术写作。

这样的区别可能导致意料之外的结果。例如, 这可能低估大量运用虚构于探究的 IR 作品。最后, 正因为虚构不适用于学术写作, IR 作品使用虚构作为一个主要的分析来源缺乏作为学术写作的合理性。我相信自传式民族志 IR 学者没有意想到这个结果, 但风险已经相伴而行。在方法论上, 虚构 IR 是对这一区分的挑战。它涵盖了虚构想象的力量和洞见。更重要的是, 它强调在 IR 学术作品中已经存在虚构或说想象的记录。这是需要被指出的虚构 IR 和自传式民族志 IR 之间最关键性的一个区别。

第二, 与上述相关, 二者关于主要的焦点也有一个不同。自传式民族志 IR 与自我深度相关, 而虚构 IR 和想象密切相关。这并不意味着自传式民族志仅仅关注自我, 排除了所有其他的事情。以我观之, 自传式民族志加入自我以建立其他人与世界的联系。自我被视作探索一个与社会、政治相关的世界的工具。我要指出的是虚构 IR 不必关注自我, 尽管运用自我仍是一个可选项。虚构 IR 可能使用个人经历并将自我置于舞台的中央。然而, 这并非虚构 IR 的关键点。塑造自传式民族志的是自我, 而“自动”(auto)并不是虚构 IR 的原因。

尽管如此, 我并不必定将上述区别或对立视为负面因素。它可以被看作创造“合伙关系”的建设性对立。从虚构 IR 的角度而言, 其仍有自传式民族志 IR 所呈现出的有趣相似点。Dauphinee 关心的是证明的缺乏和数据的随意; Lowenheim 对于怎样使其他人通过关注情感来“感受”IR 有兴趣。虚构 IR 也相当关注这些议题。在这层意义上, 我希望对话可以在我称为潜在盟友的人之间产生。更广泛的, 二者都寻求通过积极使用叙事和讲故事来创立 IR 领域写作的一种替代方式。

另一种与自我密切相关的写作形式是自传。这是一种混合个人要素与研究专长、政治性与情感性相结合的写作模式。在 IR 领域, 集体项目“Autobiographic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 IR”值得一提。它挑战了学术写作将作者的缺失作为一种客观、科学模式的先决条件的传

统。这一项目寻求找回“我”并明确表明其存在。易言之，它关注的是“个人叙事怎样影响理论表达”。正如 Naeem Inayatullah 所说的，写作源于我们自己的需要和创伤，投稿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投入到这一假定之中。例如，在比较阅读关于战争的书籍和获得有关血与死亡的直观感受时，Stephen Chan 问道，“难道学者们就应该在如此文本相关而又如此本体论幼稚的基础上进行谈话和写作吗？”Lori Amy，在她讲话的部分，谈论了她的实地考察和研讨班经历。

但最为有趣的事是投稿人表达他们对于非传统自传写作形式的紧张程度。Narendran Kumarakulasingham 称这种紧张为有关没有“地图”的写作，Patrick Thaddeus Jackson 则说他只是想在不作任何精确联系的前提下讲“故事”，因为这正是他之前的尝试未能对这一项目作出贡献的原因。创作序言的 Peter Mandaville 指出了其他人的担心和拖延并坦承他自己的焦虑导致他像一个实况解说员一样采用了最简单的方式去行动。他们的说明表明了这种写作形式是如此艰难和具实验性质。

类似自传民族志 IR，自传 IR 方面积极参与到 Roxanne Lynn Doty “我们的学术写作的灵魂在哪里？…我们作为作家又在哪里”的问题讨论之中。Inayatullah 做的总结直接将学者定位为“讲故事”的人。它致力于赋予诸如情感、经历以主题，并最大程度上利用故事和叙事的力量。在这一语境下，自传 IR 可以被视作虚构 IR 的另一个潜在同盟军。

然而，就像自传民族志 IR 的主焦点是自我（auto）一样，二者之间仍有一个显著差别。也即，它对于虚构的定位。尽管这一项目承认“学术写作假定了一个不稳妥的虚构”，然而编辑澄清这些论文并非虚构。相反，这一项目被描述为既是科学的同时也是反科学的。值得一提的是，“科学的”这一术语是非学术的。而且，这正是虚构 IR 所进入的地方。这篇文章提出虚构写作可以被用作一种处理 IR 问题的方法论工具。它并没有远离虚构，正如自传和自传民族志 IR 所呈现的那样。相反，它与在 IR 学术作品中怎样进行虚构写作和整体想象有关。这永远不会是一个简单的任务，但是我的希望是这篇文章可以作为开启相关讨论的有益尝试。

著名作品和叙事性 IR

在这一点上，需要提及一个非常有趣的项目。我发现 Dauphinee 在最近的作品《流亡者的政治学》中提出了一种积极的对话，似乎企图模糊自传式民族志、小说和非小说之间的界限。这本书没有介绍、总结和任何注释与引用，用整本书的篇幅讲述了一个故事。书的开头写道：“我的职业生涯建立在一个叫 Stojan Sokolović 的男人身上。”然后开始讲述关于主人公“我”——一位研究波斯尼亚及其战争的大学教授，似乎是 Dauphinee 自己，如何遇见 Stojan；Stojan 如何挑战、“摧毁”了他的研究，战争如何改变他及其家人的生活，以及孤独、爱情、道德等问题的重要性。最后文章以开头的方式结束：“我的职业生涯建立在一个叫 Stojan Sokolović 的男人和数以万计的人们的损失的基础上，他们有可能与他相像也可能不相像。一天晚上，他告诉我……”，这段话曾在 Dauphinee 《战争伦理研究：寻找波斯尼

亚》一书的开头出现过。

这部作品读起来可以像小说、像自传式民族志、像二者的结合,或者其他体裁,这取决于读者的理解。它似乎打破了 Michael J. Shapiro 对社会科学研究者和小说家差异的描述:社会科学研究者认为课题的地位与他们的探究无关,然而作家却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对 IR 写作中各种固定模式之间“壁垒”的质疑。如果是这样,那么最近的项目似乎可以推动 Dauphinee 早期模糊写作界限的观点。正如 Jenny Edkins 斯所指出的,通过模糊小说和非小说之间的区别,这个作品开辟了 IR 领域中创造性实践的可能性。我希望以后能有更多这样的作品。

L. H. M. Ling 的《世界政治猜想: Sihar 和 Shenya, 对我们时代的寓言》是另一本非常有趣的著作。这本书明确地将想象带入 IR 中来,令人印象深刻。书的标题“猜想”明显地反映了这一努力。此书运用虚构的写作方式,旨在重构失衡的 IR 世界,即以西方/欧洲为中心和以男性为主导的传统。此外,通过预言的形式,该书设想了一个超越诸如西方相对其他地区和自我相对他人的二元区别的异形世界。Ling 在书中塑造了一些人物,最主要的有 Sihar (一位男性统治者)、Shenya (一位女祭司)和 Wanda (一位 IR 博士生)。Ling 还把这个虚构的故事讲给了她想象中的共同读者“温柔的朋友”。

就全书的谋篇布局而言,其富于想象的雄心似乎有所收敛。不像 Dauphinee 的著作,以学术解析式的“前言”开始,以“问题讨论”结束。但如果将这种格式看作是指导读者的战略选择,则是可以理解的。简而言之,这本书似乎会在 IR 领域成为最具创造性和最有趣的作品之一(尤其在想象力方面)。

承接上面的讨论,还有一种体裁值得注意:虚构批判主义。Anthony Burke 将这种体裁引入到 IR 领域,他认为“类似小说的社会科学”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伯克将 Dauphinee 的书归于这一类;另一种是虚构批判主义,“一种结合自然主义和自我反思的虚构模式,具有更为明晰的理论操作”。在我看来,相比自传式民族志和自传,虚构批判主义对小说更友好。从这个意义上讲,虚构批判主义可以说是虚构的 IR 更亲密的盟友。换句话说,这种体裁继承了“小说和记叙文的暗示和暗指模式”与“话语的想象力”。通过这样做,虚构批判主义有力地地质疑了虚构小说和非虚构小说之间的界限问题。

虚构批判主义领军作家之一的 Stephen Muecke 曾提到批判主义和小说之间的模糊界限,这可以在其著作《没有路》(柏油路)(No Road (bitumen all the way))中找到。书中讲述了很多故事,包括他见到的人,如最初接触的土著女人 Gloria Brennan,他游历的地方和接触的理论家,如 Roland Barthes。他运用灵活的叙述形式,将自己的故事与澳大利亚的社会和文化相融合。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类型的作品大体上介于新人文主义与跨学科文化研究之间。这表明虚构批判主义,如自传式民族志和自传,是从非 IR 领域引入的另一种写作方式。正是虚构的 IR 为该学科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上述相关的写作倾向于借鉴其他领域的见解,而虚构 IR

试图从本领域内寻找洞见，这种做法在此前没有得到积极的开展。稍后我将论证，与传统观点不同，IR 学术作品本身对于虚构的故事并不陌生。这是区分虚构 IR 与相关作品的又一不同点。但是，虚构批判主义可以是将片段和引用拼接起来的混合体裁。

事实上，Burke 的文章证实了这种写作模式。他用叙事的形式编写个人经历、生物政治理论，以及各种演讲、新闻稿。文章以 2005 年 12 月，伯克的妻子珍妮生下双胞胎的场景开头。他认为机器、科学和现代化成为“谋生的力量”的同时也成为了“促使死亡的力量”，或者以“难以抉择”的名义进行折磨和谋杀。伯克似乎在他的双胞胎孩子降生和所谓的反恐战争的生死之间徘徊，“幻想一个更人道、可持续的（地缘）政治”。在写作的过程中，他咨询了很多理论家，比如 Hedley Bull、Francis Bacon 和 William Connolly 等人。鉴于其对小说和记叙形式的兴趣，虚构批判主义一定会成为虚构 IR 的另一盟友。

除此之外，令人鼓舞的是，有 IR 学者编写并出版了小说，虽然不一定会出现在学术期刊上。例如，Stephen Chan 在一个在线杂志 *nthposition* 上发表了几篇虚构的文章，这个在线杂志主要发表诗歌、小说、评论和政治作品。Chan 最新的小说是有关战争、外交、殖民者和反抗者之间暴乱的，是以隐喻的形式传达并向读者开放解释。同时，Richard Jackson 最近在恐怖主义研究背景下发表了一篇“小说”——《恐怖分子的自白：一部小说》。

综上所述，我希望自传式民族志、自传、虚构批判主义、虚构 IR 和其他叙事方法之间能进行一次建设性的对话。这使我特别关注 2012 年在约克中心的约克大学举行的主题为“批判性方法论、叙事之声与政治性写作：语言的限制”的国际和安全研究研讨会。一些与会者的思考已经作为迷你论坛被收录进有关 IR 中的批判性方法论和叙事的《被扭曲的事》（*The Disorder of Things*）一书中。我可以感受到组织此次会议的伊丽莎白女王所说的“叙事性 IR”正在形成。然而，作为一位非 IR 领域的与会者，从事土著研究的 Noelani Goodyear-Kaopua 发现，此领域的崛起伴随着大量的质疑和阻碍。叙事性 IR 如何迎接挑战及其前景还有待观察。

想象法

至于想象法在学术界的运用，最著名的著作的应该是 C. Wright Mills 所著的《社会学想象》和 Benedict Anderson 所著的《想象中的社区：关于起源的思索以及民族主义的传播》。基于这些作品的重要性，也就不难解释为何大批的国关学者就如何在其领域应用想象法展开了更加深入的探索，例如，“国际关系想象”。但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不是“想象化的国际关系学”？或者说是想象化的国际关系写作？想象力可以构建一个没有完全被已知的观点或信息充塞的想象空间，这意味着信息的不充分乃至缺乏反而成了创造性思考的重要条件。如果我们知道的足够多，或者说太多，想象力反而没有了用武之地。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创造过程使得虚构 IR 有实现的可能，也给我机会在下文中详细阐述想象法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合理性。

以 Graham T. Allison 所著的《决策的核心：解读古巴导弹危机》一书为例，这是国际关

系与政治领域最经典也最畅销的著作。John.F. Kennedy 总统曾说,对于决策者本身,这一事件中最为核心的群体而言,决策的核心也是难以描摹的。这就给了想象力发挥作用的机会。换句话说,作为一个完全的局外人,Allison 在描述事件的时候运用了想象性的描述来应对数据的缺少与意外,或者说“谜团”。但这一特征并不明显,他并未创造任何角色,也不认为他的作品是虚构的小说。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 Allison 的研究项目几乎可被解读为小说。例如,请考虑这句话:“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分析师或许会在描述中构建一个或者一系列可以将利益最大化的政府行为”。Allison 在关于深入研究的后记回顾了这一观点,尤其是“富有想象力的分析师”的概念。如果去掉“分析师”这一科学的、中立的术语,很明显阿利森把他自己定义为“富有想象力的作者”,只不过他把这一定义以标准的社会科学的语言与价值倾向掩盖住了。

或许有人会说资料的种类很多:档案材料,相关方的证词,研究者的直接经验,以及其他感觉,如声音、颜色、气味。然而,但当研究者无法获得或无法相信这些资料时,问题就会出现,而这样的突发状况非常多。例如,对于冷战时期的西方来说,中国,苏联,朝鲜的资料就明显属于这一类。换言之,缺少资料的情况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存在已久,这种情况下研究者要如何展开他们的研究呢?

客观说来,他们所依赖的是二手材料或者在有限的信息基础上进行的一些猜测与想象。以朝鲜为例,韩国与西方的学者一直对朝鲜的创立者金日成的真实身份存在争议。由于相关资料的缺乏,认为他是虚构的人物的说法甚嚣尘上。事实上,这一问题在朝鲜问题的研究上尤为严重。建构主义者亚历山大·温特提出,现今几乎很少有国家互相之间完全不了解,而朝鲜就是少数几个这种国家之一,它的“思想”几乎像人的思想一样难以理解。温特的评论说明有关朝鲜的信息与描述远比其他事件难以探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国关学者 Victor Cha 也证实了这一观点。

James Der Derian 所著的《正义战争:描绘军事-工业-媒体-娱乐网络》。他指出,有形资料的缺少导致人们(包括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甚为缓慢。Der Derian 的部分工作是要成为“侦探”,这一问题最初在 Walter Benjamin 的著作中出现。在争议性与不确定性很强的情况下,只有成为一个能够根据有限的信息挖掘确凿的证据与真相的侦探,研究者才能一窥事件的真面目。

由此而论,运用虚构性写作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探求确凿的证据或事实,它其实是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不同的手段,一种要求“经验,移情,内心感知与研究的手法”。关键是运用手头有限的信息,达成“到达故事戛然而止的地方并且填补剩下的空白”的目标。国关领域一向认为真相或事实的定义可以有一个固定而稳定的形式,而我想利用这一方法对此现象做一些改变。在我看来,如果研究者可以将事实视为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它就可以更好将虚构写作作为一个工具来使用。

除此之外,如果一个课题包含一些神秘的部分,虚构写作法则可以更有效地工作。正如

Annick T. R. Wibben 指出，这是一个从政治角度进行描述的过程：“叙述既能帮助表达，也会限制表达——而表达塑造了我们的世界的外表与内涵”。关注的核心很少是为了说服他人，而是集中在如何激发更多解读与探究政治争议性上。就此而言，如果有人有关于某个事件的经历（有时是痛苦的），利用虚构法写作就有了更大的可靠性。换句话说，由人来呈现的知识可以启发故事，因为从一个人的声音出发，会有更多的想象。

理解资料与虚构 IR

有人或许提出这样的问题：由想象提供的资料在何种程度上帮助国际学者理解世界？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虚构资料的意图是为了辩证地看待以国家为中心创造出来的资料，随后以国家为主体构筑想象的世界。这里的问题是谁创造了资料，以及资料是为谁创造的。当研究者认识到国际研究中收集的材料一向遭到政府的隐藏与曲解时，这个问题就相当关键了。在这里我想改述批判主义国际学者 Robert Cox 的经典论述，数据总是为某些人，或某些目的服务的。对于由国家发布的数据，政府掌握其解读过程，任何挑战这一权威的人都会被排斥在外。而利用虚构性写作，研究者可以通过为被排斥的普通人提供表达空间来质疑这个由国家主导创设的世界。当然，传统的写作方法也可以达到这一效果，虚构性写作却可以通过想象力更有创造性地实现这个目标。

第二，更重要的是，虚构性的描述致力于扩大对于资料本身的定义。例如，人和情感本身就可以被当作资料。这又与谁提供了资料有关。我认为（普通的）人与情感正是国家遗漏的资料。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定义“资料”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一个人开始认为人或情感是资料，就会开启一种不同的研究，而虚构写作正倾向于这个方向。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的国际研究越来越关注这个方向。例如，Christine Sylvester 的“体验战争”项目将关于非国家的经验、人、感情作为核心的内容，虚构 IR 也希望增进这种研究的发展。具体来讲，我的构想更多注重的是表达情感而非讨论情感，通过对话性的对人物的描述来实现。换句话说，虚构性的资料要求国际学者重新思考如何构建对资料的定义与分类。

在这篇文章中，我选择大韩航空 (KAL) 858 的事件作为例子，世称朝鲜炸了这架飞机。韩国声称一位朝鲜的秘密特工奉命炸掉这架飞机，杀死了 115 人。这位特工，Hyunhee Kim，在韩国情报部门安排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了她的罪行。然而，对结果的质疑开始出现：并未发现任何死者的尸体与黑匣子。此外，炸弹导致爆炸的解释也与后期由遇难者家属组成的调查组织得出的结论截然相反。其后政府又两次重启调查，但都未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最重要的是，他们从未能调查本案的关键人物——Hyunhee Kim。同时又披露出她第一次认罪时说的“姐姐，对不起”其实是情报部门安排好的，为了达到宣传效果。此案直到现在仍然是一个谜团。同时，在冷战的大背景下，这个案例又显得尤为重要。这个案件发生在朝鲜与韩国间自朝鲜战争之后就开始的长期对峙终于窥得一丝曙光的时候。抛开谁炸掉了 KAL858 不谈，这一事件加剧了朝鲜半岛的紧张气氛。具体来讲，联合国非常清楚这次事件背后的冷战成分。联合国安理会 (UNSC) 的紧急会议再次确认了传统的冷战集团政治：美国-韩国-

领导的派系对战苏联-朝鲜领导的派系。鉴于这一事件，从 1988 年 2 月 20 日美国开始将朝鲜列为恐怖主义的资助国，而将朝鲜列为恐怖主义国家这一行为加速了事件的国际化。总而言之，在模棱两可的事实，资料缺失，冷战政治方面，KAL858 事件可以作为一个有意义的例子。

现在，我邀请读者们阅读一个虚构与事实参半的故事。我们引入一个名叫“Olight Jung”的研究者（作者发明的），他与 KAL858 事件有密切的关联。他的名字非常独特，“Olight”是瑞典语单词“O”与英语单词“light”的组合。“O”是一个前缀表示“opposition of”，相当于英语的“un”，“light”表示让事情可见清晰。“O”和“light”合在一起时读起来像“alright”，传递出一种模糊不清的含义。“Jung”是一个普通的韩国姓氏。同时，它宽泛的代表韩语中的情感。故事中还有另外一位人物，是一位 KAL858 事件的受害者，他是一位游走于世界各地，生与死之间的幽灵。这两位人物直接构成故事的核心。

这里我要提出另一个需要谨慎考虑的问题：我写小说的能力。我的作品读起来像小说吗？我可以像职业作家一样写好故事吗？虽然我很想重划小说与非小说之间的界限，这个问题却困扰着我。一旦一个人宣布要写小说，即使非他所愿，他就需要“和真正的小说作家竞争”。但我相信我们不应该关注小说的质量，而更应该关注虚构 IR 的概念。这个项目并非为了写出好的小说，而是为了在广泛意义上质疑学术文献与小说之间的界限，为了改变小说在学术界的不利地位。

现在，让我们开始 Olight Jung 的旅程。

十年

韩国，首尔，2002 年 11 月 29 日，下午 7:07 左右。Olight Jung 正站在他的房间里。直到他弟弟进来前，整个房间充满了一种奇怪的气氛。

“你还好么……？你是谁？”他的弟弟问道。

没有人回答。

“你是谁？”又是同样的问题。

没有言语也没有动作。

“你是谁？”这一次，他的脸颊被他弟弟碰了一下。

“我……什么也不是。”他听起来和平常不太一样，看起来也很迷茫。他表现地根本不像他自己。

“你还好么？”忧虑的弟弟匆忙跑到厨房。他是要逃跑吗？不。是要拿水吗？不。他要藏起刀子。他的弟弟被自己刚刚看到的情况吓到了。一些令人恐惧的事情可能会发生，一定要把能当作武器使用的东西都拿开，以防它们可能偶然被 Olight 使用。他的弟弟接着冲到卧室，拿起了电话。连手指都在颤抖着。“快点，快点，快点。”弟弟拨打了 911，又急忙赶回那间屋子，Olight 正在那里哭泣着。

“我很好。我没有事……”又热又咸的泪从他的脸上流下来。

一年前，Olight 在美国，一切似乎都很美好。他被选为交换生，非常骄傲并且充满梦想：新的朋友，不一样的文化，学习英语，还有许多的冒险。他充满好奇和自信，并准备好享受在这里的生活。他带着他所有的梦想登上了飞机。是的，他正在飞翔，他的生命正在飞向高空。在一个夏天，飞机安全地降落在了他梦想中的土地。这里的人们很友好，天气很晴朗，校园也很美丽。他感到非常幸运和有福分。这将成为我生命中的黄金岁月，Olight 这样想道。

事实确实如此……直到那一天。在中央图书馆，一群人聚集在一台电视机周围，他们在喧闹。发生了什么？“这里是图书馆，人们应该保持安静。难道在图书馆大声说话是美国的文化么？”当他看到电视机屏幕时他正这样疑惑着。“美国遭遇袭击。”CNN 正在播报一条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新闻：9/11。

反恐战争由此打响，并且正如 Olight 所担心的那样。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宣告“朝鲜，伊朗和伊拉克构成了邪恶的轴心。”朝鲜？问题的代名词。朝鲜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是如此的复杂。“它可能是恶魔的轴心，但它更是统一的轴心。”至少对来自韩国的 Olight 来说朝鲜是如此。他的担心迅速转移到开展反对朝鲜的袭击的可能性上来。根据美国的宣告，朝鲜已经正式地成为一个恐怖主义国家，因为它在支持恐怖主义的名单上。对于一个年轻的韩国人来说，这看起来很严重。他希望战火不要蔓延到朝鲜半岛。对朝鲜展开的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很容易升级成涉及整个半岛的战争。在几十年前这块小小的土地已经经历过毁灭性的战争。在那些战争中，人民失去生命，建筑坍塌，生活也被破坏。而比破坏更严重的是每次战争都加剧了南北的分裂。一对悲伤的双胞胎，这就是朝鲜半岛。

几个月过去了，一则来自韩国的广告吸引了他的注意力。韩国统一部将举办一个国家级的论文比赛，这听起来很有趣。为了准备这个比赛，他决定提前结束在美国的生活。他整理好自己的书本、衣服、杂物以及忧虑。还是同样的航空公司，但他的航行却怀着和去年不一样的心情。他在飞翔，却再达不到曾经的高度。

很快，他又回到了韩国，这块土地上正洋溢着欢乐。2002 年的世界杯刚刚开始，这里有的是欢呼，激情和竞争精神。所有的一切都在这里。韩国队表现得非常好，甚至第一次打进了半决赛。这个历史性比赛的这天 Olight 非常激动。砰！突然，有些事发生了。朝鲜和韩国的士兵在西部沿海地区交火了。也许这些子弹是出于对足球的嫉妒，但这就是朝鲜半岛经历着的生活。韩国队最终输掉了比赛，或许也有这些子弹的原因。Olight 感到很失望，但他很快想起一件几乎快被他忘掉的事：论文竞赛。

由于他刚从美国返回，9/11 和朝鲜半岛理所应当的成为了他的选题。他一个人努力地完成着论文。两个月后，一个电话打了过来。

“恭喜。”是的，他成功了，他赢得了论文竞赛的大奖。他充满了喜悦和惊讶。“好的，好的。”他的生命似乎再一次飞翔起来。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就在颁奖典礼开始的五天前，他接到统一部打来的另一个电话。“我很抱歉通知你，你需要修改一下你的论文。”他很困惑。问题出在 KAL858 事件，这个事件也是朝鲜被列为恐怖主义国家的原因。但是由于事件

仍存在质疑，他认为应该对它进行再调查。政府不喜欢他的结论，因为这违背了官方的调查结果。

“如果你不修改你的论文，你将失去你的获奖资格。”政府表示。

“我不能仅仅为了获奖就这样修改它。”Olight 说道。并且因此他刚刚起飞的梦想就这样坠毁。

一些日子过去了。“奇怪……”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力量包围着他。他正在大学的食堂，感到很冷。他试图忽视并且继续吃饭，但是这种感觉更加近了。这很怪异。不，不只是怪异。他感到惊恐。吃完晚饭后，他回到家里。尽管还没到睡觉的时间，但他没有选择。他应该去睡一觉，这样一切都会变好。是的，一定会是这样的。他躺在床上，寂静的环境安慰着这个不寻常的夜晚。然而，这寂静并未持续多久。他的身体开始颤抖。发生了什么？一个奇怪的声音在他的脑海回响着。Olight 开始说一些他不知道的东西。出了什么问题？他试图睁开他的眼睛。但是他做不到。他正在坠向黑暗，无边的黑暗。一切都失去了控制，不再是他自己。他的身体一直颤抖着，正在坠入深渊。黑暗，没有尽头，并且孤独。

“不，不，不。我不想死，我不想死……”这时，一束光照射进来。他的弟弟注视着他，接着说了一些东西又离开了。一阵极度的寂静随之而来。他感到平静，一种理想中的平静。“我很好，我没有事……”泪水涌了出来。

“可怜的 Olight，” Spirit 说道。但是 Spirit 没有选择。人们已经不再对 KAL 858 感兴趣，那已经被遗忘许久。政府的立场就是唯一的解释和答案。尽管还没有足够的证据，但是一旦政府说了什么，那就将变成真相。Spirit 想知道为什么这个事件还在人世流传。一定有什么人曾听说过它的故事。这时 Spirit 发现一个敢于在他的写作中提及这个事件的年轻学生。Spirit 知道，到了最后，这个学生的文章可能不会被政府批准。他也想过这个学生可能会按政府所要求的修改他的文章。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事曾经无数次地发生着。然而，令人吃惊的是这个学生拒绝了。多么天真的做法！再看看那个学生，他充满了困惑和挫败。这就是为什么 Spirit 决定接近他。他认为这个学生可能就是他一直等的人。

Spirit 是一个曾在韩国空军部队服役的飞行员，他在 1980 年全斗焕 (Chun Doo-hwan) 将军就任总统时退出了军队。全斗焕将军对发生在 1980 年五月的光州惨案负有责任；作为一个负有野心未经选举而上位的独裁者，他和他的簇拥者杀害了参与游行抗议的几百名民众。自那之后的每个早晨，每当 Spirit 穿上军队的制服都可以闻到血的味道。Spirit 对处在这样的军队感到羞愧，于是离开这里去了一家民用航空公司。

巧合的是 Spirit 当时刚好在 KAL 858 的驾驶舱。他童年时的伙伴是一个建筑工人。他们一起在一个小村庄长大并成为要好的朋友。当他们高中时，Spirit 家搬到了另一个地方。两个朋友只能相互道别，但是他们承诺要一直保持联系。随着时光流逝，他们都开始忙于自己的生活。Spirit 后来又不得不搬了几次家，渐渐地就忘记了要联系他的朋友。出乎他们意料

的是，当他们再次见面的时候已经相隔近 20 年。在前往伊拉克的航班上，他们意外相遇了。不管两个人分离多久，好朋友总是能辨认出彼此。Spirit 已经成为了一个飞行员而他的朋友成为了一个建筑工人。Spirit 是在他的一个固定航线上，他的朋友从韩国来。“一个多么美好的巧合！”他们欣喜若狂并拥抱着。朋友说他必须去伊拉克，因为他的公司要与它在伊拉克的合作伙伴签一笔大合同。他们交换了他们的联系方式。这一次，他们不会再失去彼此了。

1987 年的一天，电话响了起来，正是那个朋友的来电。“我打算在 11 月 29 日回韩国。”“那太好了。嗯，让我想想。我在那之后的一周有一个航班。但是我可以改一下我的时间表，尽可能地和你在同一个飞机上。”这就是 Spirit 怎样来到 KAL 858 的。Spirit 仍旧记得那一天，记忆非常鲜明。朋友已经在机场的休息室，他拿了几个包。“这些都是带给我家人的礼物。”他看起来如此开心，他的同事看起来也是一样。像 Spirit 的朋友一样，大部分乘客也是建筑工人。他们都很激动可以回到家乡。他们当然很激动，因为这是多年来他们第一次和家人重聚。Spirit 也很高兴。因此，飞机伴随着希望和欢乐起航。乘客们似乎有着许多的计划：如何在机场问候自己的家人们，要先品尝哪种韩国传统食物，以及他们应该怎么表达他们有多想念和爱他们的家人。每个人依次说出自己的计划并欢笑着。

但是，可悲的是，一切都出了问题。Spirit 不能确切地记起发生了什么。他能记起的所有就是他在某一时刻变成了“the Spirit”。从那时开始，Spirit 一直试图弄明白在他朋友身上，在其他乘客身上，还有在他自己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韩国政府在指责朝鲜，朝鲜政府也在指责韩国。他们互相争吵，却不出示证据。Spirit 和其他乘客的家人也在不断抗争着。他们想要看到尸体作为确切的证据。媒体本应该调查这个事件，再次精细地确认政府的调查结果。但是他们所做的只是重复政府说的话。Spirit 极其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他可以回归平静的唯一途径。自首的炸弹投掷者名叫 Hyunhee Kim。但是她所说的并不符合 Spirit 作为飞行员所知道的事实。

“真相，”那就是政府所说的。安置炸弹者认罪后，所谓的真相就已经被认可，调查也全部停止。但是他们能够了解 Spirit 仍旧漂泊无定吗？能够知道 Spirit 还没有进入坟墓吗？他们能够明白 Spirit 的家人还没有看到遗体吗？毕竟，“真相”是一个说给活人听的词语。Spirit 不能回到他的家。Spirit 也不能再飞行。Spirit 再也不能在机场拥抱他的朋友。“真相”不是为 Spirit 准备的词语。是的，从来不是。“真相”是空洞的，奢侈的，伪善的，具有欺诈性的，只有非常需要它的人来承受它的痛苦。Spirit 需要某个人把这个故事讲给其他的人，在那个世界。

十年前，Olight 从没想过这场论文比赛将会改变他的一生。他并没有为了这次有争议的飞行买票，也没有计划追踪 KAL858 航班案，他想忘记相关的一切因为那让他非常困惑。但因为某些原因，他没能脱离这件事。他飞去英国调查这件事，成为了一名博士生，好像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把他拉上这个旅途。令他吃惊的是，他确实发现自己手上有一篇博士论文。这

并不简单，简直是一个奇迹。因为一些预料之外的事情的发生，《大摆脱》成为了他的主题歌。他一遍又一遍地听这首歌，仿佛是一篇祷文一样去吟唱，并在办公室的门上贴上歌词。就像歌里唱的，Olight 想尽全力完成面对的考验，希望相信最终一切问题都会解决。

在韩国，他们说这个项目不会成功。“此外，这个案件在政治上非常敏感。你已经经历了，为什么不放手呢？它将毁了你的事业和人生。”他们没有忘记加上一句话：说这些是因为他们关心他。虽然奇怪，他们好像在窃窃私语，就像在法兰兹·卡夫卡的《审判》中写的那样：“为什么你要坚持没有意义的行为来搅扰我们而不是接受这个状况呢？此时此刻，我们可能是世界上离你最近的人。”但是有时人生没有逻辑，却很神奇。迷惑的本科学生成为了一个博士，一定程度上还要感谢这个案件。在某些情况下，他想知道他是否在自己的学术利益“贩卖悲剧”。

几个月后，他开始接触 KAL858 案中的家属。

“恭喜，Olight Jung 博士。正如你可能知道的那样，今年是这个案件的 25 周年。”

“是的，当然，我知道。”

“那么我们想你是否可以在悼念仪式上发表一个关于这个案件的演讲。”

2012 年 11 月 29 日，韩国，首尔。“当我今天被邀请到这里做演讲的时候，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不是一个这个案件的专家，你们才是专家，因为这个案件是你们的人生。你们亲历了这场事故，我不过是一个整理了你们的一点故事的研究员。所以，我怎么能站在你们和消失了 25 年的你们所爱的人面前去做一个‘演讲’呢？那都是废话，是不正确的。”Olight 停顿了，人们注视着他。“但是我已经决定今天加入你们，仅仅是为了和你们分享我这部分故事。最重要的是，我不知道真相。官方调查结果显示这个案件是朝鲜的炸弹所为，其他人说是韩国的操纵。可能二者都是，也可能是其他。我不知道谁是正确的，我不知道真相。我所做的不是努力查找真相，而是去展现这个案子有多么复杂。我想说真相永远可能被质疑，我们需要谦卑。”

接着他简洁地谈了他的一些发现，人们仔细地听着。“最后，让我用这个小故事结束。在我的博士论文在英国答辩后，我搬到了瑞典。我打包了我的书和物品并且航空邮寄了它们，但是不幸的是它们丢失了。我给投递处反复打了很多次电话，我很绝望但是投递处说它们就是丢失了。我非常的沮丧，一段时间以来什么都不能做。过了一阵，当我早晨起床的时候我感到很冷，我想：‘我的书和物品们，你们在哪？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冷多孤独……’然后，我蹦出一个想法：啊，这不是一样的吗？那些家庭，他们 25 年中每个早晨都这样醒来，想我的女儿在哪里，我的儿子，我的母亲或父亲，你们会有多么孤独多么寒冷？我想这意味着什么。我完成了我的博士学业，我现在可以忘记并继续前行了。但是我相信我的物品丢失这件事在告诉我：‘请不要忘记。’我自己将永远铭记这个案件，作为我一生的作业……感谢您的聆听。”

安静的音乐响起，人们在乘客照片下放上花朵。悼念仪式结束后，他正准备离开，这时

有人走近他。

“打扰一下，是 Olight Jung 博士吗？”

“是的，您好。”

“今天谢谢您。如果可以的话，我能不能跟您谈一小会儿？”

“当然，您是一个家属吗？”

“恩，算是……无论如何，非常高兴见到您。”

“是的，我也很高兴见到您。”

他们一起走着，Olight 不知为什么，感到和这个人在一起非常舒适。

“你的故事非常有意思。我能知道你从一开始怎样对这个案件产生兴趣的吗？”

“恩……很复杂。它就是这么发生了。我想就是这样……那么你呢？你失去了你的女儿还是儿子？”

“……”

“哦，对不起，我不该问的。”

“不，没关系。只是谈论这个对我来说总是非常困难。”

“是的，我明白。”

“总之 25 年了，过去很久了……我不知道我是怎样过来的。”

“我想其他家庭也是这样，我非常遗憾。”

“不，你不用遗憾。看看其他的人，他们并不感兴趣。对于别人来说，这个案件很久以前就结束了……”

几分钟之间他们都沉默着，天空静静地下起了雪。

“有点早，不是吗？” Olight 打破了寂静。

“我很抱歉，十年前的那一天，我并不是故意要吓你。”

“什么意思？”

“不，没事。”

“十年前……？” Olight 问。

“不，我只是自己想想。”

天色渐暗了，雪花飘落下来。他们继续走着。

虚构和想像的国际关系

如果不考虑上面故事虚构的本质，一个人也许想成为一个“有同情心的国际关系侦探”。就像侦探一样，国际关系研究者基于（某些时候受限制的）证据或数据来做调查。实际上，把研究者和侦探作比较并不是新鲜事。在社会科学中，罗伯特·基欧汉把一个研究者认定为一个侦探。正如之前提过的，詹姆斯·德·代元把他的国际关系调查称作一项侦探工作或一个侦探故事。在这个语境下，我想说每个国际关系研究者都是某个方面的侦探。然而，关键是在某点上我们和侦探一样奋斗。这种奋斗可以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也可以是为了其他

人的利益。这就是“同情”从何处而来：去努力感受和理解别人。国际和人类事务并不永远但是经常充斥着战争、金融危机、自然灾害和神秘失踪（例如最近的马来西亚 MH370 航班消失）。任何人可能突然成为这些痛苦境况的受害者，如果忽视了“同情”的重要性就错了。

我的特别关注点在想像的元素。同情别人包括用自己的想像把自己置于和他人一样的状况，使我们进入到他们的位置。确实，各种各样定义“同情”的尝试解决了这个问题。根据 Suzanne Keen——一个在文学上调查了“同情”的叙事理论家所说，“同情”是一种可以通过见到、听到、读到他人的境况而产生的“一种替代的、自发的情感共享”。《牛津大词典》给出如下定义：“想像并共享他人的感受、经历等的能力。”换句话说，同情能使我们“通过想像处在别人的位置”感受到他人可能做的事。应该注意的是，“同情”已经在国际关系学界被探索了。通过在以前的作品中建立的，我在努力给“想像”以新的关注。如果不让我们移动，不把我们放置到别人的位置，我们就不能做到感同身受。做到感同身受就是拥有了想像力。这个观点和这篇文章的主题放置在了一起：如何在国际关系中运用想像力。

我想强调“同情研究工作”的目标不是必须去“解决”问题，而是积极并谦逊地与所知的可能性或不完全性接触。我关注的核心是一个人如何用理智的方法来探讨未知的事情，关键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努力做到最好。我绝不是说传统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目标——“解决问题”是不重要的。我的观点是研究者不必假装成情绪和纠结被完全抹去的“客观和中立的科学家”。

总之，这是关于想像力的观点。首先因为国际关系研究者在职业术语上并不是侦探，因此想像力是必须的；第二，有同情心是想像力的一部分。成为一个像这样的侦探需要从同情的方式上利用想像力：去感受他人的需要和关心。那是去挣扎，去受挫，去享受研究的过程。这不必保证在不远的将来能获得成功的研究结果或可感知到的进步。然而，我要说，做出努力很重要，因为最终国际关系是关于理解他人的感受、缔造人和世界关系的研究。我的建议是，成为有同情心的国际关系侦探的一个方法是从事小说写作。通过运用想像力，创造角色，把数据与虚构的故事或自身的经历结合起来，我相信更多原创的和富有同情心的国际关系文章可能出现。我希望这篇文章能被看作一个谦虚的尝试，朝虚构的和想像的国际关系迈出的小小一步。

[翻译：胡阳阳 于凯玥 李 萌 李冰莹 王 燕]

[责任编辑：李 萌]

[校对编辑：胡阳阳]

德国留学经验谈

方鹿敏*

我叫方鹿敏，现就读于德国康斯坦茨大学（University of Konstanz）政治学与公共行政系，我的专业为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心理学、政治社会学和政治科学研究方法。2012 年初秋在南开的校园里与诸位学友的会议交流使我收获良多，也因此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如今受到学弟的邀请为《新视界》写稿，我也非常希望在此将自己持续了近一年的赴德申请之路以及短短两个月的博士学习感悟与大家分享，为有志于来到德国继续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的朋友们提供些许可借鉴的经验。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我本科就读于辽宁大学法学专业（国际法方向），后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在硕士初期有幸结识了我后来的导师尹继武老师，并开始初步接触政治心理学的知识谱系。幸运的是，在尹老师的引导下，我逐步从中发掘了自身研究兴趣所在，并免去了研究生初期寻找研究方向的困惑。带着对自身研究方向的一些“情感”以及探索世界的“好奇心”，我在 2013 年的夏天开始了自己的海外求学申请之路。

从 2013 年初秋开始“套磁”，到 2014 年农历大年初一拿到了康斯坦茨大学鹿野进教授的入学邀请函，再到 2014 年 5 月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资助，经历了套磁被拒，研究计划被否，我的申请之路可谓一波三折。最终选择德国作为留学目的国的原因主要因为其严格的教学科研质量、良好的学术口碑以及相对完整和高效的毕业制度（3-5 年）。事实上，由于德国（甚至整个欧洲大陆）免学费、半工作制的博士生研究制度，有兴趣前往欧洲大陆攻读博士学位的同学们可以在网上搜索是否有教授有意向招收与你研究方向相近的博士生，一般此类情况如果教授愿意接受，可以获得其全额资助。如果没有这一机会，又有心仪的教授和课题组希望加入，可以在获得教授的无资助邀请函后考虑申请国家留学基金委（CSC）的项目资助。

康斯坦茨大学的政治类专业在德国和欧洲大陆有着很好的口碑，作为德国最年轻的“精英大学”之一，学校近年来获得了德国联邦教育及研究部和德国科学基金会的强力资助。在短短的两个半月内，我已经通过与导师和同事的交流以及自身经历中感受到了德国政治学相关学科与国内同专业在教学与科研中的较大差异：

首先，从学科意识上，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教育体系一样，政治学在学科分类上属于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和体系上与传统的人文科学有着很大的差异，由于国内在很多方面仍将政治学与人文学科混同，以至于在意识本源上仍然无法突破传统方法的束缚。

其次，一些起源于美国的政治科学研究方法，如理论建模、量化研究、实验方法等已

* 方鹿敏，女，德国康斯坦茨大学（University of Konstanz）政治学与公共行政系博士。

经在德国获得了相当广泛的应用，部分科学方法甚至在此得到了一些实质性的运用突破。

最后，康斯坦茨大学本身以自然和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见长，其决策科学研究生院（Decision Science Graduate School）汇集了政治学、经济学和心理学三类学科的研究人员（包括博士生、博士后和教授），因此，政治学相关学科的博士生们广泛参与了与经济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其他专业的交叉学科研究。就学科发展而言，政治学在康斯坦茨大学同样走向了与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并行的跨学科研究路径。

从客观上看，国内与西方国家在政治学类的相关研究与教学上，仍然存在一定差距，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既有学科体系设置的问题，也有学科认知的局限。但很庆幸的是，国内很多高校的相关专业已经意识到了这一差距所在，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和学生们开始尝试着改变一些传统的研究思路并从方法和理论体系上逐步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我衷心希望有致力于继续从事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的同学们能够多一些机会走出国门，只为了这个我们共同热爱并投入了情感的学科。

[责任编辑：李冰莹]

英采飞扬

【编者按】本期收录了两篇文章。第一篇文章作者分析了“奈关于外交政策中道德评价的观点”，提出政治家在评价外交政策中的道德时应该把握的三个标准。第二篇文章则把目光放在当今社会热议的医患关系上，作者用过自身观察和阅读提出了避免医患关系紧张的方法。

Nye's Opinion on Assessing Ethics in Foreign Policy

Yinan Jiang*

Value-neutrality does not mean ethics is nonsense in diplomacy-decision.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the nations are interdependent with each other. Besides, citizens have the sense of community to some extent with some foreigners and politicians taking ethics into consideration. Nye thinks that citizens should change simplistic opinions, especially partial opinions. Politicians should assess ethics in foreign policies in three standards: foreign policies' motive, approach and consequence.

The reason why citizens should abandon unified opinions is that ethnic assessment based on one aspect usually ignores some differences in other aspects which may matter in the political realities. Nye compares US's invading Dominican Republic in 1965 with Soviet Union's invading Czechoslovakia in 1968. The actions of US and Soviet Union are both in tainted motives. However, US used smarter policies and finally gave autonomy to Dominican, which is considered less harmful than Soviet Union's policies in Czechoslovakia. If citizens only focus on the filthy motives of US and Soviet Union, it is impossible to see different consequences in Dominican and Czechoslovakia. If citizens only concentrate their consciousness on different approaches and different consequences, they easily neglect that US and Soviet Union acted for their own interests.

Politicians are obliged to take ethics into consideration during decision-making. In Nye's view, justice does not mean to sacrifice nation's own interests; actually, it means to keep impartial when dealing with competition of interest. With pursuing justice in foreign policies, politicians can raise citizens' self-respect, enhance their confidence in government and gain reput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Politicians should be cautious because they are responsible for collective interests. However, politicians are often unable to get what they want because global politics is complex. Nye argues that the unbalance between the goal and method always causes unexpected results. For example, US wanted to rescue South Vietnam from Communist bloc. However, the Vietnam War destroye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Asia and damaged US's global power, which instigated Soviet Union's expansion in 1970s.

Assessing ethics in foreign policies need considering sophisticated conditions and establishing

* **Yinan Jiang** is a 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nKai University.

new standards. It is obvious that policies with antihuman motives, approaches and consequences are evil and should be blamed. However, there are some special conditions involving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motive, approach and consequence. Nye gives an example: with the same good motives, nation A used a good approach but caused bad consequence, while nation B got a good consequence in a bad approach—we cannot assert which one is better in ethics immediately. Confronted with the situations which are not typical in ethics, Nye suggests that we could judge foreign policy in three standards: some policies may cause unintended results, which should be thought more carefully. Fearing being involved in new issues sometimes may make politicians prefer ignoring issues than announcing them, which suggests us find what politicians do and what they do not do. To keep balancing usually replace ethnics, while ethnics should matter in policy-making.

In conclusion, ethics assessment in foreign policy is difficult but necessary. Following Nye's advices, we can achieve this goal by three aspects and remember that cautiousness is politicians' virtue forever.

Dealing with the given scenarios

Xiaoxuan Feng*

Doctors have always been a hot topic of discussion in China as well as around the globe. There has been so many examples of the rocky relationship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the reason for which maybe the doctor is irresponsible to his/her patients and the comment about how frustrated the patients are with doctors and the medical system. Actually, there exist a lot of rules and regulations for doctors to follow. Take the medical system of New Zealand as an example. For doctors in New Zealand, the first and foremost thing is showing their respect and treating the patients fairly. Therefore, in whatever scenarios it is essential for doctors to be kind and caring and I believe it is the first key point in avoiding the rocky relationships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Besides showing respect and kindness, the most crucial thing is to assure the patients' Informed Consent. Informed consent is explained as "the process of agreeing to take part in a study based on access to all relevant and easily digestible information about what participation means, in particular, in terms of harms and benefits." Specifically, in the medical system, it means that the health care provider may ask a patient to consent to receive therapy before providing it and give facts about the patient's overall condition. The word "digestible" intrigues me most. As some professional terms are included in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patient and the doctor, the patient might find it hard to follow the doctor's diagnosi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for doctors to use common words when

* Xiaoxuan Feng is a juni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nKai University.

talking with their patients, especially when the patient is a child, who is still under the custody, or a senior citizen, whose family might not be in his company when in the hospital.

As in the given scenario 1, the patient faced by the doctor is a 10-year-old girl with Diabetes Mellitus, accompanied by her parents. It is known that talking with a little girl about her illness is a tough job. If I were the doctor, I would talk with her parents directly and tell them what exactly the illness is.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is characterized by insulin resistance, which means that the body produces insulin, but the cells in the body become resistant to insulin and are unable to use it as effectively, leading to hyperglycemia. They would also be informed that tests show that their daughter requires tablets twice a day to help control her condition. And it is her parents' duty to make sure that she takes the right amount at the right time for fear that symptoms like faint or dizzy happens. The parents would be told that Type 2 diabetes is due primarily to lifestyle factors and genetics. A number of lifestyle factors are known to be importa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ype 2 diabetes, including obesity (defined by a body mass index of greater than thirty), lack of physical activity, poor diet, stress, and urbanization. As a result, the girl should improve her diet such as adding more vegetables and fruits instead of just eating lots of white rice, which appears to also play a role in increasing risk. Consumption of sugar-sweetened drinks should also be avoided. What's more, more exercise should be done, as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lack of exercise cause 7% of the case. During inspection period, the girl expressed her fear for taking medicine. As a doctor, I would suggest her parents not to force her, but to persuade her and help her taking medicine in a "funnier" way, such as having medicine when she's having her favorite food etc. Whatever the method is, the girl's parent should be aware of all the details.

In scenario 2, the patient is a 70-year-old man who is suffering from prostate cancer. If I were the doctor, I would first ask about the symptoms. As the disease may cause no symptoms at first, but in later stages it can cause difficulty urinating, blood in the urine, or pain in the pelvis, back or when urinating. Therefore, if the patient is suffering from no pain or hurt, then his illness is in the early stage, which is the better situation. But if the patient does have the above symptoms, then I would tell him the severity of his illness and tell him that he needs chemotherapy in the form of tablets. Instruction of taking the medicine will be given to make sure he takes the right amount at the right time. What's more, I would inform him that the possible side effects are nausea and headaches. When these symptoms happen, it's better for someone to look after the patient and to make sure the illness wouldn't go from bad to worse rapidly. I would suggest him to live with his son or daughter who can help supervise and take care of him. He told me that he has a son and daughter-in-law, with whom he is living with, and a daughter who is divorced. But the old man doesn't want his kids to know about this.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I would tell him that many

cases can be safely followed with active surveillance or watchful waiting. As a result, I would persuade him to inform his children and keep contact with me.

The informed consent process is a very important aspect of both research and clinical experiments. Thus, doctors should pay greater attention to this issue so that patients can be better informed and have greater comprehension about the therapy and be more satisfied.

[责任编辑: 裴瑶]

..... 国际冲突数据

国际冲突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进行国际冲突领域的定量分析需要相关数据库的建设, 鉴于搜集数据的大工程量, 研究常常需要借助现有的数据和数据库。以下是几种和国际冲突相关的数据:

一、COW MID3.0 Data, 该种数据收录的是“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威胁、显示、或使用军事力量的行为”的数据, 涉及的国际冲突有领土、政策和政权三类争端, 该数据的详细信息和下载地址参见: <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

二、COW ISC3.0 Data, 该种数据是“战争相关指数”的国际冲突数据, 主要涉及的数据是和战争有关的一些数据。该数据的详细信息参见: <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

三、ICB Data, 该种数据收录的是有关国际危机行为的一些数据, 包含了体系层次和行为体层次两种数据。该数据的详细信息和下载地址参见:
<http://www.cidcm.umd.edu/icb/>。

四、PRIO ACD, 该种数据收录的是武装冲突方面的数据, 包括国际上的武装冲突数据和国内的武装冲突数据两部分数据。该数据的详细信息和下载地址参见: <http://www.prio.no/CSCW/Datasets/Armed-Conflict/>。

资料来源: 刘丰 陈冲: 《国际关系研究的定量数据库及其应用》,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1 年 05 期。

[整理: 江昊宇、唐铭兴]

2014 年终大事盘点

【编者按】2014 年即将过去，回首这一年，钓鱼岛和南海的领土争端牵动着每个中国人的神经，日本右翼份子势力不断壮大，政治右倾加剧；ISIS 崛起和伊拉克政府陷入危机使本已动乱的中东地区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泰国又陷入几年一度的政治动荡；埃博拉在非洲的肆虐使得很多人陷入恐慌；乌克兰危机仿佛是新一次冷战的前奏，俄罗斯和西方的对立不断加剧。

2014 年是人类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有感于这一年世界局势的起起伏伏，《新视界》编辑部特置“年终盘点”栏目，与您一起回顾 2014 年的大事件。

1. 乌克兰危机

2013 年 11 月 22 日，乌克兰亲欧洲派在基辅展开反政府示威，抗议群众要求政府和欧盟签署协议、亚努科维奇下台、提前举行选举。2014 年 2 月 22 日，亚努科维奇被议会罢免其总统职务，并宣布提前于同年 5 月 25 日举行总统大选。3 月 11 日，克里米亚议会通过了克里米亚独立宣言。4 月 7 日，乌克兰顿涅茨克亲俄者宣布“独立拟公投入俄”。4 月 30 日，图尔奇诺夫宣布，乌武装力量进入全面战备状态，决定征兵。5 月 12 日，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宣布成立独立“主权国家”。



25 日，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27 日，乌政府称夺回顿涅茨克机场。6 月 27 日，波罗申科签署欧盟联系国协定，标志着乌克兰正式启动准备加入欧盟。7 月 17 日，马来西亚航空 MH17 航班在东部反对派控制地区被导弹击落，机上 297 人全部遇难，政府与反对派相互指责对方击落了该飞机。7 月 29 日欧盟和美国指责俄罗斯破坏乌克兰东部稳定，宣布对俄罗斯采取经济制裁。8 月 7 日，俄罗斯决定对美国 and 欧盟实施反制裁，禁止大部分从欧盟和美国进口的食品。9 月 1 日，乌克兰政府军从卢甘斯克机场撤出，随后从其他一些反对派控制区域撤离。政府方指责俄罗斯“发动了一场巨大的战争”，导致数万人死亡。9 月 5 日，乌克兰冲突双方在明斯克签署 12 点停火协议，从北京时间当晚 23 点正式生效。9 月 6 日，乌克兰东部大部分地区依然平静，有零星摩擦发生。政府军与反对派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俄罗斯外交部警告称，如果欧盟制裁执行，俄方将对制裁予以回应。同一天，普京与波罗申科通电话，表示停火得到了较好的执行，并希望该地区长期停火。

➤ 专家解读

奥巴马总统决定硬抗俄罗斯，发动制裁、进一步支持乌克兰新政府。这是个严重错误。他的回应和当初加剧危机的逻辑是一样的。这不仅无助于解决分歧，还将制造更多麻烦。白

宫和华盛顿特区的高层人士均认为，美国跟此次危机的导火索毫无干系。在他们看来一切都是普京的错，且普京的动机上不了台面。这是谬见。华府在此次危机升级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而普京的动机与其他列强并无二致，包括美国。

就算西方最终让俄罗斯付出沉重代价，普京也不可能退缩。重大利益摆在眼前，一个国家会不惜一切代价确保本国安全。鉴于俄罗斯的历史，我们当然不认为这个国家会是例外。

——约翰·米尔斯海默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国际安全政策项目主任

大多数国际关系专家倾向于认为，乌克兰局势的发展正令中国陷入某种窘境。普遍认为，美国高调重返亚太，其用意是遏制中国崛起，因此俄罗斯对中国的战略意义愈发凸显。然而，俄罗斯最近在乌克兰积极出手，完成对克里米亚的合并，这一连串的动作似乎违反中国的一贯立场。众所周知，中国一直坚持在国际事务中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克里米亚的独立公投对中国来说更是敏感，因为中国也在与台湾和西藏的分裂势力进行斗争。这些专家强调，正是由于担心作茧自缚，中国对乌克兰局势的公开表态流于模棱两可。然而，这些高论误读了中国的决策。恰恰相反，中国的现行策略是高超的，既具有战略远见，也保持了战术灵活。中国的立场权衡了多种因素，体现了对国际关系大局和乌克兰特殊形势细微和深度的理解。

——李世默 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2. 泰国政局动荡

1月13日，泰国反政府组织启动“封锁曼谷”行动，并称行动将持续到看守政府下台、推迟大选、全面改革的诉求得到满足。随后，看守总理英拉宣布在曼谷及周边地区实施紧急状态法，以阻止由此产生的暴力流血事件。英拉表示，虽然实施了紧急状态法，但绝不允许警察和军队武力镇压集会示威人群。2月2日，泰国举行国会下议院选举。由于民主党抵制大选，选举注册和投票工作受到反政府示威者的干扰，众多选民没能完成投票。最后，泰国宪法法院判决国会下议院选举无效。5月7日，泰国宪法法院作出判决，解除看守总理英拉的职务。看守内阁指定副总理兼商务部长尼瓦探隆为新的看守总理。9日，泰国反政府示威者在首都曼谷再次发起大规模游行，要求看守政府下台。泰国政治团体反独裁民主联盟支持者“红衫军”次日在首都曼谷和总统府交界处发起大规模集会，以示对看守政府的支持。20日，泰国陆军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戒严。22日，泰国陆军司令巴育宣布发动军事政变。军方随后接管了泰国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权力。26日，巴育出任“全国维持和平秩序委员会”主席。泰国国内局势陷入了重重迷雾之中。



➤ 专家解读

从理性的角度看,政变显然不是化解当前执政党和反对派矛盾的有效办法。过去发生的,无论是军事政变,还是以司法手段更迭政府,都没能结束政治对立,也没能从更深的层面理顺权力结构,明确泰国政治前行的方向。而泰国未来局势走向直接取决于民主党对其诉求的满意度。如果民主党执意英拉下台,而后者予以拒绝,对抗就会加剧。局势混乱到一定程度,不排除对抗双方之外的力量介入。

——周方治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东南亚事务专家

当依附性的臣民文化到处弥漫,无时无刻地发挥着渗透和侵蚀的作用,且所有的政治团体和政治势力,并没有将“体制内主要的政治制度视为政治竞争的唯一正当的架构并且遵守民主的游戏规则”时,泰国民主制度的成熟之路,注定还要经过艰难而漫长的公民文化培育之途。

——周少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 学生视角

民主和政变看似是一对矛盾体,但却在泰国交替上演了许多年。泰国人对政变看怪不怪,甚至有些“欢迎军人来搅局”的念头,这无非说明,普通民众对民主的寒心。甚至可以这样认为,相当多的泰国民众“过于相信民主”,最终当其使用西方民主最王牌的选举制度来解决政治矛盾时,却发现民主的功能不仅退化,而且阻滞着社会发展,加剧了社会隔阂与分裂。

——杨至远 南开大学 2012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3. 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 政治右倾加剧

4月20日,日本国家公安委员长古屋圭司参拜靖国神社。21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称为“真榊”的祭品,日本厚生劳动大臣田村宪久、众议院议长伊吹文明、参议院议长山崎正昭也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真榊”。22日,日本总务大臣新藤义孝及超过140名日本国会议员参拜了靖国神社。28日,日本行政改革担当大臣稻田朋美参拜了靖国神社。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1日指出,靖国神社问题是日本自身的负资产。靖国神社中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日本领导人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反映了日本能否正视和反省日本军国主义那段对外侵略历史。日本领导人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还有的日本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这些都反映出日本内阁对待历史的错误态度。中方已向日方提出交涉,表明了我们的严正立场。

7月1日,日本政府就修改宪法解释以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达成一致,若该决议及其与安全防务政策相关的法律条款得到国会支持,日本将从根本上背离二战后所确立的

“专守防卫”安全政策。此外,决议中的模棱两可更是提高了日本采取军事行动的政策空间。7月11日,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与日本防卫相小野寺五典举行会谈,双方就安倍内阁解禁集体自卫权写入《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一事达成一致。同时,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也表态支持。

➤ 专家解读

日本战后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之一是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结果,如果连这一底线都否定,相当于否定二战以后国际社会的出发点。安倍政权若执迷不悟,只会在国际上越发孤立。

——吉田裕一 一桥大学历史学教授

日本在右倾化的道路上,确实应该是走得越来越远。而且这样下去,日本一方面说要和亚洲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而实际上他们所做的一切,不是相向而行,而是背道而驰,向这些亚洲国家伤口上撒盐,这一点上确实是日本政治生态的一个非常负面的表现。

——阮宗泽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

安倍希望任内突破二战后日本政治禁区、修改宪法,并非受民意支持率驱动,或者觉得现在形势比较有利,临时做出决定。这是以安倍为代表的日本右翼保守势力的长期国内政治目标。他们把修宪作为一个政治进程,不指望一步到位,而是有策略、有步骤地推进。

——刘江永 中国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副院长

安倍解禁集体自卫权,主要想达到内政外交两方面目的:在法律上解禁集体自卫权,提升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地位;实质性突破《日本国宪法》第九条规定的专守防卫政策,为修宪做准备。

——冯玮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日本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 学生视角

今天,我们反对、抵制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目的就是抵制日本右翼分子和军国主义分子的邪恶思潮蔓延,维护东亚的稳定和繁荣,促进亚洲的科学、和谐发展,为东亚各国、亚洲各国甚至为世界人民谋福利,只有在和平、和谐的国际环境下,人类才会得到科学地发展,人类才有希望。

——武燕 南开大学 2012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日本政界参拜靖国神社的目的主要有两个:

1、通过参拜,促使中方反应,刺激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并由此反作用于日本国内,从而有利于日本国内的进一步右倾化。日本国内主流思想的右倾化对日本政府推行政治、

军事大国战略是极其有益的,这能够使其修改日本的和平宪法以及对外实施攻势战略的阻力减小。

2、对中国实施战略试探。在国际局势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今天,苏联的解体,使得日本认为以往中国的战略作用已经丧失,且同时中国的崛起也妨碍了日本填补苏联退出东亚所留下的真空。故未来,中日两强在东亚的逐鹿,将在所难免。为此,日本为了测试中国对日本出击东亚,进行了一系列的战略试探,如参拜靖国神社、提升与台湾军事交流层级、将钓鱼岛收归国有、强化日美安保同盟、阻止欧盟对华武器军售等等。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仅是其众多试探行为之一。如果中方反应软弱,日本将在对华下一次交手(东海问题、钓鱼岛问题等)时则更趋强硬。然而日方的伎俩,中方已经看透,中国的强烈反弹使得日本在谋求政治大国的征途上损失惨重(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失败、联合国秘书长泡汤),这一系列的政治挫折使得日本安倍新政府不得不调整对华政策,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这不是安倍对历史观有重新认识,而是战略上的政治损失使得日本觉得已经有点得不偿失了。在日本,以前支持参拜的右翼人士也转向反对参拜,就是这个原因。而现在,日本有人想利用安倍停止参拜作为一张牌,妄图换取中国在某些方面的让步,我相信中国政府能够看清日本的这一目的,在东海、钓鱼岛、入常等原则问题上能够坚持原则,切不可使日本以虚换实的图谋得逞。

——杨致远 南开大学 2012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美国及其盟国的纵容与支持只会助长安倍政府在修宪问题上的嚣张气焰,而日本右倾态势的加剧显然不利于东亚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程齐佳徽 南开大学 2013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4. 南海局势再度升温

5月初,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的“海洋石油 981”钻井平台在中国西沙群岛毗邻区开展正常作业。此后,越南方面出动包括武装船只在内的大批船只对中国作业平台以及船只进行冲撞和干扰,纵容越南国内不法分子打砸抢烧,对中资企业及人员造成严重损伤。同时,国际方面,越南与菲律宾联手向中国发难,妄图利用多边会议将南海问题国际化。6月8日,越菲海军部队在中国南海南子岛举办足球、排球与拔河混合赛。

➤ 专家解读

如果菲律宾借助挑衅,拉美国在该地区与中国海空军进行一场大规模的作战行动,这是美国人不愿意做的。因为美国战略调整还没有到位,训练设施、作战基地还没有完全达到预先的指标,有没有获胜的把握,美国人的脑子里现在也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杜文龙 中央电视台《军事科技》栏目特约评论员

中国早就已经彻底输掉了一场国际舆论战。多年里,当中国沉浸在自己构建的“和平崛起”的话语体系时,有关国家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在国际舞台上作了充分的准备,等待着它们预期中的南中国海问题浮出水面。从知识(法律)体系来说,中国现在很难找到任何有

效的支持力量。一边倒的舆论环境已经形成，中国没有自己的话语权。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 学生视角

中国已经意识到了如今在南海问题的被动是其常年在南海舞台上不作为的结果，然而尽管我们想要做出努力，但事实上却举步维艰。

——李天翼 南开大学 2013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很难否定越菲如今在南海问题上的嚣张气焰与美国没有关系，毕竟奥巴马政府在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后，不仅加强了与越南的友好合作，而且还深化了和菲律宾的防务合作。

——江昊宇 南开大学 2013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5. 埃博拉肆虐

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披露，截至 8 月 20 日，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尼日利亚共计报告埃博拉病毒造成的累计感染病例达 2615 例，其中死亡病例高达 1427 例。作为一种致死率极高的烈性传染病，埃博拉病毒最初于 1976 年在扎伊尔爆发，后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最为严重的传染病之一。此轮埃博拉疫情于 2014 年 2 月在几内亚爆发，后迅速横扫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尼日利亚等西非国家，传播速度之快、牵涉国家之多、感染和死亡规模之大可谓史无前例，近乎达到失控状态。

➤ 专家解读

近来，埃博拉病毒疫情正在西非持续蔓延，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虽然远离埃博拉病毒，但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也不能高枕无忧。

——雷思海 《世界新闻报》评论主编

➤ 学生视角

在全球化的今天，埃博拉疫情的爆发已不单单是非洲或是欧美国家的大事，它越来越成为一个国际性问题。作为全球新兴大国的一员，中国更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江昊宇 南开大学 2013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尽管埃博拉致死率极高，其症状也十分惨烈，但我们不应对其产生恐慌，然而保持一定的警惕是必要的。

——华梦圆 南开大学 2013 级城市管理本科生

在埃博拉突破美国防线后，如今全球几乎是人人谈埃博拉色变，这不禁让人想到经典的好莱坞灾难片桥段。但愿同诸多美满结局一样，人们能够找到合适的抑制埃博拉疫情的方法。

——李天翼 南开大学 2013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6.2014 七国集团峰会

七国集团是主要工业国家会晤和讨论政策的论坛,成员国包括加、法、德、意、日、英、美。6月4-5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了G7峰会,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对于南海东海问题,声明称G7领导人严重关注南海和东海的紧张局势,反对任何在该地区的武力行为,“我们反对任何单方行动,反对任何一方通过恐吓、胁迫和武力声索其陆地和海上主权的行动”,但没有提及具体国家;对于乌克兰危机,声明称试图破坏乌克兰东部稳定的行动是“不可接受的”,必须停止,敦促俄罗斯承认乌克兰5月25日的总统大选结果,完成从俄乌边境撤军,并用自己的影响力,促使乌克兰民间武装“放下武器,放弃暴力”;同时警告加大对俄制裁,俄罗斯必须停止“破坏乌克兰东部稳定”的行动,否则随时准备加强有针对性的制裁,并执行额外的限制措施,以使俄罗斯付出更大代价。

➤ 专家解读

美欧强势支持乌克兰新政府,实则包含自身利益诉求。以西方价值取向为基础,稳定乌克兰局势将有助于美欧宣示外交成果,并免于陷入前途叵测的政治泥潭。G7首脑们貌似对俄同仇敌忾,态度强硬,实则各有盘算,首鼠两端,被排挤到门外的“插班生”反倒成了多方竞相搭讪的“香饽饽”。相比较而言,俄罗斯与欧洲地缘相邻,经济相通,能源相连,要欧洲紧跟美国步伐,“屏蔽”俄罗斯,实属空谈。G7盟国各有自己的盘算。西欧“三巨头”法、英、德在对俄问题上显出了强烈的独立倾向。

——陈旸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助理研究员

➤ 学生视角

在宣布不参加俄罗斯召开的G8峰会后,七国领导人在比利时召开了G7峰会。排除了俄罗斯的七国领导人之间也并不和谐。G7峰会齐国各怀心思,大家都有自己的地缘政治盘算。虽然俄罗斯成为他们的“靶子”,但是美欧日制裁俄罗斯的积极性并不相同。安倍不放过G7峰会上攻击中国的机会,但欧美不会轻易为日本利用。在全球权力变动之际,G7已解决不了全球问题(无论是传统安全问题还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全球治理需要更具包容性的机制,G7力量已然不足,更何况其本身并不团结一致。

——杨家嘉 南开大学2011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7.ISIS与伊拉克危局

长久的内战使得叙利亚很多地方出现权力真空,ISIS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崛起。ISIS全称是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由“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ISI)与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组织“救国阵线”联合组建,是逊尼派极端组织。2014年6月初以来,以ISIS为主的伊拉克反政府武装相继占领伊北部、西部和东部大片领土,并不断在伊拉克全国多地与伊政府军激烈冲突,导致大约20万人流离失所。6月29日,ISIS武装宣布正式建立“伊斯兰国(IS)”,“国土”从叙北部阿勒颇省横跨至伊东部迪亚拉省,头目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成为“哈

里发”(即国王)。8月7日,ISIS武装占领伊拉克全国最大的基督徒聚居区尼尼微省卡拉克什镇,致使当地数以万计居民逃至库尔德自治区。美国总统奥巴马授权在安全形势严峻的伊拉克对ISIS等反政府武装实施“针对性”空袭,对库尔德武装空投武器,以避免那里“可能发生的大屠杀”;同时宣布命令美国空军向伊拉克难民空投粮食、饮水等物资,实施人道主义援助。ISIS目前已对三名美国人质实施“斩首”。

➤ 专家解读

虽然ISIS的“建国”梦想可能很快就会破灭,但其开辟的恐怖活动新区——伊拉克-叙利亚已经成为了中东最突出的恐怖主义高发区。首先,虽然恐怖分子曾先后在也门和马里宣布“建国”,但ISIS“建国”的声势最大,攻势最猛,武装活动的经验也最突出。其次,ISIS拥有更多、更广的域外成员,这意味着它拥有更强的跨境恐怖袭击能力。其三,伊拉克~叙利亚恐怖主义高发区位于巴以冲突、逊尼派-什叶派冲突的中心地带,ISIS恐怖活动的影响更为复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从ISIS头目的哈里发封号、组织的名称、建国的愿景、结合社交媒体运作的手段等方面来看,ISIS与“基地”等传统恐怖组织已经有很大区别。比如,ISIS拥有极其娴熟的互联网传播技巧,许多西欧国家的年轻穆斯林正是在网络上受到ISIS的“感召”,自愿组织支持ISIS的聚会,甚至拿着自制的ISIS旗帜拍照,并将照片发到网上,更加壮大了ISIS的声势。有评论认为,“伊斯兰国”是2001年“基地”组织对美国发动恐怖袭击以来“国际‘圣战’的最大发展”,“标志着恐怖主义新纪元的诞生”。这不得不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

——张金平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伊拉克乱局的背后是教派矛盾痼疾难返,政府脆弱无力,军队外强中干,美国同样也难辞其咎。当初奥巴马之所以痛下决心撤军伊拉克,除了因为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付出了3.6万军人伤亡和近万亿美元损失的高昂代价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美国企图战略东移,遏制中国崛起。现在,面对伊拉克风云突变的局势,奥巴马似乎又走到十字路口,亚洲再平衡战略再一次面临考验。同时,中国的海外利益也受到威胁。如果极端分子控制当地油田,封锁石油运输,势必祸及中国在该地的经济利益,而且目前控制在“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手中的摩苏尔,拥有伊拉克北部重要的石油管线,可能影响中国在伊拉克的石油运输安全。

——孙冉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 学生视角

这次“伊黎”事件的发生虽然表面上是受到了美军撤离,伊政府决策失误及叙利亚内战等因素的影响。但是其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壮大,实际上还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首先,阿拉伯地区存在着国家认同缺失的问题,“伊黎”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缺失,从而能够迅速聚集力量,发展壮大。其次,阿拉伯地区也存在着严重的教派矛盾,这也为“伊黎”的出现提供了条件。虽然目前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开始对“伊黎”展开打击,但

是由于其自身实力较强, 西亚北非地区又为其生存提供条件, 因此目前有限的打击恐难以对其构成重大影响。

——宋勉 南开大学 2011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8. 苏格兰独立公投

自 1707 年以来并入英国以来, 苏格兰独立派一直努力推动“脱英”进程。9 月 18 日, 苏格兰正式举行公民投票, 以决定是否留在英国。独立公投结果当地时间 9 月 19 日早晨揭晓, 反对独立派赢得 55% 的选票, 赞成独立的选票比例为 45%。苏格兰将继续作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一部分。

➤ 专家解读

这次卡梅伦之所以同意进行公投, 一方面是对结果相对有把握, 因为一直以来, 苏格兰民众中坚定的独立派人数稳定在 1/3 左右, 不超过半数; 另一方面, 卡梅伦认为保守党政治上从苏格兰原本就没什么得分, 因此即便在公投中全力干涉并得罪苏格兰人也不会失去更多, 至少对明年的选举影响不大。况且他很清楚工党也要利用公投扩大其政治影响力, 简单的投票议题设定使得工党只能以选择独立的形式反对保守党, 这将是把双刃剑, 工党可能由此招致英国其他地区选民的不满。但卡梅伦始料不及的是, 当前欧洲各地民族主义情绪正浓, 苏格兰独立派情绪高涨, 运动开展得风生水起, 分离风险陡然加大, 保守党被迫在最后一刻, 与工党等其他政党联合承诺将对苏格兰进一步放权, 将独立的势头引向分权化, 并动员国内外各方力量息事宁人, 才化解了事先没有预见到的风险。由于多数的民众只看结果、喜看热闹, 因此卡梅伦这场政治“豪赌”可谓小胜工党, 赢得了政治同情分。然而细看下来, 为求大选得分, 不惜以国家分离与否做政治文章并挑起党争, 造成分化民族情绪的负面影响, 可谓之英国政治一大特色。对保守党来说, 苏格兰独立问题告一段落, 可松下一口气, 继续放权的政治承诺估计短期内不会兑现, 也许最终被证明是权宜之计, 未来甚至可能出现集权化反弹, 这些都且拖过明年大选再说罢。

——李维维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 学生视角

苏格兰公投, 对于英国而言, 是一次声誉和价值观上的巨大胜利, 大多数人都对这种宽容、民主的政治文化表达了赞许、惊叹, 尽管对于英国而言, 背后的利益考量并不是如此简单。事实上, 苏格兰独立的愿望一直都有, 且战后就一直为独立做着诸多准备, 越早进行公投, 形势越有利于统一。而对于苏格兰来说, 目前公投结果已经产生, 按照原有承诺, 英国需要下放更多自主权力给苏, 年底之前这份具体计划将会出炉, 其中会涉及到苏格兰关心的税收等问题, 但是, 需要更多权力还是更多经济支持, 后者似乎是苏格兰更为关注的。

——钱博 南京大学 2011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9.2014 美国中期选举

根据美国宪法,美国总统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国会选举每两年举行一次。其中一次国会选举与总统选举同时举行,另一次在两届总统选举之间举行。在两届总统选举之间举行的国会选举,通常被称为“中期选举”。中期选举大都在 11 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二举行。今年美国中期选举中,众议院全部 435 个议席、参议院 100 个议席中的 36 个以及 36 个州和三个美国海外属地行政长官席位都将进行选举。



投票开始前的最新民调显示,已经获得众议院控制权的共和党将赢得更多众议院席位,继续执掌众议院几无悬念;在参议院的控制权上,共和党和民主党还有一番较量。

2014 年 11 月 4 日,美国路易斯维尔,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出席庆祝集会。美国媒体统计称共和党已经获得 51 个参院席位,民主党则仅有 44 个,仍有多州的预测数据待统计。另外,路易斯安那州没有候选人得票过半,将进入 12 月的第二轮投票。

➤ 专家解读

作为美国总统,奥巴马本应该是民主党在选举时的“王牌”,但由于其执政以来推行的医改、移民政策备受争议,尤其因为美国经济没有明显好转,走势依旧疲软,导致众多中产阶级失望透顶。一方面奥巴马“不给力”,另一方面美国政治生态在时代变化的影响下,变得僵化、老化以及复杂化,民主党内面临分裂困境,可以说共和党就是利用复杂的生态环境,为自己赢得了获胜的先机。民主党失掉中期选举或许对他们而言“反倒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会让他们产生危机感,预计在中选之后民主党将重整旗鼓,准备推出下一届总统候选人,比如希拉里。

——庞中英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经济当然是一个重要问题,它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不过人们关心的还有外交政策议题,包括恐怖主义威胁,“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引发极大关注。另外,美国人还担心埃博拉病毒是否会引起一场健康危机,所以今年的中期选举经济与外交政策都是重要议题。

——达雷尔·韦斯特 布鲁金斯学会专家

10. 2014 APEC 会议

2014 年 APEC 会议是由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发起的会议,于 11 月中旬在北京召开,包含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部长级会议、高官会等系列会议。其中领导人峰会于 2014 年 11 月 10 日至 11 日在北京怀柔雁栖湖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峰会。此次峰会的主题是: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达成的主要成果包括中俄签署西线天然气协议、中美商务签证延伸至十年、中韩自贸区完成实质性谈判、通过《北京纲领》和《亚太伙伴关系声明》、批准 APEC《互联互通蓝图》、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发布《北京反腐败宣言》等等。



➤ 专家解读

APEC 上,通过对奥巴马访华的很多特殊安排,中方既表明了积极致力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真诚意愿,又充分彰显了中国坚定不移走自身发展道路、愿为国际事务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战略意志。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说到底是为了避免中美兵戎相见,是为了找到一种管理中美关系“竞争性共存”的方式。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实际上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然之举,是一场谁也输不起的博弈。但新型大国关系能否成功构建,还最终取决于中美两国国内的发展道路选择,从治国理政的高度深化两国元首的相互理解和尊重,有助于从根本上推动中美关系沿着积极方向走下去。

——赵明昊 当代世界研究中心

从中俄两国领导人每次会晤的言谈当中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当前大国关系深刻调整、不确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之下,中俄两个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的关系却稳步走向成熟,双边合作稳定发展,同时保持透明、开放的原则,不针对第三方,共同倡导新型安全观与合作观,以合作促安全,共同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承担起相应的义务和责任。之所以两国领导人都强调说中俄的战略合作达到“历史最好水平”,是因为两个大国不仅能够和平相处,共同发掘合作的巨大潜力,而且能够与地区国家一道,共同打造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

——孙壮志 中国社会科学院上合组织研究中心

➤ 学生视角

11 月 9 日习近平主席在 2014 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作了题为《谋求持久发展共筑亚太梦想》的演讲。习近平提出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点和机遇。中国经济发展在关键时期如何稳健持续是中心问题。有学者认为目前中国是债权经济,而非股权经济。中国经济是间接融资为主,银行就是一个债权。债权经济是造成现在很多企业和地方困难的根

本原因。中国应该发展股权经济，多同其他国家合作，与 APEC 成员国共同发现机遇，拓展市场。

——廖帆 南开大学 2011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在 APEC 期间，中韩自贸区结束实质性谈判，自贸区建设取得阶段性胜利。区域一体化在 WTO 多哈回合谈判停滞后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潮流。中韩自贸区的建立，不仅能为中韩两国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而且对促进地区经济融合，推动东亚一体化，提高东亚国际竞争力有着重要作用。中韩经济既有互补性又有竞争性，要建成涉及领域广、开放水平高的中韩自贸区，还要看两国在农业、钢铁等敏感领域的博弈。

——于凯玥 南开大学 2011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11.2014G20 峰会

2014 年 11 月 15 至 16 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在澳大利亚海港城市布里斯班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峰会。本届 G20 峰会的 3 个主题为：促进私营企业成长，增加全球经济抗冲击性和巩固全球体系。



➤ 专家解读

G20 布里斯班峰会后中国将成为 G20 核心领导者。第一，“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将引领未来世界经济发展方向。在 G20 布里斯班峰会上，来自各成员的一千条改革措施建议中，中国贡献了 15%。第二，中国将继续发挥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作用。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美国经济曲折复苏之际，中国正可以通过自身的发展对世界经济增长做出重大贡献。第三，中国将助力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将拉动全球经济的增长。“丝绸之路经济带”、“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等在内的投融资途径所带动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都将为 global 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第四，中国致力于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构建互利共赢的全球价值链，培育全球大市场，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第五，中国将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刘英日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合作研究部副主任

发达国家应正视全球经济力量格局的改变。近几年来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在 50% 以上，危机时期超过 70%。G20 也承诺要改革国际货币体系，这就需要尝试。近年人民币用于跨境贸易支付并逐步实现可兑换，金砖国家基建银行及其基金的建立等，都应被视为改革的端倪，G20 对此应给予理解和支持。危机已证明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存

在巨大隐患与风险，应支持各国使用负责大国稳定的货币来分散风险。

——张燕玲 中国银行前副行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 学生视角

G20 作为取代 G8 的当代重要全球经济合作论坛，通过 20 个成员国在国际经济、货币政策和金融体系等领域开展的开放性的对话，探讨解决实质问题的方案、试图在某些领域建立全球公认的标准，成为了一个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提供沟通对话机会的平台，中国在这其中的地位随着国家实力的增长也不断增加。如何让众多发展各不相同的国家之间达成共识并让议题走向更加务实的层面是 G20 峰会在机制架构上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

——江涵 南开大学 2011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在金融危机后，G20 作为一个国际机制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在促进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恢复以及各国经济的发展上起到重要作用。中国在 G20 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 G20 机制中国可以增强在其他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程康 南开大学 2011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整理：程康、郭晓琼、高振华、李天翼、杨至远、赵姝婧]

[责任编辑：高振华]

《新视界》2014 大事记

◆ 《新视界》编辑部新学期第一次会议顺利举行

2014年3月2日下午三点,《新视界》编辑部新学期第一次会议在范孙楼116室顺利举行。这次会议重点讨论了本刊冬季号的相关问题,也对《新视界》章程的修改和春季号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由主编吕海主持,编辑部的二十多名成员参加了这次会议。编辑部还讨论了在本月中下旬为低年级的同学筹备一个 Word 文字处理软件培训会等其他事宜。

◆ 《新视界》编辑部春季内部培训会顺利举办

2014年3月30日下午,《新视界》编辑部在范孙楼440室举办了 Microsoft Word 2010 软件使用方法培训会。本刊主编吕海和副主编郭晓琼为在场同学详细讲解了该软件的使用技巧和方法。

◆ 《新视界》编辑部成功进行换届选举

2014年4月27日,本刊编辑部在范孙楼440室举行了主编和副主编换届选举。2011级本科生刘芮宁当选为新一任主编,2010级本科生刘志、2011级本科生程康、于凯玥以及2012级本科生胡阳阳增选为新一任的副主编。

◆ 第二届“全球学与全球治理论坛”成功举办

2014年7月12日,第二届“全球学与全球治理论坛”在南开大学成功举办。此次论坛由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全球问题研究所,中央编译局全球治理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联合主办,来自南开大学、中央编译局、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华东政法大学、上海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天津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天津社会科学杂志社等二十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出席了论坛。

◆ 第四届“全国国际关系研究生学术论坛”成功举行

2014年7月13日,“国际关系现实与热点问题:理论、方法与实践”——第四届“全国国际关系研究生学术论坛”在范孙楼举行。来自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外交学院、南京大学、上海社科院、吉林大学、辽宁大学、暨南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江苏省委党校、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等十余所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的二十多位青年学者及博、硕士研究生参加了此次学术会议。

[整理:杨致远]

[责任编辑:高振华]

名家访南开

【编者按】在各方的帮助和支持下，过去的一年里，有多位名家来到南开举办讲座或交流会议，为南开的老师和同学们传道解惑，他们有的是国际关系学界的大师，有的虽非专职教师但对国际关系学界有重大影响。因此，此次“年终特辑”也收集了汇总了一年来到访南开的名家，希望能够记录下他们的风采和神韵。

♣ 洛朗·法比尤斯

【嘉宾简介】



洛朗·法比尤斯
Laurent Fabius
职业：法国政治家

身份：法国外交部部长

个人经历：1984年至1986年任法国总理。2000年至2002年任法国经济、财政和工业部长。此外，他于1988年至1992年、1997年至2000年两次出任法国国民议会主席。目前任法国外交部部长。

【来访南开】

2月24日，值中法建交50周年之际，法国外交部长法比尤斯访问南开大学，受聘南开大学国际关系与全球治理首席教授并做客“周恩来论坛”。

校党委书记薛进文为法比尤斯授“南开大学国际关系与全球治理首席教授”水晶碑，校长龚克主持仪式。外交部欧洲司副司长王顺卿，天津外办副主任林怡，副校长关乃佳以及外交部、天津市外办相关负责人出席仪式。

受聘仪式后，法比尤斯做客“周恩来论坛”，并发表了题为“21世纪全球治理”的演讲。在演讲中，法比尤斯指出，法国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随着双方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国际角色日益重要，1997年建立了全球战略关系，双方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以及全球事务展开合作，中法战略关系可以作为全球治理的典范。法国外交有四个目标，可以用四个词来总结，分别是和平、欧洲、发展与经济。

【嘉宾观点】

法比尤斯认为,本世纪,中国影响力日益提高,欧洲稳步发展,中法应求同存异,加强交流,在各种问题上加强沟通合作,虽然发展道路不同,但条条大路通罗马。中法关系也将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

❖ 理查德·米勒**【嘉宾简介】**

理查德·米勒
所在单位: 康奈尔大学

身份: 康奈尔大学哲学院哈钦森伦理学与公共生活讲座教授。

代表作:《全球化的正义观: 贫穷和权力的伦理》、《分析马克思: 道德权力和历史》等

【来访南开】

4月14日,康奈尔大学哲学系理查德·米勒(Richard Miller)教授做客周恩来论坛,为南开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防止中美新冷战噩梦”的精彩讲座,讲座由南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张睿壮教授主持,政府学院部分师生参加。

米勒教授首先从军事和经济等角度概述了现阶段的中美关系。他指出虽然中美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中国在短期之内也不会对美国的全球优势地位直接构成威胁,但中美之间可能出现新冷战仍然是可能发生的一种结果,因此采取预防措施以避免这种危险是十分必要的。米勒教授随后从中美两国分别出发,从外交决策者、普通民众以及利益三个维度剖析了可能造成中美新冷战的原因。在他看来,可能造成中美冷战危机的原因,从美国的角度而言,便是美国外交决策者保持霸权地位的承诺、民众对保持霸权的普遍愿望以及金融利益、自然资源和美国想要维系一个支持自己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崛起,中国对全球影响力有所追求,在领土、自然资源以及国际货币制度等问题上会有自己的政策立场。最后,

米勒教授指出,减少中美新冷战危险的发生,依赖于决策者以及两国人民,他从外交战略、道德以及国内政治的角度阐述了减少危机的方法。

在互动环节,米勒教授与在场师生就亚太地区的中美关系、霸权转移与大国关系、中国政治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刻而热烈的讨论。

❁ 陈志瑞

【嘉宾简介】



陈志瑞

所在单位:《外交评论》

个人经历: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编辑部主任、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执行主编。

身份:
外交学院《外交评论》执行主编、编审。

【来访南开】

5月23日,陈志瑞教授围绕“中国文化的姿态及其转向”做主题报告。他从个人的成长、求学及工作经历引入,阐述中国文化对中国公民个体发展的影响。接着,他对新中国成立后所经历的文化保守主义阶段与英国埃德蒙·柏克所处时代的文化保守主义阶段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二者在性质和内涵上都具有不同的特点。而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姿态更倾向于一种“文化国际主义”,这对中国融入世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也给中国外交带来了新的挑战。

【嘉宾观点】

先后任《欧洲研究》、《国际政治研究》和《外交评论》主编,在国内的国际关系领域享有盛誉,提出用“新古典现实主义将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两个层次的因素结合起来解释国家对外战略和行为”。

♣ 李慎明

【嘉宾简介】



李慎明

所在单位：(原) 中国
社会科学院



个人经历：
1970 年参加工作，197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研究生班毕业。

身份：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政治学会会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评审委员会国际问题组组长。

经典著作：
《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大党建》等。

【来访南开】

6 月 11 日，李慎明做了主题为“中国梦，我的梦——信仰的机遇与挑战”的讲座。他从中国梦的内涵、拥有什么样的信仰才有意义、正确信仰的机遇与挑战等方面出发，鼓励大家要坚持正确理想信念，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

【嘉宾观点】

李慎明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全球化理论、党的建设理论等。他经常发表文章批判欧美等国民主的虚伪，认为西方民主没有普世意义，中共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才符合中国国情，搞一人一票的竞选制必然会很快步入动荡、动乱甚至内战的局面。2013 年以反“历史虚无主义”为名，否认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

❁ 文正仁

【嘉宾简介】



文正仁

所在单位：韩国延世大学

个人经历：
1977 年于延世大学毕业，1981 年在美国马兰里大学取得硕士资历，于 1984 年取得博士资格。

身份：
韩国延世大学政治外交系教授，美国马里兰大学博士，并曾兼任加州圣地亚哥大学和美国杜克大学的客座教授。

经典著作：
《中国崛起大战略——与中国知识精英的深层对话》、《探讨中国的未来》等。

【来访南开】

9 月 11 日，文正仁先生访问我校并为南开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中国崛起与朝鲜半岛的未来：关于战略选择的争论”的主题讲座。文正仁教授的讲座围绕中国崛起与朝鲜半岛局势变化展开，首先分析了当前的亚太局势和国际局势，之后通过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以及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差异对比了中美两国的国家实力，同时介绍了学术界对于中国崛起的几个战略视角。

【嘉宾观点】

认为韩国不能简单地用西方人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否则将不可避免地会把中国当成威胁并使自己陷入在经济上跟中国做生意赚钱，但在安全方面不得不靠加强韩美同盟以牵制中国”的两难境地。这种自相矛盾的“双重认同”不利于中韩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他主张：韩国应以崭新视角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国，因为“中国的未来，已经攸关韩国的未来”。

♣ Kerry Brown

【嘉宾简介】



Kerry Brown
所在单位：悉尼大学

个人经历：
曾在日本、中国内蒙古等地工作，对中国当前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有较深入的研究。

身份：
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欧委会“欧中研究咨询网络”（ECRAN）主持人

经典著作：
《挣扎的巨人——21 世纪的中国》、《当代中国》等。

【来访南开】

10 月 21 日，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政治学教授 Kerry Brown 访问我院，并做主题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消费、服务、城市化和分权化”的讲座。副校长朱光磊教授、亚洲研究中心、中国政府与政策联合研究中心负责人及学院部分研究生、博士生参加讲座。

Brown 教授围绕“中国未来的发展”这一主题，以如何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诸如西欧、澳大利亚、美国的合作为切入点，从经济发展、消费水平、金融行业及技术创新四部分进行分析。Brown 教授认为，分析中国当前的发展应首谈经济，相比欧盟国家平均经济水平差距较小而言，中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消费水平较低。要建立健全金融体系，互信和知识革新必不可少。中产阶级作为中国城市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潜力巨大。创新是中国未来改革和发展的突破点，中国的发展必须营造良好的合作环境，在技术上学会选择与合作，同时注重提高国内市场经济水平、促进城市化、创建环境友好型社会及促进国际合作。中国未来的发展在环境、资源和国际资本等方面仍面临政治性挑战。对此，中国的未来发展潜力仍需进行选择 and 拓展，促进国家间的选择性合作十分必要。

最后，Brown 教授与在场师生进行了积极互动，耐心地回答学生们的提问，为学生们拓展研究视野提供了有益思路。

【嘉宾观点】

Kerry Brown 作为国际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受到学界和媒体界极大关注，曾表示“美国时代已经结束的论调为时过早，中国进入转型艰难阶段”，其最新著作《上海 2020》中认为

“上海正在回归其作为交汇点的历史角色”。

[整理: 高振华]

[责任编辑: 高振华]

· ·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新西兰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 · · · ·

近年来,我国和新西兰之间合作日益密切,互信程度日益提高,2014年11月19日至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对新西兰进行了一次国事访问,在访问期间,双方都积极评价两国关系取得重大成就,为了更好地指导双边关系未来发展,双方决定将中新全面合作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这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下:

一、双方强调高层交往对保持和发展强有力的双边关系具有引领作用。

二、双方重申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全面发展两国关系,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新西兰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三、双方积极评价两国经贸合作取得的长足发展以及《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对促进贸易增长、深化经济联系、创造就业、支持创新和繁荣等方面的贡献。

四、双方同意巩固和扩大农牧业领域务实合作,加强农牧产品贸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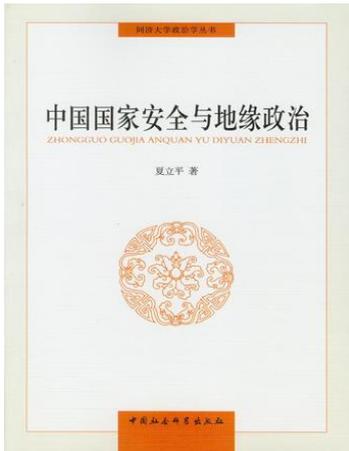
五、双方在采取有效措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方面具有共同利益,并在习近平主席访新期间签署了两国政府气候变化合作安排。

材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新西兰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2014年11月20日,惠灵顿)》,《人民日报》,2014年11月21日第002版,要闻。

[整理: 江昊宇、唐铭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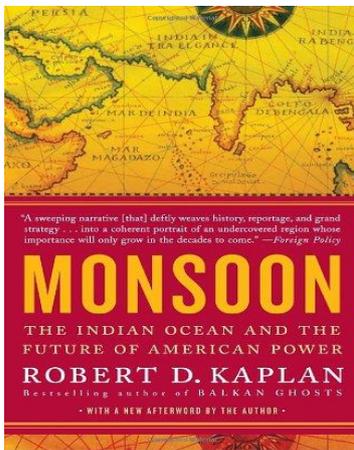
新书架 (四)

【编者按】自 2013 年 3 月以来,习近平主席已完成 10 次出访,足迹遍及亚、非、欧、北美、南美五大洲的 28 个国家,以大范围的地理位移勾勒出一幅彰显国际格局的地缘大地图。地缘政治通过地理要素等地域形势分析甚至预测世界和地区的战略形势和政治行为,对国家的战略制定产生重大影响。本期新书架以地缘政治为主题,介绍近年研究地缘政治的书籍,以飨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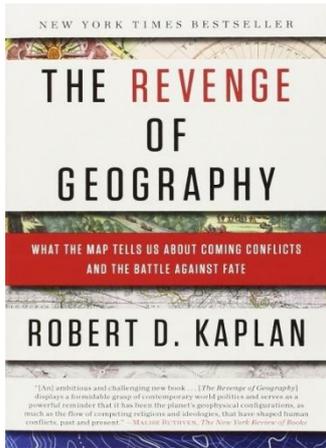
夏立平:《中国国家安全与地缘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本书以在国际地缘政治环境中如何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为主线,深入研究中国国家安全理论与战略的演变与发展、地缘政治理论的演变与内涵,以及地缘政治理论对中国国家安全理论与战略的影响,全面剖析了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的演变、特点和发展趋势,详尽研究中国面临的核地缘政治环境的演变与特点,并论述中国的核战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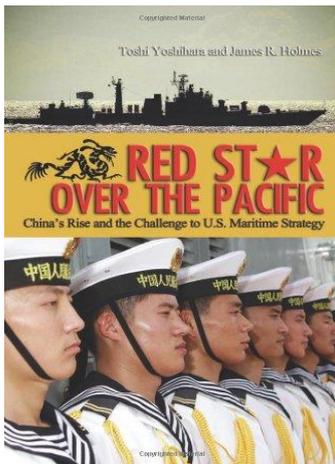
罗伯特·D·卡普兰:《季风:印度洋与美国权力的未来》,纽约:兰登书屋,2011年。(Robert D.Kplan, *Monsoon: The Indian Ocean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1.)

美国版的世界地图总是将西半球置于中上方,而印度洋几乎消失殆尽,这间接反映了西半球在已经远去的 20 世纪是全球地缘政治中心的事实。然而到了 21 世纪,这一切将翻天覆地的变化。本书深度审视印度、巴基斯坦、中国、印度尼西亚、缅甸、阿曼、斯里兰卡、坦桑尼亚等印度洋周边国家。作者向我们展示了活力四溢的“季风亚洲”对美国权力的未来至关重要。从非洲之角到印尼群岛以及这片辽阔海域的其他广大沿岸地区,卡普兰用游历的足迹和寻访的热情向我们展示了人口、气候、宗教和政治对这片动荡地带的的影响,预言了如果美国希冀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占据应有之地,季风亚洲必将成为其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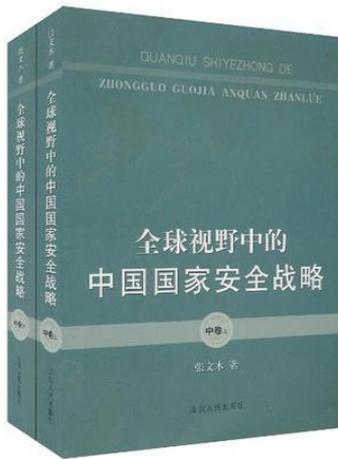
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无法回避的大国冲突及对地理宿命的抗争》，纽约：兰登书屋，2013 年。(Robert D.Kplan, *The Revenge of Geography: What the Map Tells Us about Coming Conflicts and the Battle Against Fate*,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3.)

《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以地理为主线，通过地图导出地缘政治，并将地理作为手术刀，结合其毕生观察、发现和相关理论来剖析国际关系和全球化中无法解释的冲突。同时，他以地理的逻辑解释历史现象，解析当前世界地缘政治热点，预测未来全球事件的演变。通过对气候、地势和地理位置的考察，卡普兰回顾和分析了欧洲、俄罗斯、中国、印度、土耳其、伊朗和中东等地的历史热点和潜在危机，并全面地预测了欧亚大陆的下一个冲突周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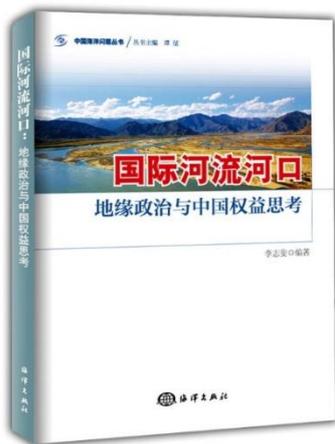
【日】吉原恒淑、【美】詹姆斯·霍姆斯：《红星照耀太平洋：中国崛起与美国海上战略》，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出版社，2013 年。(Toshi Yoshihara, James Holmes, *Red Star over the Pacific: China's Rise and the Challenge to U.S. Maritime Strategy*,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0.)

该书作者集关于亚洲的一手材料、运用汉语资料的能力，以及海战经验和海权理论于一身，评估了中国海权的崛起将如何影响美国在亚洲的海洋战略，并认为中国正在为挑战美国在亚洲海域的优势地位做基础性工作。作者回归马汉的海权理论，思考了海洋的战略思想如何影响北京决策，并将中国的地缘战略困境与一个世纪前的德意志帝国所面临的困境相比较，考察了指引中国海军行动的理念、策略以及中国海军的能力，并对中国弹道导弹潜艇舰队的实力进行了评估。



张文木：《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 年。

该书主要研究世界地缘政治三大支点即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地区的特征及其差异，以及基于这种差异的世界主要国家力量彼此作用可达到的极限和底线。在前两项研究的基础上，描述出中国未来崛起的可为空间和不可为空间。本卷从俄罗斯写到印度和印度洋，内容分三个方面：（1）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特征：沙俄帝国和苏联的兴亡经验及其中反映出来的俄罗斯介入，尤其是强力介入世界事务力量的极限与底线。（2）印度洋地区的地缘政治特征及此间的大国博弈规律。（3）提出国家崛起的非线性规律，认为世界性危机也是大国崛起的契机。同时，笔者还就北极解冻的气候变化提出预警。



李志斐：《国际河流河口：地缘政治与中国权益思考》，北京：海洋出版社，2014 年。

国际河流河口是连接内陆与海洋的中端，是陆地国家主权权益向海洋的延伸，是海洋国家海洋权益的重要支点。如今，中国正面临着“南失海岛，北无出海权”的窘境，中国的河口权益及延伸出来的海洋权益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作为海陆兼备的大国，中国的国力和海上经济利益在发展，如何维护在国际河流河口上广泛的战略利益，已经成为未来政治与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课题。

[整理：姚丽丽、李志宇、丁敏潇]

[责任编辑：江昊宇]

♣学术交流♣

文正仁教授访问南开并做客周恩来论坛

(转引自政府学院网站新闻) 9月11日, 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韩国延世大学政治外交系教授文正仁先生访问我校, 并作客“周恩来论坛”, 为南开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中国崛起与朝鲜半岛的未来: 关于战略选择的争论”的主题讲座。副校长朱光磊、国际学术交流处、哲学院、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相关负责人出席, 讲座由哲学院院长王新生教授主持。

文正仁教授的讲座围绕中国崛起与朝鲜半岛局势变化展开, 首先分析了当前的亚太局势和国际局势, 从经济往来、安全防务、中美两国在亚太及全球的竞争等方面分析了东北亚局势的走向; 之后通过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以及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差异对比了中美两国的国家实力, 讨论中国是否会取代美国成为新的强国; 同时介绍了学术界对于中国崛起的几个战略视角: 和平发展论、和平崛起论、大国崛起论。文教授认为, 中国崛起对于朝鲜半岛来说越来越重要, 中国对于来自外部国际社会的挑战和刺激会有自己的反应, 并非没有成为大国的可能。文教授通过详细的数据列举, 分析了中美两国的实力差异, 并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韬光养晦”和“奋发有为”二种外交路线的争论是可以互补共存的。最后, 文教授认为, 中国的崛起是历史的必然, 国际社会的其他大国必须接受这个事实, 中美两国应当携手共进, 在东北亚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秩序。

讲座结束后, 文教授接受了在场师生的提问, 就中日韩和平发展空间问题、朝鲜半岛的未来、中国崛起的战略视角争论、中国在对内事务和对外事务上能否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最后, 文教授与在场师生分享了自己在学习哲学、从事政治学研究方面的心得体会。

第三届公共领域冲突管理学术研讨会召开

(转引自政府学院网站新闻) 2014年10月18-19日, 第三届公共领域冲突管理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明珠园举行。来自国家行政学院、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20多家科研机构的40余名专门从事公共冲突管理研究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与会学者围绕公共领域冲突管理的制度建设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在公共冲突管理的制度建设、学科发展、研究方法提升等方面取得了广泛的共识。

此次会议由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冲突管理研究中心主办, 该中心近些年出版了《公共冲突管理》、《中国公共冲突化解的机制、策略与方法》、《中国公共冲突的起因、升级与治理》等著作和多篇学术论文, 对公共领域冲突管理学术领域的开拓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悉尼大学教授 Kerry Brown 谈中国未来的发展

(转引自政府学院网站新闻) 10 月 21 日, 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政治学教授 Kerry Brown 访问我院, 并做主题为“中国未来的发展: 消费、服务、城市化和分权化”的讲座。副校长朱光磊教授、亚洲研究中心、中国政府与政策联合研究中心负责人及学院部分研究生、博士生参加讲座。

Brown 教授围绕“中国未来的发展”这一主题, 以如何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 诸如西欧、澳大利亚、美国的合作为切入点, 从经济发展、消费水平、金融行业及技术创新四部分进行分析。Brown 教授认为, 分析中国当前的发展应首谈经济, 相比欧盟国家平均经济水平差距较小而言, 中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消费水平较低。要建立健全金融体系, 互信和知识革新必不可少。中产阶级作为中国城市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展潜力巨大。创新是中国未来改革和发展的突破点, 中国的发展必须营造良好的合作环境, 在技术上学会选择与合作, 同时注重提高国内市场经济水平、促进城市化、创建环境友好型社会及促进国际合作。中国未来的发展在环境、资源和国际资本等方面仍面临政治性挑战。对此, 中国的未来发展潜力仍需进行选择 and 拓展, 促进国家间的选择性合作十分必要。

最后, Brown 教授与在场师生进行了积极互动, 耐心地回答学生们的提问, 为学生们拓展研究视野提供了有益思路。

Kerry Brown, 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政治学教授, 欧委会“欧中研究咨询网络”(ECRAN) 主持人, 曾在日本、中国内蒙古等地工作, 对中国当前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有较深入的研究。

爱尔兰德博达研究所所长访问南开并讲座

(转引自政府学院网站新闻) 10 月 23 日, 爱尔兰德博达研究所所长 Peter Emerson 教授应亚洲研究中心邀请, 为我院学生做了主题为“Borda 选举策略”的讲座。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杨龙教授主持讲座, 学院部分研究生、博士生参加。

Emerson 教授围绕“Borda 选举策略”进行讨论, 以如何选择适宜的选举策略为切入点, 主要从选举的相关理论介绍、如何做决定、选择适宜的选举方式等三部分进行讲述, 并最终“为存在争议的社会选择问题提供适宜的决策机制”为研究宗旨。具体地, Emerson 教授先介绍了简单多数投票 (majority voting) 及共识投票 (consensus voting), 并指出前者容易忽视少数人的利益, 而后者则是反复的讨论协商, 致使效率低下。而为了使在场的学生更好地理解简单多数投票和共识投票存在的固有缺陷, 同时为了更生动地引出“Borda 矩阵模型投票” (Borda matrix vote), Emerson 教授与同学们做了两个简单的小实验。通过两个实验, 使在场师生更加形象地理解了 Borda matrix vote 的实用价值, 即“Nobody win nothing, nobody win everything, everybody win something”。

最后, Emerson 教授与在场师生进行了积极互动, 耐心地回答学生们的提问, 为学生们拓展研究视野提供了有益思路。

Peter Emerson, 爱尔兰德博达研究所所长, 该研究所旨在推动在所有存在争议的社会选择问题中使用广泛的投票程序, 其主要方法是 Borda 计数规则。

♣ 师生活动 ♣

《新视界》秋季号例行会议顺利召开

(通讯员: 胡阳阳) 2014 年 10 月 26 日下午 3 点, 《新视界》秋季号例会在范孙楼 116 顺利召开。共有来自国关系各年级的 10 余位编辑部成员出席了会议。会议由现任主编刘芮宁主持。会议首先进入刊物“挑错”环节。与会同学踊跃发言, “挑”出了“秋季号”存在的诸多细节问题。刘芮宁将大家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记录, 并指出栏目责编要善于总结常见问题, 避免同类错误的反复发生。

接下来, 会议进入自由讨论和“冬季号”动员环节。《新视界》创始人之一的董柞壮学长向在座的编辑部同学动情讲述了《新视界》的诞生历程和自己的学术感悟。他特别强调《新视界》是鼓励创新的期刊, 希望大家能积极发挥自身创造力, 力争将《新视界》做成一本有新意、有特色的学生刊物。现任副主编刘志学长同样向大家表示了要发扬创新精神的殷切期望。其后, “冬季号”执行主编胡阳阳汇报了“冬季号”各栏目的进度情况。

最后, 主编刘芮宁公布了“秋季号”的优秀栏目名单, 并向出席会议的优秀栏目代表颁发了奖品。会议始终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进行。

♣ 校外短讯 ♣

北京大学

● 2014 年 10 月 23 日, 第二届“北京大学·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国家治理的中国经验’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廖凯原楼 134 会议室成功举办。来自北京大学、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 20 余位教授和研究生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 2014 年 9 月 17 日, “国家治理论坛: 马来西亚政治变革与马中关系”报告会在北大举行。应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和北京大学政治发

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邀请, 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高级讲师饶兆斌博士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就近年来马来西亚国内政治生活演变情况、马来西亚与中国的关系等问题发表演讲。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主任燕继荣教授主持活动并参与话题讨论, 政府管理学院研究生参加此次讲座并互动。

清华大学

● 11 月 14 日,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做客清华大学时事大讲堂第 160 讲, 对话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白重恩、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以及中

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并结合其著作《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就贫富分化与我们的未来展开了深入探讨。

●10月16日-19日,清华大学原校长、高等研究院院长顾秉林院士应邀赴美,出席了主题为“研究型大学如何应对全球挑战”的第五届麦道国际学者计划学术论坛,在论坛上作特邀讲演,并访问了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与校友座谈。

●10月29日,阿富汗总统穆罕默德·阿什拉夫·加尼(Mohammad Ashraf Ghani)访问清华大学,并在清华主楼报告厅就推进亚洲一体化发展发表演讲。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在演讲前与加尼总统进行了会谈。

●9月27日上午,在优美的草原歌声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文明联盟全球媒介素养与跨文化对话教席大会拉开了帷幕。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瑞典、芬

兰、巴西、埃及、摩洛哥等15个国家的一百多名媒介教育工作者和学生代表参加大会。此次大会由教席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办,为期两天。

复旦大学

●2014年11月13日上午,法国外交部政策分析中心 Vilmer 博士访问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并做了《2025年的两极世界:美国与中国》的讲座,对中美的关系与危机管理体制做了探讨,取得良好效果。

中国人民大学

●2014年11月6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成功举办“中东地缘政治转型:来自中国与以色列的观点”的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深入分析中东地缘政治,达到了学术创新,政策咨询,社会服务的目标,效果良好。

[整理:程康、高振华]

[责任编辑:李安琪]

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科研简报

(2014 年 9 月——2014 年 12 月)

1. 韩召颖、田光强:《“全球摇摆国家”与美国的霸权护持战略》,《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6 期。

摘要:在自身实力不断衰落的情况下,美国想借助于实力不断上升的新兴国家以维护现存国际秩序。由此美国学界提出了“全球摇摆国家”这一概念。所谓“全球摇摆国家”,主要指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四国,其主要特征是,强大且快速增长的经济;在一个或多个地区占据中心地位;民主政体以及希望改革国际秩序,但并不寻求推翻现存国际秩序。美国企图在适当满足其变革诉求的基础上,使其坚定地支持现存国际秩序。这是美国维护其霸权地位的重要战略手段。然而,顺应大多数国家的诉求,改革现存国际秩序以使其更公正合理,才是维护现存国际秩序的根本之道。

关键词:国际秩序;美国霸权地位;“全球摇摆国家”

作者简介:韩召颖,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田光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研究生。

2. 刘丰:《单极时代的权力政治》,《国际关系研究》2014 年第 3 期。

作者简介:刘丰,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副教授。

3. 刘丰:《概念生成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国际政治研究》2014 年第 4 期。

摘要:概念生成是社会科学领域知识生产的基本维度,也是进行理论构建和创新的重要方式。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实践表明,提出全新概念、重新界定既有概念及概念的跨学科引入和转换是实现理论创造的主要途径。近年来,一些中外学者尝试发掘源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经验、反映中国思想传统文化的概念和话语,运用它们来修正根植于西方经验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存在的不足,由此展现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概念在丰富国际关系理论知识体系方面的价值和潜力。中国概念的发掘与植入需要遵循概念创新和理论创造的基本原则,在强调中国经验和文化传统特殊性的同时,也应注重社会科学知识的普遍性和共通性,以便让中国概念适用于解释更加广泛的国际政治现象和对外政策行为。

关键词:国际政治理论;概念生成;理论创新;中国概念

4. 王石山、韩召颖:《美国为何援助国际危机中的盟国(1946-2006 年)》,《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 8 期。

摘要:美国为何援助国际危机中的盟国? 尽管既有的四种理论——实力-利益分析、制度主

义、声誉重要论和相似政体互助论——为这一问题提供了部分知识,但由于多数理论没有考虑美国及其联盟政策的特殊性,因而不能有效解释美国的联盟援助行为。凭借对美国及其联盟政策的特殊性的分析,作者提出“条件性护权理论”,认为美国援助盟国的主要动机是为了维护美国的权力,但这种动机的强弱受到危机与美国联盟义务的关联度、盟约的保留条款的限制。它假设在以下三种情势中,美国更可能援助国际危机中的盟国:(1)危机威胁美国的权力;(2)危机与美国的联盟义务直接相关;(3)美国与盟国的联盟条约中没有保留条款。Logistic 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既有四种理论的多数假设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实力变量和制度化变量除外),而条件性护权理论的三个假设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对美国的联盟援助行为有较强的解释力。据此,条件性护权理论建议,中国应谨慎而明智地使用实力,帮助美国“管理”盟国。

关键词: 美国外交决策; 回归分析; 联盟援助; 国际危机; 条件性护权

作者简介: 王石山,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研究生。

5. 吴志成:《国际体系仍然处于多极化进程中》,《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7期。

作者简介: 吴志成,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6. 徐振伟:《转基因技术风险及其控制探究》,《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摘要: 转基因技术自诞生之日起,就备受争议。这种争议与转基因技术存在的潜在风险诸如健康风险、生态风险、经济风险、伦理风险等密切相关。针对这些风险,美国和欧盟分别从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层面制定了转基因技术安全应用所遵循的原则,并采取了一系列对于转基因风险的应对措施,这些原则和措施对于中国有较强的借鉴意义。转基因技术的应用正与我们日常生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只有正确分析和处理其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引导转基因技术良性发展,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领域的全局出发理性运用,才能让转基因技术真正造福人类。

关键词: 转基因技术; 风险防控; 美国; 欧盟; 中国

作者简介: 徐振伟,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副教授。

7. 杨雷:《俄乌天然气冲突背后的大国能源博弈》,《国际石油经济》,2014年第8期。

摘要: 在俄乌冲突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乌克兰并未屈服。这场非对称性的冲突背后存在着美欧对乌克兰的多方支持。欧盟对俄罗斯存在能源上的较强依赖关系,这使欧盟无法成为乌克兰的坚定靠山。美国为了贯彻其重构欧洲能源格局、挤压俄罗斯地缘政治空间的目标,是乌克兰危机背后的真正推手。美俄在能源领域的全球竞争对亚太能源格局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并对中俄能源合作构成正面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 天然气; 俄罗斯; 乌克兰; 冲突; 美国; 能源博弈; 中国; 合作

作者简介: 杨雷,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副教授。

8. 杨雷:《中俄日三角关系的互动规律》,《太平洋学报》,第 22 卷,第 9 期(2014 年 9 月)。

摘要:近年来,中日关系的不稳定引发俄日、中俄关系的变化。本文通过对中俄日三角关系及其相互影响规律的研究,认为日本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有着多层的战略考虑,其基本意图是满足国内经济需求,改善日俄关系,平衡中国的崛起。从长远来看,日本虽极力拉拢俄罗斯,但对中俄两国合作产生的负面作用有限,中俄关系的发展前景更为乐观。在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加强的趋势下,中俄日三角关系的互动始终呈现两边长、一边短的状态,这与日本和美国建立、发展紧密的同盟关系,从而对中俄两国构成直接的安全威胁有关。受中俄日三角关系特点的制约,东北亚地区的多边合作很难展开。

关键词: 三角关系; 中日关系; 俄日关系; 中俄关系

9. 杨娜:《低地国家的国际关系研究评析》,《教学与研究》,2014 年第 8 期。

摘要: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国际关系研究与政治学、公共管理、国际法等学科相结合,依托从事国际关系与欧洲研究的相关高校、独立科研机构与智库,采用经验与比较的研究方法,以欧洲一体化与欧洲治理为主要研究议题,进而扩展到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研究。低地国家的国际关系研究呈现出与学界主流接轨、国家规模限制研究视野、注重跨学科与跨国合作研究、研究成果对政府决策影响有限等特点。

关键词: 低地国家; 国际关系研究; 欧洲一体化; 全球治理

作者简介: 杨娜,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师,博士。

10. 杨娜:《法国的文化外交及其启示》,《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4 期。

摘要:受制于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困扰和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法国的文化外交面临诸多新的挑战,不仅发展动力不足,难以在欧盟中脱颖而出,而且越来越面对新兴国家文化外交的强力竞争,也遭受美国文化的挤压。新时期法国的文化外交注重利用高科技向外推广本国文化,通过领导人积极参与、设立新机构、利用法语优势、以对外文化交流为方式,促进和推动文化外交。法国文化外交的有效开展也给崛起进程中的新兴国家发展文化外交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借鉴与启示:发展多样化的文化外交新形式;淡化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以扶植国内文化发展为基础,扩大其海外影响力;推广文化与增加经济收益相结合。

关键词: 法国; 文化外交; 法语联盟

11. 杨娜、吴志成:《欧洲视域下的国际关系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 8 期。

摘要: 欧洲的国际关系研究具有深厚的思想文化渊源和学术理论基础。以马基雅维利、格老秀斯、洛克、康德等为代表的欧洲思想家和政治家创造性地发展了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国际法、社会契约、国家分权等概念或理论。欧洲的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虽然屡经挫折,但是始终学脉不断,逐渐从法学和政治学科中独立出来,形成了有别于美国主流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特色。它既有占据国际学术前沿的和平与安全研究、欧洲一体化与欧洲治理研究、全球治理以及国际社会理论研究,也有诸如年鉴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等坚守欧洲学术传统的理论流派。还有一些植根于欧洲的理论或在美国发扬光大,或被美国主流研究所同化。由于具有自身特有的历史文化、学术传统和学科结构,欧洲的国际关系研究表现出整体发展不平衡、开放性与封闭性并存、面临保持传统与美国化的两难选择、研究领域趋同、偏爱规范研究方法等特点,也面临着语言障碍、研究差异大等诸多不利条件。

关键词: 欧洲视域; 国际关系研究; 欧洲一体化; 和平研究; 安全研究

12. 张睿壮: 《国际政治中的“新”与“旧”》, 《国际关系研究》2014 年第 3 期。

作者简介: 张睿壮,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国际关系中文核心期刊最新电子论文篇目信息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 8 期

1. 孙德刚: 《论新时期中国在中东的柔性军事存在》, 第 4-29 页。
2. 任晓: 《论中国的世界主义》, 第 30-45 页。
3. 杨娜、吴志成: 《欧洲视域下的国际关系研究》, 第 46-63 页。
4. 董亮、张海滨: 《IPCC 如何影响国际气候谈判》, 第 64-83 页。
5. 张茗: 《如何定义太空: 美国太空政策范式的演进》, 第 84-106 页。
6. 王石山、韩召颖: 《美国为何援助国际危机中的盟国(1946-2006 年)》, 第 107-134 页。
7. 韩剑、徐秀军: 《美国党派政治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第 135-154 页。

《当代亚太》2014 年第 4 期

1. 左希迎: 《美国战略收缩与亚太秩序的未来》, 第 4-28 页。
2. 周方银、李源晋: 《实力、观念与不对称关系的稳定性》, 第 29-54 页。
3. 李开盛: 《朝鲜拥核战术何以奏效?》, 第 55-68 页。
4. 李俊久、姜默竹: 《美国对华汇率外交中的利益集团政治》, 第 69-100 页。
5. 付争、许佳: 《“人民币区”初现与中国培育区域性货币依赖的可能性分析》第 101-125 页。
6. 刘中伟: 《东亚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整合与东亚区域合作的新走向》, 第 126-156 页。

《国际观察》2014 年第 4 期

1. 杨洁勉: 《中美俄的亚太战略互动: 动因、特点和理论建构》, 第 1-11 页。
2. 俞正樑: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再平衡》, 第 12-28 页。
3. 蔡鹏鸿: 《中美合作构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前景分析》, 第 29-42 页。
4. 韦宗友: 《中美战略妥协与东亚安全秩序构建》, 第 43-56 页。
5. 刘中民: 《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全球治理与国际体系转型》, 第 57-69 页。
6. 于海洋: 《大战略研究的反思与代价管理的必要》, 第 70-83 页。
7. 陈玉聃: 《正义战争理论与“人的安全”: 一种思想史的考察》, 第 84-94 页。
8. 廉德瑰: 《试论日美关系的复杂性》, 第 95-107 页。
9. 刘世强: 《变革调适与美国霸权修复的深层挑战》, 第 107-119 页。
10. 曹德明、唐桂馨: 《欧盟文化政策的核心: 多样性中的统一性》, 第 120-132 页。
11. 戴启秀、王志强: 《德国新政府外交政策调整及走向》, 第 133-144 页。
12. 沈逸: 《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与金砖国家合作》, 第 145-157 页。

2014 年第 5 期

1. 夏立平: 《“高边疆”理论视阈下美国全球快速常规打击计划》, 第 1-12 页。
2. 叶江: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中方立场文件》解读, 第 13-24 页。
3. 张春: 《2015 年后议程建构与中非合作探析》, 第 25-37 页。
4. 张全义: 《人、国家与体系心理: 国际政治社会学的一种诠释》, 第 38-51 页。
5. 花勇: 《国际社会的交往构成——交往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 第 52-62 页。
6. 于宏源: 《奥巴马政府能源型国家塑造和中美能源关系》, 第 63-77 页。
7. 舒建中: 《页岩气革命对美国能源主导地位的影响》, 第 78-89 页。
8. 熊文驰: 《正义与权力之争的复杂与两难——以修昔底德笔下普拉提亚 (Plataea) 事件为例》, 第 90-104 页。
9. 陈金英: 《西方视角下的中印政治发展模式比较》, 第 105-119 页。
10. 张建: 《日本自贸协定战略动向与 TPP 问题分析》, 第 120-132 页。
11. 赵伟宁、杨鲁慧: 《韩国加入 TPP 的动因、挑战及战略选择》, 第 133-145 页。

2014 年第 6 期

1. 刘江永: 《从国际战略视角解读可持续安全真谛》, 第 1-17 页。
2. 祁怀高: 《中国发展理念的全球共享与国际组织的作用》, 第 19-29 页。
3. 闫健: 《国外关于失效国家治理的研究述评》, 第 30-41 页。
4. 钱皓: 《加拿大对外援助与国家海外形象建构》, 第 42-53 页。
5. 包霞琴、黄贝: 《浅析安倍内阁的东南亚安全外交》, 第 54-65 页。

6. 信强、张宸榕:《民主党内部分歧与争斗对美国医改进程的影响》,第 66-78 页。
7. 李滨、张雨:《评估奥巴马的“再工业化”战略》,第 79-91 页。
8. 王磊:《里斯本改革后的欧盟特别代表制度:机制创新及其启示》,第 92-103 页。
9. 胡勇:《八国集团的现状评估及其未来发展》,第 104-116 页。
10. 杨力、李蕊:《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退出机制研究》,第 117-130 页。
11. 鲁茉莉:《金融区域主义的兴起和发展》,第 131-142 页。
12. 吴前进:《跨国栖居与民间关系的互动——以近 20 多年中韩民间关系为例的分析》,第 143-154 页。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14 年第 4 期

1. 李巍、孙忆:《理解中国经济外交》,第 1-24 页。
2. 王宏禹、罗洋:《国家营销视角下的中国外交战略分析》,第 25-40 页。
3. 董洁:《中苏分裂后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1961~1965)》,第 41-58 页。
4. 陈拯:《〈盐铁论〉对外关系辩论与中国古代外交思想研究》,第 59-77 页。
5. 石斌:《美国“黠武主义”探源》,第 78-106 页。
6. 潘兴明:《英国对欧政策新取向探析》,第 107-120 页。
7. 忻华、杨海峰:《英国智库对英国对华决策的影响机制:以皇家国际事务学会为例》,第 121-138 页。
8. 孙立文:《〈海洋法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强制性及其对中国海洋争端解决的意义》,第 139-159 页。

2014 年第 5 期

1. 江瑞平:《东亚合作与中日关系的互动:困局与对策》,第 1-18 页。
2. 檀有志:《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中美在网络空间的竞争与合作》,第 19-38 页。
3. 陆伟:《“联合机动防卫力量”:日本新军事战略的构建和影响》,第 39-61 页。
4. 徐能武、黄长云:《太空威慑:美国战略威慑体系调整与全球战略稳定性》,第 62-84 页。
5. 季玲:《历史、实践与东盟安全合作进程》,第 85-103 页。
6. 王媚:《安全地区化与非洲区域组织的集体安全机制》,第 104-121 页。
7. 张祖兴:《论领土争端法律解决中的时际法原则》,第 122-138 页。
8. 韩叶:《水权的合法性:国际河流水资源分配中的规范竞争》,第 139-156 页。

《现代国际关系》

2014 年第 8 期

1. 金灿荣、戴维来、金君达:《中等强国崛起与中国外交的新着力点》,第 1-6+26 页。
2. 徐步:《美战略界有关“美国衰落论”的辩论及其影响》,第 7-13 页。
3. 楚树龙、陶莎莎:《对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再认识、再思考》,第 14-18+58 页。
4. 张文宗、薛伟、李学刚:《试析乌克兰危机的战略影响》,第 19-26 页。
5. 曹筱阳:《美国“印太”海上安全战略部署及其影响》,第 27-35 页。
6. 孙君健:《澳大利亚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反应》,第 36-43 页。
7. 朱海燕:《日澳关系“同盟化”的新发展及其前景》,第 44-51 页。
8. 张文杰、王学玉:《澳大利亚学界如何看中日钓鱼岛争端?》,第 52-58 页。
9. 王娟娟、杨文武:《马尔代夫恐怖活动的特点、原因与马政府的应对》,第 59-64 页。

2014 年第 9 期

1. 綦大鹏、张弛:《亚太战略形势评析》,第 1-6 页。
2. 张健:《试析后债务危机时期的欧盟及其前景》,第 7-14 页。
3. 陈鑫:《浅析安倍“战略外交”》,第 15-22 页。
4. 马晓云:《卡梅伦政府对华政策述评》,第 23-31 页。
5. 何晓跃:《美国少数族裔人口变化特征及其影响》,第 32-40 页。
6. 李超:《德国“积极外交政策”评析》,第 41-47 页。
7. 陈新明、宋天阳:《乌克兰危机与德俄关系及其演变趋向》,第 48-54 页。
8. 李绍先:《“伊斯兰国”崛起与国际反恐新难题——“伊斯兰国”因何而来?》,第 55-56 页。
9. 孙冉、唐恬波:《“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特点》,第 56-59 页。
10. 牛新春:《“伊斯兰国”折射出国际政治最黑暗的一面》,第 59-61 页。
11. 龚正:《“伊斯兰国”冲击美国中东战略》,第 61-64 页。

《国际问题研究》2014 年第 6 期

1. 唐家璇:《共筑和平、共襄繁荣、共创未来》,第 1-6+130 页。
2. 姚匡乙:《中国在中东热点问题上的新外交》,第 7-17+130-131 页。
3. 姚遥:《推进周边公共外交:理念、问题与对策》,第 18-28 页。
4. 唐丽霞、李小云、齐顾波:《中国对非洲农业援助管理模式的演化与成效》29-40 页。
5. 闫健:《国外关于失效国家治理的研究述评》,第 30-41 页。
6. 叶皓:《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关系发展历程及其经验教训》,第 41-50 页。
7. 修春萍:《东亚变局与两岸关系走向》,第 51-60 页。
8. 信强:《美越安全合作的发展及其影响因素》,第 61-71 页。
9. 赵鸿燕、汪锴:《印度公共外交中的文化传播管窥》,第 72-86 页。
10. 元简:《美国的新能源政策:渐进模式及其影响》,第 87-103+131 页。

11. 李国强:《南海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的政策调适》,第 104-115+132 页。
12. 江洋、王义桅:《TTIP 的经济与战略效应》,第 116-125 页。
13. 杨力、李蕊:《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退出机制研究》,第 117-130 页。
14. 鲁茉莉:《金融区域主义的兴起和发展》,第 131-142 页。

《美国研究》2014 年第 1 期

1. 樊吉社:《朝核问题与中美战略共识》,第 9-20 页。
2. 张勇安、刘海丽:《国际非政府组织与美国对缅外交——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为中心》,第 21-33 页。
3. 王联合:《美国亚太安全战略论析:“聚合安全”视角》,第 34-52 页。
4. 李恒阳:《奥巴马第二任期美国网络安全政策探析》,第 53-69 页。
5. 马建英:《美国对中国周边海洋争端的介入——研究文献评述与思考》,第 70-82 页。
6. 刘新华:《美国学术界关于中国海权问题的研究》,第 83-99 页。
7. 曹升生:《美国市县合并研究的历史演进》,第 100-114 页。
8. 张清敏:《政治心理学研究的里程碑——评〈总统人格:伍德罗·威尔逊的精神分析〉》,第 115-124 页。
9. 沈鹏、齐浩、张帆:《增进共识,弥合分歧——“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研讨会综述》,第 125-128 页。

《国际政治研究》

2014 年第 3 期

1. 保罗·埃文斯、张卫族、陈长伟:《诠释与落实“保护的责任”:通往共同点的途径》,第 26-33 页。
2. 海泽龙:《“保护的责任”:法治良心与严峻现实——以利比亚冲突为案例》,第 34-49 页。
3. 顾炜:《“保护的责任”:俄罗斯的立场》,第 50-60 页。
4. 张旗:《道德的迷思与人道主义干预的异化》,第 61-73 页。
5. 徐彤武:《当代美国非营利部门与美国国家安全》,第 74-95 页。
6. 宋美佳、洛水、于铁军:《变动条件下的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一种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第 96-109 页。
7. 牛大勇:《中国外交在探索 and 选择中前行——评牛军著〈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1945-1955〉》,第 110-114 页。
8. 初晓波:《罗马尼亚外交官忆中国——评〈寒冰访罗明〉》,第 115-122 页。
9. 宫崎悠、李静和:《战后德国与波兰有关历史教科书的对话》,第 123-128 页。

2014 年第 4 期

1. 宋伟:《核心概念创造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第 9-10 页。
2. 宋伟:《国际结构与国际格局:核心概念的比较及启示》,第 11-24+5 页。
3. 刘丰:《概念生成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第 25-39+5-6 页。
4. 李巍、唐健:《国际舞台上的中国角色与中国学者的理论契机》,第 40-58+6 页。
5. 董青岭:《从中西哲学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生》,第 59-72+6-7 页。
6. 李义虎:《作为新命题的“一国两制”台湾模式》,第 73-89+7 页。
7. 徐秀军:《金融危机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派、范式与议题》,第 90-107+8 页。
8. 本刊特约记者:《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展与实践意蕴——王存刚教授访谈》,第 108-122 页。
9. 牛军:《一个复杂的故事——评〈被遗忘的盟友:中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37—1945)〉》,第 123-128 页。

《欧洲研究》2014 年第 2 期

1. 郑春荣:《德国外交政策的新动向》,第 1-14 页。
2. 丁纯、李君扬:《试析欧债危机中德国经济社会的表现——兼议德国模式的作用及其前景》,第 15-33 页。
3. 胡琨:《德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及战后经济政策变迁刍议》,第 34-47 页。
4. 王铁军:《欧洲经货联盟与欧元区货币权力结构的失衡》,第 48-64 页。
5. 曹慧:《欧盟对外能源政策:关系结构与发展工具》,第 65-81 页。
6. 张鹏:《欧盟援助西巴尔干政策评析》,第 82-96 页。
7. 李源:《法德重启海洋战略的逻辑——化解“陆海复合型”困局》,第 97-114 页。
8. 王聪聪:《试析北欧左翼政党的“绿色转向”》,第 115-129 页。
9. 王焱:《公民社会与欧盟民主建设研究述评》,第 130-146 页。
10. 冯源:《未知世界中的欧洲外交——评〈欧洲外交政策——外交能力与外交行动的探讨〉》,第 147-151 页。

2014 年第 3 期

1. 沈晓晨、杨恕:《试析“反恐怖主义激进化”的三个关键维度——基于英国“预防战略”的案例分析》,第 1-18 页。
2. 唐世平:《安全困境”和族群冲突——迈向一个动态和整合的族群冲突理论》,第 19-46 页。
3. 余南平:《后金融危机时期欧美经济复苏差异比较——以金融结构为视角》,第 47-68 页。
1. 叶江:《试论欧盟的全球治理理念、实践及影响——基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分析》,第 69-

84 页。

4. 李硕: 《论西欧多党竞争中反体制政党的体制性整合》, 第 85-103 页。
5. 叶斌: 《欧盟贸易协定政策的变化和影响——法律的视角》, 第 104-122 页。
6. 王乐兵、周杰: 《债务危机背景下的欧洲场外衍生品监管改革》, 第 123-141 页。
7. 卢凌宇: 《预测与国际关系科学》, 第 142-154 页。

《国际政治科学》2014 年第 2 期

1. 徐进、杜哲元: 《反思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中的思维定势》, 第 1-32 页。
2. 王铭: 《唐代东北亚国家的“华夷”观念复制》, 第 33-85 页。
3. 李少杰、赵可金: 《中国白皮书的国际政治功能变迁》, 第 86-113 页。
4. 巴里·布赞、迈克尔·考克斯: 《中美两国“和平崛起”之比较》, 第 114-141 页。
5. 刘鹏: 《缅甸的民主改革与美国的认可》, 第 142-165 页。

国际关系英文核心期刊最新论文篇目信息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8, No. 4

1. Jonas Tallberg, Thomas Sommerer, Theresa Squatrito and Christer Jönsson, “Explaining the Transnational Design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pp. 741-774.
2. Songying Fang, Jesse C. Johnson and Brett Ashley Leeds, “To Concede or to Resist? The Restraining Effect of Military Alliances,” pp. 775-809.
3. Margaret E. Peters, “Trad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mmigration Policy Ma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pp. 811-844.
4. Emilie M. Hafner-Burton, Brad L. LeVeck, David G. Victor and James H. Fowler, “Decision Maker Preferences for International Legal Cooperation,” pp. 845-876.
5. Stephen Chaudoin, “Audience Features and the Strategic Timing of Trade Disputes,” pp. 877-911.
6. Nicholas L. Miller, “The Secret Success of Nonproliferation Sanctions,” pp. 913-944.
7. Victor Asal, Justin Conrad and Peter White, “Going Abroad: Transnational Solicitation and Contention by Ethnopolitical Organizations,” pp. 945-978.
8. Reed M. Wood, “From Loss to Looting? Battlefield Costs and Rebel Incentives for Violence,” pp. 979-999.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8, No. 4

1. Michael Saward, “Shape-Shifting Representation,” pp. 723-736.
2. Lisa Hultman, Jacob Kathman and Megan Shannon, “Beyond Keeping Peace: United

- Nations Effectiveness in the Midst of Fighting,” pp. 737-753.
3. William G. Jacoby, “Is There a Culture War? Conflicting Value Structures in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pp. 754-771.
 4. Dana Jalbert Stauffer, “Tocqueville on the Modern Moral Situation: Democracy and the Decline of Devotion,” pp. 772-782.
 5. Ismail K. White, Chryl N. Laird and Troy D. Allen, “Selling Out?: The Politics of Navigating Conflicts between Racial Group Interest and Self-interest,” pp. 783-800.
 6. John F. Mccauley, “The Political Mobilization of Ethnic and Religious Identities in Africa,” pp. 801-816.
 7. Sebastian Schmidt, “Foreign Military Presence and the Changing Practice of Sovereignty: A Pragmatist Explanation of Norm Change,” pp. 817-829.
 8. Alexander I. Orwin, “Can Humankind Deliberate on a Global Scale? Alfarabi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Inhabited World,” pp. 830-839.
 9. Jason Barabas, Jennifer Jerit, William Pollock and Carlisle Rainey, “The Question(s) of Political Knowledge,” pp. 840-855.
 10. Steven Klein, “‘Fit to Enter the World’: Hannah Arendt on Politics, Economics, and the Welfare State,” pp. 856-869.
 11. Lorenzo De Sio and Till Weber, “Issue Yield: A Model of Party Strategy in Multidimensional Space,” pp. 870-885.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0, No. 4

1. Daniel J. Levine and Alexander D. Barder,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American Schoo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state of grand theory,” pp. 863-888.
2. Rebecca Adler-Nissen and Vincent Pouliot, “Power in practice: Negotiating the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in Libya,” pp. 889-911.
3. Matthew D. Stephen, “Rising powers, global capitalism and liberal global governance: A historical materialist account of the BRICs challenge,” pp. 912-938.
4. Ja Ian Chong, “Popular narratives versus Chinese history: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an emergent China,” pp. 939-964.
5. David C. Kang, “Why was there no religious war in premodern East Asia?,” pp. 965-986.
6. Mark Axelrod, “Clash of the treaties: Responding to institutional interplay in European Community-Chile swordfish negotiations,” pp. 987-1013.
7. Cecilia Albin and Daniel Druckman, “Procedures matter: Justice and effectivenes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negotiations,” pp. 1014-1042.

8. Maria Koinova, "Why do conflict-generated diasporas pursue sovereignty-based claims through state-based or transnational channels? Armenian, Albanian and Palestinian diasporas in the UK compared," pp. 1043-1071.
9. John M. Owen IV and Michael Poznansky, "When does America drop dictators?," pp. 1072-1099.
10. Courtney Hillebrecht, "The power of human rights tribunals: Compliance with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and domestic policy change," pp. 1100-1123.
11. Klaus Dingwerth, "Global democracy and the democratic minimum: Why a procedural account alone is insufficient," pp. 1124-1147.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9, No. 2

1. Nuno P. Monteiro, Alexandre Debs, "The Strategic Logic of Nuclear Proliferation," pp. 7-51.
2. Adam P. Liff, G. John Ikenberry, "Racing toward Tragedy?: China's Rise, Military Competi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pp. 52-91.
3. Lee J.M. Seymour, "Why Factions Switch Sides in Civil Wars: Rivalry, Patronage, and Realignment in Sudan," pp. 92-131.
4. Khalid Hodayun Nadiri, "Old Habits, New Consequences: Pakistan's Posture toward Afghanistan since 2001," pp. 132-168.
5. Sumit Ganguly, "Pakistan's Forgotten Genocide—A Review Essay," pp. 169-180.
6. Jon R. Lindsay, Lucas Kello, "Correspondence: A Cyber Disagreement," pp. 181-192.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8, No. 4

1. Amitav Acharya,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R) and Regional Worlds: A New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pp. 647-659.
2. Jørgen Møller, "Why Europe Avoided Hegemony: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the Balance of Power," pp. 660-670.
3. Ty Solomon, "Time and Subjectivity in World Politics," pp. 671-681.
4. Calvert W. Jones, "Exploring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ward a Theory of Enlightened Nationalism," pp. 682-705.
5. Julian Germann, "German 'Grand Strategy' and the Rise of Neoliberalism," pp. 706-716.
6. Wolfgang Wagner and Michal Onderco, "Accommodation or Confrontation? Explaining Differences in Policies Toward Iran," pp. 717-728.

7. Ryan K. Beasley and Juliet Kaarbo, "Explaining Extremity in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 pp. 729-740.
8. Patrick Shea, Terence K. Teo and Jack S. Levy, "Opposition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Crises: A Formal Model," pp. 741-751.
9. Jeffrey M. Chwieroth, "Fashions and Fads in Finance: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Sovereign Wealth Fund Creation," pp. 752-763.
10. Michaël Aklin and Johannes Urpelainen, "The Global Spread of Environmental Ministries: Domestic-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pp. 764-780.
11. Jean-Frédéric Morin and Edward Richard Gold, "An Integrated Model of Legal Transplantation: The Diffus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p. 781-792.
12. Daniel Berliner and Aseem Prakash, "Public Authority and Private Rules: How Domestic Regulatory Institutions Shape the Adoption of Global Private Regimes," pp. 793-803.
13. Andrew Kerner, "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p. 804-815.
14. Lawrence Ezrow and Timothy Hellwig, "Responding to Voters or Responding to Markets? Political Parties and Public Opinion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pp. 816-827.
15. Benjamin Nyblade and Angela O'Mahony, "Playing with Fire: Pre-Electoral Fiscal Manipulation and the Risk of a Speculative Attack," pp. 828-838.
16. Rob Kevlihan, Karl DeRouen Jr and Glen Biglaiser, "Is US Humanitarian Aid Based Primarily on Need or Self-Interest?" pp. 839-854.
17. Dursun Peksen, Timothy M. Peterson and A. Cooper Drury, "Media-driven Humanitarianism? News Media Coverage of Human Rights Abuses and the Use of Economic Sanctions," pp. 855-866.
18. Askar Akaev and Vladimir Pant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and Future Shift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867-872.
19. Bear F. Braumoeller, "Information and Uncertainty: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Case Studies," pp. 873-875.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8, No. 8

1. Laia Balcells and Patricia Justino, "Bridging Micro and Macro Approaches on Civil Wars and Political Violence: Issues, Challenges, and the Way Forward," pp. 1343-1359.
2. Ana Arjona, "Wartime Institutions: A Research Agenda," pp. 1360-1389.
3. Laia Balcells and Stathis N. Kalyvas, "Does Warfare Matter? Severity, Duration, and

Outcomes of Civil Wars,” pp. 1390-1418.

4. Theodore McLauchlin, “Desertion, Terrain, and Control of the Home Front in Civil Wars,” pp. 1419-1444.

5. Jaideep Gupte, Patricia Justino, and Jean-Pierre Tranchant, “Households amid Urban Riot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Civil Violence in India,” pp. 1445-1473.

6. Rachel Sabates-Wheeler and Philip Verwimp, “Extortion with Protection: Understanding the Effect of Rebel Taxation on Civilian Welfare in Burundi,” pp. 1474-1499.

7. Roxana Gutiérrez-Romero, “An Inquiry into the Use of Illegal Electoral Practices and Effects of Political Violence and Vote-buying,” pp. 1550-1527.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21, No. 6

1. Elisabeth Prügl & Jacqui True, “Equality means business? Governing gender through transnational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pp. 1137-1169.

2. Eddy S. Fang, “Islamic finance in global markets: Materialism, idea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financial knowledge,” pp. 1170-1202.

3. Matthias Thiemann, “In the Shadow of Basel: How Competitive Politics Bred the Crisis,” pp. 1203-1239.

4. Barbara Sennholz-Weinhardt, “Regulatory competition as a social fact: Constructing and contesting the threat of hedge fund managers’ relocation from Britain,” pp. 1240-1274.

5. Matthias Ecker-Ehrhardt, “Why parties politicis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On globalisation backlash and authority contestation,” pp. 1275-1312.

6. Lisa Kastner, “‘Much ado about nothing?’ Transnational civil society, consumer protection and financial regulatory reform,” pp. 1313-1345.

7. Kaoru Natsuda & John Thoburn, “How much policy space still exists under the WTO?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in Thailand and Malaysia,” pp. 1346-1377.

Security Studies, Vol. 23, No. 4

1. Andrew Bennett, Colin Elman & John M. Owen, “Security Studies, Security Studies, and Recent Developments in Qualitative and Multi-Method Research,” pp. 657-662.

2. Andrew Moravcsik, “Trust, but Verify: The Transparency Revolution and Qualitativ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663-688.

3. Elizabeth N. Saunders, “Transparency without Tears: A Pragmatic Approach to

Transparent Security Studies Research,” pp. 689-698.

4. Diana Kapiszewski & Dessislava Kirilova, “Transparency in Qualitative Security Studies Research: Standards, Benefits, and Challenges,” pp. 699-707.

5. Jack Snyder, “Active Citation: In Search of Smoking Guns or Meaningful Context?,” pp. 708-714.

6. Mark L. Haas, “Ideological Polarity and Balancing in Great Power Politics,” pp. 715-753.

7. Harris Mylonas & Nadav G. Shelef, “Which Land Is Our Land? Domestic Politics and Change in the Territorial Claims of Stateless Nationalist Movements,” pp. 754-786.

8. Nina Kollars, “Military Innovation’s Dialectic: Gun Trucks and Rapid Acquisition,” pp. 787-813.

9. Mira Rapp Hooper, “Ambivalent Albion, Ambitious Ally: Britain’s Decision for No Separate Peace in 1914,” pp. 814-844.

World Politics, Vol. 66, No. 4

1. Noam Lupu, “Brand Dilution and the Breakdown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Latin America,” pp. 561-602.

2. Irfan Nooruddin and Nita Rudra, “Are Developing Countries Really Defying the Embedded Liberalism Compact?” pp. 603-640.

3. Egor Lazarev, Anton Sobolev, Irina V. Soboleva and Boris Sokolov, “Trial by Fire: A Natural Disaster’s Impact on Support for the Authorities in Rural Russia,” pp. 641-668.

4. Jan Rovny, “Communism, Federalism, and Ethnic Minorities: Explaining Party Competition Patterns in Eastern Europe,” pp. 669-708.

5. Amanda Lea Robinson, “National Versus Ethnic Identification in Africa: Modernization, Colonial Legacy, and the Origins of territorial Nationalism,” pp. 709-746.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1, No. 1

1. Tom Lundborg and Nick Vaughan-Williams, “New Materialisms, discourse analysi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radical intertextual approach,” pp. 3-25.

2. David Chandler, “Resilience and the ‘everyday’: beyond the paradox of ‘liberal peace’,” pp. 27-48.

3. Suthakaran Nadarajah and David Rampton, “The limits of hybridity and the crisis of liberal peace,” pp. 49-72.

4. Mandy Turner, "Peacebuilding as counterinsurgency in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 pp. 73-98.
5. Luara Ferracioli, "Immigration,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brain drain," pp. 99-115.
6. Ryder McKeown, "Legal asymmetries in asymmetric war," pp. 117-138.
7. Vicki Squire, "Reshaping critical geopolitics? The materialist challenge," pp. 139-159.
8. Douglas Howland, "An alternative mode of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international administrative un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p. 161-183.
9. Gadi Heimann, "What does it take to be a great power? The story of France joining the Big Five," pp. 185-206.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7, No. 4

1. Barry Buzan, "The Logic and Contradictions of 'Peaceful Rise/Development' as China's Grand Strategy," pp. 381-420.
2. Timo Kivimäki, "Soft Power and Global Govern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p. 421-447.
3. Jochen Prantl, "Taming Hegemony: 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the Challenge to Western Liberal Order," pp. 449-482.
4. Tang Shiping, "International System, not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Agains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ématique in IR," pp. 483-506.

[整理: 宁鹏举、郭超、刘志]

[责任编辑: 刘志]

是单起源还是多起源问题的书,显然符合作者提出的三个标准,但可以视为经典吗?3.希望“期刊篇目信息”能够添加 CJIP 的篇目。不知道编者有什么样的考虑,我的考虑是它不仅是国内影响因子最高的英文国关期刊,而且对定量方法要求没那么高又能锻炼看英文的能力,适合本科生阅读。最后望《新视界》日臻完善。

小编:感谢庆阳同学的来信。而关于你提出的疑问 1,陈永同学的回复如下: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由习主席提出,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倡导的,指导中美关系的最高原则,“相互尊重”是其重要内容。但这是宏观的政策性原则,加之美方并不积极,不愿意从哲学层面上探讨,官方也不具体表态,所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是尚待进一步明确的。由于这不仅仅是理论问题,因此对“尊重”这一概念无法进行精确操作,但是可以视为一种表态。目前,中美两国在新型大国关系上仅在“不冲突、不对抗”上有共识,“相互尊重与合作共赢”还谈不上。在很多问题上,中美之间的相互尊重水平依然不够。这一理念与政策之间也不是那么契合,所以它与美国重返亚太的关系不明朗,不宜进行关联。

对于问题 3,即添加 CJIP 的篇目,我们会认真讨论和考虑,尽量满足。

张玲毓(南开大学 2012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新视界》这本南开国关人自己的杂志确实把我带入了一个具有高度的新世界,通过这本杂志睿智的指引,我可以拥有

一个更清晰更新颖的角度来看问题。通过“科研简报”和“时事观察”专栏,我了解到国际政治方面的最新动态;通过“国关人物”专栏对当代著名国关人物及其观点的介绍,我可以和可望不可即的国关大牛们近距离接触……在阅读每一个专栏时,我都能感受到编者的良苦用心,在这里感谢南开人的辛勤付出,也祝《新视界》杂志越办越好!

虞丹霓(南开大学 2012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新视界》作为国关系刊,给同学们带来了许多有质量的文章,也推荐了不少最新的专业书以及经典书目。对于我们这些读者而言,真的是开卷有益。秋季号的“时事观察”栏目刊登了作者对于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关系的思考。事件是 8 月 19 日,中国一歼 11 战机近距离拦截美国侦察机,而美方指责中国战机的拦截行为是“非专业、不安全的”,并提出外交抗议。近年来,随着美国的战略东移以及亚太再平衡政策的实施,美国想方设法遏制中国的崛起并在南海等诸多问题上插足。正如作者所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前途不容乐观”。美方一方面指责中方,另一方面不顾对中国进行的海空不间断侦察给中国造成的安全压力。美国对中国的不尊重态度必然引起冲突与对抗心理。作者在文中也提到,不冲突不对抗是中美和平相处的最低要求。在现今,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迫切需要双方采取相互尊重的态度,在共同利益上共同管理地区热点,实现共同发展。这些思考对于我们看待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也提供了一些思路。

小编总结



非常感谢几位同学的来信, 你们的支持和关注正是《新视界》不断发展的动力。作为学生自办的刊物, 《新视界》一直致力于为同学们搭建一个相互交流学习的平台, 小编希望能够在系刊上更多地看到大家的文

字, 将你们的建议传递给我们, 也将你们的感想和体会分享给更多的人。在未来的路上, 希望《新视界》能够一直陪伴你们, 愿你们有更多的收获。新年将近, 也希望各位读者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学业有成, 生活顺利。

《新视界》信箱:

把你想对我们说得话, 对我们改善栏目的建议, 以及希望得到我们解答的疑惑, 发给我们吧! 来信请发: newvision@mail.nankai.edu.cn。

我们将尽可能迅速和详细地回答你的提问。

[整理: 李安琪 李天翼 彭宁楠]

[责任编辑: 李天翼]

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论文注释体例

一、总 则

1. 正文注释采用页下注(脚注), 每页依序重新编号。
2. 注释格式: 中文字体为宋体, 英文字体为 Times New Roman, 字号小五, 单倍行距。
3. 学位论文后必须列出“参考文献”, 课程论文一般不做要求。
4. 所引资料务必真实、准确、规范。

二、中文注释

(一) 著作

1. 专著: 著者, 文献名, 卷册序号, 出版地, 出版机构, 出版时间, 页码。若出版机构名称已包含地名, 不必重复注出。

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1页。

2. 编著:应在编者姓名后加“编”或“主编”、“编著”。

王逸舟主编:《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0-68页。

3. 译著:在著者姓名前可以“[]”标明著者国别;在文献名之后,可标明译者。

[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六章”。

4. 如著者、编者为二人,两者姓名之间以顿号间隔;如为三人以上,可省略为“×××(第一责任者姓名)等(编)”。

宇燕、盛洪:《旧邦新命》,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46、158页。

吴志成、薛晓源主编:《欧洲研究前沿报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陈志瑞等主编:《开放的国际社会: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英国学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

(二) 文章

1. 文集论文:著者,文章题目(加书名号),文集编者名称,文集名,出版地、出版单位及版次,页码。

[美]威廉·沃尔福思:《单极世界中的美国战略》,载于约翰·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韩召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9-117页。

2. 期刊论文

张睿壮：《“人道干涉”神话与美国意识形态》，《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第109-117页。

3. 会议论文

任东来：《对国际体制和国际制度的理解和翻译》，“全球化与亚太区域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天津：南开大学，2000年6月15-17日，第3页。

4. 学位论文

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博士论文，1999年4月，第55页。

（三）其他

如引用资料来自政府出版物、通讯社消息、未刊手稿、缩微胶卷等，其注释也应尽量标明编辑者、文献名、出版地、出版机构和时间、页码，或者文献性质、收藏地点、收藏编号等。如无需或不便标明著作者/编辑者，则标明其他类项也可。例如：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3页。

《中国与八国财长就全球经济发展等问题进行对话》，新华社莫斯科2006年2月1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研究室：《中国外交——2006年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560页。

三、外文注释

这一部分的说明和举例以英文文献为准。其他外文如法文、德文、日文、俄文等文献的释出，可参照相应文献释出的通约惯例。

（一）著作

专著：著者，文献名（斜体），出版地、出版机构及版次，页码。著作者姓名以名前姓后的顺序书写。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p. 18.

如为编著，则编者姓名后加“ed.”（编者为一入）或“eds.”（编者为二人以上）。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

John A. Vasquez and Colin Elman,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A New Debate*,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2003, Chapter 3.

如著作者为三人以上，第一责任者姓名之后可省略为“et al.”（意即 and others）。例如：

Judith L. Goldstein, et al., *Legalization and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2001, p. 160.

Walter Carlsnaes, et al.,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2002, pp. 354-355.

（二）文章

1. 文集论文：作者，文章标题（加双引号），文集编者，文集名称（斜体），出版地、出版机构及版次，页码。

Joseph M. Grieco, “Realist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 Michael W. Doyle and G. John Ikenberry, eds., *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1997, p. 169.

2. 期刊论文：作者，文章标题（加双引号），刊物名称（斜体），刊物出版卷次、期号及年份，页码。例如：

Robert Jervis, “Unipolarity: A Structural Perspective,”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 January 2009, pp. 188-213.

3. 报纸文章：作者、文章标题（加双引号）、报纸名称（斜体）及具体出版日期，如能注明版面更好。

Joseph S. Nye Jr., “Lessons in Imperialism,” *Financial Times*, June 17, 2002.

4. 会议论文

David Shambaugh, “The Evolving Asian System: A New Regional Structur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East Asia Cooperation and Sino-U.S. Relations”, Beijing, China, November 3-4, 2005.

5. 学位论文

Ruizhuang Zha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Motives: National Interest vs. Ideology,”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7, p. 9.

（三）其他

如引用政府或国际组织出版物、通讯社消息、未刊手稿、缩微胶卷等，其注释也应尽量

标明编辑者、文献名、出版地、出版机构和时间、页码,或者文献性质、收藏地点、收藏编号等。如无需或不便标明著作者/编辑者,则标明其他类项也可。

Daniel Landau, "The Economic Impact of Military Expenditure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138,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3, p. 55.

四、重复引用和转引

(一) 重复引用

如重复引用同一文献,不论中外文,只需注明著作者、文献名和页码。

沃尔福思:《单极世界中的美国战略》,第 101 页。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12-113.

(二) 转引

1. 中文文献

先将转引文献按上述注释方式释出,以句号结束。再以“转引自”把载有转引文献的来源文献按相应方式释出。

[美]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与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32 页。转引自胡鞍钢:《中国崛起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81 页。

2. 外文文献

Hans Morgenthau, *Scientific Man vs. Power Politic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6, p. 194. Quoted in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2001, p. 19.

五、互联网资料

使用互联网资料时,著作者、文献名称等类项同上述相应体例,同时注明详细网址和访问时间。

《中美联合声明》,新华网,2009 年 11 月 17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11/17/content_12475620.htm (最后访问时间:2009 年 12 月 10 日)。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25: A Transformed World," http://www.dni.gov/nic/PDF_2025/2025_Global_Trends_Final_Report.pdf (最后访问时间:2009 年 12 月 14 日)。

六、参考文献

这一部分的说明和举例供制作学位论文的参考文献时参考。

(一) 中文部分

中文参考文献的书写体例同中文注释体例，文献排序规则如下：

1. 中文作者按照姓氏拼音排列；
2. 译著按照作者中译名顺序排列。
3. 同一作者的多篇文献，以专著、编著、论文为类依次排列，同一类文献按出版时间升序排列；
4. 期刊和文集中的论文须注明起始页码。

示例如下：

1.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2. 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弢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3. 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 1998 年版。
4. 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5.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第 3 期，第 165-176 页。
6.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一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 年版。

(二) 外文部分

这一部分的说明和举例以英文文献为准。其他外文如法文、德文、日文、俄文等文献的，可参照相应文献的通约惯例。书写体例如下：

1. 第一著作者姓名以姓前名后的顺序书写，姓名以逗号间隔；
2. 以第一著作者英文姓氏顺序排列，首行缩进 2 字符；
3. 同一作者的多篇文献，以专著、编著、论文为类依次排列，同一类文献按出版时间升序排列；
4. 同一作者姓名多次出现以“——”代替；
5. 期刊和文集中的论文须注明起始页码。

示例如下：

- Doyle, Michael W. 1983. "Kant, Liberal Legacies, and Foreign Affairs, Part II."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2(4): 323-353.

- . 1986.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 (4): 1151-1169.
- Elman, Coli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eds. 2001. *Bridges and Boundaries: Historians, Political Scientists,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Keohane, Robert O. ed. 1986.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altz, Kenneth N. 1967. *Foreign Polic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The American and British Experi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 .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 2000.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1): 4-41.
- . 2002. "Intimations of Multipolarity." in Birthe Hansen and Bertel Heurlin eds. *The New World Order: Contrasting Theories*. London: Macmillan. pp. 1-18.

征稿启事

《新视界》（季刊）是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主管，国际关系系学生自筹自办、倡导学术性和生活性相结合的学生刊物。本刊秉承“知识性、交流性、原创性”原则，以“我的视界我做主”为理念，旨在为师生搭建交流的平台、营造学术的争鸣氛围，为国际关系的发展提供助力。“立足于南开，但又限于南开”，我们热忱欢迎校内外和国内外学人和同学惠赐佳作。

本刊主要有学人访谈、学术论文、书山有路、国关人物、他山之石、新书架、英采飞扬等固定栏目。另外，根据学科发展及国际形势变化，本刊还适时增设论文工作坊、学界动态、聚焦、笔谈等浮动栏目。本刊欢迎学术性论文（包括书评），国内外国际关系学者访谈、学术历程介绍及轶事，新书评介及学术动态等方面的稿件。来稿正文字数在 10000 字以内为宜。

投稿须知：

1. 本刊来稿一律要求原创首发，文责自负，反对剽窃、抄袭等一切学术不端行为（由于本刊**内部发行，不影响作者转投其他公开性学术刊物**）。本刊将竭诚为作者进一步研究提供交流平台。
2. 来稿需为 Word 文档格式，注释采用脚注，格式参阅本刊附录《国际关系系论文注释体例》。投稿请作者把稿件电子版以附件形式发至本刊邮箱 newvision@mail.nankai.edu.cn，并请提供 200 字以内作者基本信息（姓名，性别，教育背景，单位，职称，邮箱，电话，通信地址等）。
3. 首次涉及的外国人民、地名、机构名及其他专有名词，中译名请参照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并在中译名后括号内注明原文。
4. 所有学术性来稿采取双向匿名审稿制度，将在一个月内审读来稿并告知作者是否采用。对拟采用的稿件，编辑部将请作者根据评审意见进行修改，并在出刊后向作者寄送该刊物两本。另外，本刊根据栏目需要有权对来稿酌情删改，如不同意请在来稿中注明。
5. 编辑部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中国天津市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300071）

邮箱：newvision@mail.nankai.edu.cn

博客：<http://blog.sina.com.cn/nkirnewvision>

主页：<http://nknewvision.yolasite.com/>

New Vision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 主管
《新视界》编辑部 主办